《东欧》内参

波兰团结工会成立记

〔波兰〕沃依切赫·盖乌任斯基
莱　赫·斯泰凡斯基
吴　一　陈　成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東欧 内参

波兰团结工会成立记

〔波兰〕沃依切赫·盖乌任斯基
莱 赫 · 斯泰凡斯基 著

吴一 陈成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Wojciech Gielzynski, Lech Stefański

GDANSK SIERPIEN 80

Ksiazka i Wiedza, Warszawa 1981

《格但斯克 1980 年八月事件》

书籍与知识出版社 1981 年出版

波兰团结工会成立记

奥一 陈成 译

《东欧》丛刊编辑部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外国语学院 23 号信箱)

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上海印刷厂排版

北京市[illegible]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内部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7.25 印张 159 千字

1982 年10月第 1 版 1982 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700 册

书号：3215·2 定价：0.68 元

作 者 的 话

对1980年8月沿海地区所发生的事件作出评价，那将是历史学家的事情，记者的事情则是把它们记录下来。

本书就是试图履行这种职业上的，同时也是一种公民的责任。

当然，它不是一个完整的记录，因为尽管我们见闻很多，但毕竟远非全貌。在整个大罢工期间，我们一直在沿海地区，不过我们的视野也仅限于格但斯克，首先是列宁造船厂这个罢工的中心和"司令部"。对什切青和埃尔布隆格两地我们仅作过几次短暂的访问，最多只能提供若干对比性的材料而已。

本书很不完整地介绍了八月事件的起因和背景，相当详尽地介绍了它的过程，一直到8月31日在格但斯克签署协议为止。我们力求反映当时造船厂里的实际情况和事件发生时的气氛，因为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我们认为，群众的情绪如同他们提出的要求、谈判的进程、最后文件等一样，同样是重要的政治事实。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要理解政治现象，仅限于对力量对比、经济根源和法律制度原因等等作出分析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善于体察集体情感的方向、色彩和强度。在格但斯克的几个重大时刻，正是这种心理的和道义的气氛决定了事态的发展。

从八月以来，已经过去的这段时间毕竟是太短了。后来发生的，以及目前我国事件发展进程的有关问题实在太多了。要试图作出较为完整的、确切的定论还为时过早。何况我们自觉并无资格来作这种结论。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责任就我们所看到的许多事情提出一些那怕是粗浅的个人看法。

目　录

八月事件与十二月事件

格但斯克、格丁尼亚、什切青、埃尔布隆格，1980年的大规模罢工运动从这几个城市开始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这几个城市在1970年12月遇到了一场流血、镇压的悲剧，后来又吃过诺言不兑现的苦头。在造船工人中间，十年前的这个十二月事件是记忆犹新的。

甚至某些“剧中人”也是一样的，例如莱赫·瓦文萨、安娜·瓦伦滕诺维奇就是。

在八月罢工中掌舵的沿海地区的青年工人，有的通过人们的叙述，也有的通过自己童年时代的回忆，对十年前所发生的事件是一清二楚的。但同时，他们又没有亲身体验过当时的全部恐怖，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并无恐惧可言。这些青年工人读得多，听得也多，而且不仅仅是通过官方的群众性宣传工具。他们很了解世界，他们知道，我们这儿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坏。他们会使用现代技术(盒式录音机成了罢工工人的有力武器)，他们懂得良好组织的价值。

这里需要回忆一下十二月事件的一些基本情况。这就马上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我们没有实地调查过当时的事件，我们的根据是什么？当时记载下来的见证人的反映是不完整的，而且个人感情色彩也很浓。报刊的报导是零星不全的，并且是被大大歪曲了的。如果今天来收集十二月事件时在沿海地区的人们的证词，那还是很难区分哪些是事实，哪些是传闻。而有关那些悲惨日子的种种传闻是不可胜数的。当然，迟早总会有人来收集、考证、并且提出一份关于“十二月事件”过程的完整的情况介

绍。但是在今天我们还做不到。我们的打算只是尽快地把十年后，即1980年8月在格但斯克所发生的事记录下来。

在波兰统一工人党1971年2月6—7日的八中全会上成立的一个调查沿海地区事件的委员会收集过一大批材料，计有五卷之多。材料包括与事件见证人以及当时的政治领导人的谈话报告二十五份，书面声明二十六份。遗憾的是这些材料我们是不能查阅的。

因此，我们只能根据官方文件把其中对了解目前事件的根源和性质有价值的某些基本事实和评论作一些介绍。

关于十二月事件的过程及其性质，波兰统一工人党七中全会就作出过初步的分析。那次会是1970年12月20日召开的。全会选举了爱德华·盖莱克为新的党中央书记，取代了前一天因患心血管病而被送进医院的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斯坦尼斯瓦夫·科乔韦克代表政治局报告了沿海地区及波兰其它地区正在发生的事件。他是党的领导成员中第一个（12月14日下午）主动前往格但斯克的。他曾经是那儿的省委书记。

科乔韦克同志指出，工人的奋起——后来混进了一些社会上的其他分子——是一种本能反应的抗议。这种抗议长期以来随着生活条件的恶化，无视工人的意见，处理社会重大问题上的独断专行作风，领导和群众（包括党员群众）缺乏对话等等情况而日益高涨起来。

同一天，党中央第一书记爱·盖莱克在向人民发表的电视讲话中声称，党的责任就是要回答社会所关心的问题：今天的不幸是怎么来的，如此尖锐的社会矛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说："这将是一个困难的、自我批评的回答，但它将是明确和真实的回答。"

在1971年2月6—7日的党的八中全会上，这个诺言只是部分地得到了兑现。中央书记杨·什德拉克在会议一开始报告了题为“十二月事件的评价及其教训”的材料要点，这个材料是七中全会建立的一个委员会提出的。

向八中全会提出的这份材料列举了事件的可悲结果：死45人，伤1165人；治安机关在沿海地区总共抓了2989人，其中2843人在1月18日之前已被释放；仍然在押的人中，涉嫌抢劫者118名，袭击犯13名，纵火犯8名，非法持有武器者4名，犯有其他罪行者3名；物质损失：三联城(指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和索波特三个连成一片的城市)估计为1.05亿兹罗提，什切青为3亿兹罗提；烧毁公共建筑物19座，其中包括格但斯克和什切青的省委大楼；毁坏民用车辆47部，军用和警察车辆几十部；烧毁和捣毁商店220家。

材料指出，镇压的决定是第一书记个人作出的，甚至政治局会议也没有召开，而且从一开始就对事件采取了错误的立场，认为它是“反革命”的。第一书记以及克利什科、雅施楚克同志在12月19日以前决定的宣传方针也是如此。完全无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罢工和示威的直接原因是工人阶级不赞成大幅度提高肉价这样一个经济性的决定。材料说，错误的判断导致了“匆忙地大规模动用军队，而且几乎从事件一开始就下令使用武器”。

“沿海地区出现了不同的指挥中心使得情况复杂起来……如果没有行动上的不一致，使用武器的某些事件(尤其是在格丁尼亚)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存在着几个互不协同的指挥中心这个造成悲剧性后果的严重问题，无论在八中全会上，还是在后来，始终没有得到澄清。但是人们知道，当时有三位政治局委员各行其是：泽农·克利

什科，斯坦尼斯瓦夫·科乔韦克和伊格纳采·洛加——索文斯基，再加上军队的作战部主任格热果什·科尔钦斯基将军。12月15日下午，内务部副部长弗朗齐舍克·什拉赫齐兹也到了沿海地区。

八中全会的讨论于1971年5月在《新路》杂志的专刊上发表了，这是一场激烈的、意见对立的辩论。这场讨论提供了十二月事件的一幅宽阔的画面，尽管还并不全面，也并不紧凑。它分析了事件的原因，指明了摆脱社会危机的途径。被指责应对事件的悲剧过程以及经济政治危机承担大部分责任的泽农·克利什科和波莱斯瓦夫·雅施楚克也发了言。他们对会上摆出来的事实及其评价的确切性表示怀疑，但是并没有提出自己对事件进程及其分析的看法。共计有41人发了言，54名中央委员提出书面发言列入记录。

第一书记爱·盖莱克在闭幕词中指出，工人的行动并不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而且工人阶级拒绝了敌对势力塞给他们反社会主义口号的企图。危机的主要根源在于党的领导同工人阶级以及劳动人民的其他阶层的必要联系遭到了削弱甚至破坏。信任危机在党员中也加剧了。然而，批评的声音却被领导人看成是不满情绪而加以拒绝。爱·盖莱克在讲话中还强调了改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必要性，工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巨大作用，新闻报导和评论的内容范围必须广泛、报纸刊物应该成为就各种问题进行意见交锋的阵地、对群众说话所使用的语言应摒弃“空话连篇和官腔”。盖莱克保证说：“七中全会所作出的变革开始了政策、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的深刻转变。”

遗憾的是，从这个“开始”之后，众所周知，并没有跟着出现坚持转变的决心，而中肯的诊断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了。

党的领导并没有履行在政策的内容及作风方面实行深刻转变的诺言，也没有着手进行所宣布的经济改革。很快，政权再度官僚化，限制党内民主及一切形式的自治、缩小工会的本来就残缺不全的独立性的过程又开始了。在“加强国家权威”的口号下，行政机构的权力膨胀了，真正的社会运动消失了。党内讨论逐步消失了。其后果我们是知道的，至今我们还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不过应当承认，十二月事件的基本教训，即社会冲突应当以政治手段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一条，在 1980 年是得到了党的领导的遵守的。

党内和社会上要求完全澄清十二月事件的呼声在沿海地区（这是当然的）特别高涨起来。但是直到 1972 年 2 月 11 日才在格但斯克省委召开了有政治局委员瓦·克鲁切克和爱·巴比乌赫参加的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会上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八中全会为继续调查十二月事件而建立的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但是一些敏感的问题仍然被回避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个调查报告的文件并没有向与会者分发，只是作了口头介绍，并且规定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传达。

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瓦·克鲁切克报告了沿海地区三个城市的事件过程。

事件的某些参加者认为，克鲁切克的报告在有关事件的过程和性质以及一些具体人物在其中的作用等问题上的说法和在《新路》杂志上看到的八中全会的材料有所不同。

爱·巴比乌赫对会议参加者所提出的大量问题作了回答。

“我们不能感情用事，”他说，“我们不准备搞一次大规模的解释运动。我们只打算传达到骨干分子。克鲁切克的委员会是在八中全会上决定建立的，因为会上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关于事件的对立看法。委员会的材料证明了八中全会决议的正

确性。党的新领导一年来的工作也表明了八中全会的决议是正确的。在这期间党加强了和社会的联系，改善了经济形势，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紧张而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使我们已有了可能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

“沿海地区的事件，”巴比乌赫继续说，“是一种工人的抗议。但是从我们方面来说，如果只看到工人的抗议，而看不到纵火、抢劫等等，那也是错误的。”

巴比乌赫最后再一次强调，关于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和结论，“我们不打算广泛扩散。”

格但斯克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是在十二月事件过去14个月(!)之久才召开的。当然，在这之前，许多其它机构开过会，讨论过这个问题，例如1971年3月16日，什切青召开过五金工人工会地区理事会的全会。下面是会议记录的两段摘录：

“人人都必须同样地对错误承担责任，这一原则必须得到遵守。(过去我们往往因一点小小的过失就惩罚工人，而对于领导人员则采取宽容态度，现在情况仍然如此)。”

“部分发言者(大多是新选出来的工厂委员会的代表，非党人士)提出一种观点，认为工会不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工作。”

在后来几年里，“十二月事件”就不再在党的机构、工会组织和宣传工具中提起了。当初提出的一些结论也就无声无息了。十二月事件后的新领导是这样设想的，既然在物质上有了一定的改善，人们就会忘掉原先曾经强烈要求的改革了。然而被掩饰起来的现实总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过一定的时候，它又会重新显示出来，而且色彩更为强烈。让我们用具体事实来说明这一点吧。

1970年罢工工人提出的要求还是不算高的，而且几乎只涉及福利问题。下面就是1970年12月16日格但斯克船舶修理

厂船体车间工人提出的，用手写在一张纸条上的要求：

“1．取消加班工资的所得税；

2．将6月24日定为造船厂工人节，并定为假日；

3．提高工资20％；

4．1970年12月16日的工资照付；

5．取消表扬性奖金，将此款用于提高工资；

6．公布总经理的工资；

7．精简行政机构；

8．星期日上班除工资外免费提供伙食；

9．不能把我们和搞破坏的人混为一谈；

10．当天作出答复。”

可见，人们所要求的，只不过是略为改善一些、公正一些而已。他们没有盼到这些。而在十年之后，人们——不仅是这个造船厂——的要价就大大地提高了，以便在谈判中可以有所让步。对工人提出的要求以及向他们作出的诺言采取掩饰、回避、没完没了地拖延的做法，造成并且加强了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同政府达成的一切协议，如果没有切实的保证，都将一文不值。沿海地区的工人阶级得出了一条结论，这样的唯一保证就是独立的、自治的工会。

这个思想，1970年在什切青就已经出现了，尽管当时还没有得到最终的精确表述。那就是十八条要求的第一条（当时称作“什切青瓦尔斯基造船厂和什切青船舶修理厂职工要求”）。这一条的内容是：“我们要求解散从不维护劳动群众利益的工会中央理事会。我们要求建立由工人阶级监督的自治工会。”

此外还有几条要求（如取消党委机关和民警局的内部商店的特殊价格）和1980年的内容相似。但是在和政府谈判的过程中，这些要求后来被改得面目全非了。

十二月事件后几天，1970年12月20日在什切青签署了关于罢工的造船工人同该省党政领导达成妥协条件的“决定”。这可以说是1980年8月底政府委员会同格但斯克和什切青厂际罢工委员会达成的协议的一个最初样板。

十年前由波兰统一工人党省委书记斯·雷赫利克和省人民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文比茨基签署的那个“决定”共有十六条，其中三条的全文是这样的：

“1．我们向中央领导转达职工的如下要求：工会中央理事会及其各级机构在总结其迄今为止的活动之后，应在更大程度上处理劳动群众的各种问题并维护他们的利益。凡不适宜从事工会工作的声名狼藉的人，包括担任高级职务的人在内，应当离职。工会应当更好地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

“8．对于国家机关和经济机构中应对其所负责岗位上的恶劣工作负有责任的人员，不论他们担任何种职务，均应采取并坚决实行由具备更高业务水平和能力的人员来替换的原则。不能胜任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负责人员，应予撤换。”

“13．省的领导将作出一切努力，使社会对国内外的经济及政治形势有经常的、确切的了解。”

一年之后，结束罢工协议中的这些明确的、坚决的提法（尽管同工人最初要求的提法相比已经大大缓和）终于变得含糊不清，拐弯抹角，模棱两可了。十二月事件后，经职工选举担任工会职务的工人活动分子成了打击报复的对象。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试图撤销积极参与十二月罢工组织工作的格但斯克造船厂五号车间的爱德华·诺维茨基的工会车间委员会主席职务的事件。根据一份匿名的小报告，他被指控为“领空头工票”，即冒领工资。关于撤销诺维茨基工会职务的动议是由造船厂厂长提出的。问题提到了工人委员会和车间委员会特别会议上，厂工

会主席乌明斯基支持这个动议。但是，在这次会上（会议是在1971年1月27日召开的）这个动议遭到了坚决抵制。有十几个工人先后发言，他们一致为诺维茨基辩护。他们提出了有关诺维茨基的道德品质、工作表现、勇敢精神和为保卫工人利益而从事社会工作的热情等等事例的最好证明。他们指出，关于"领取工票"一事，是在职工和行政领导知情和默许的情况下早就实行并且相当普遍的一种做法，是用来补贴被选派担任社会工作的人的工资的一种办法，因为制度上并没有处理这个问题的明文规定。所有发言者一致谴责厂领导的居心不良和厂工会的派性倾向，还特别谴责了依靠打匿名报告的这种做法。

这起为报复十二月事件而炮制出来的诬陷诺维茨基案后来是如何了结的，从会议的记录上看不出来。但是记录的最后有这么一段特别精彩的记载：诺维茨基向与会者出示了几张剪贴得非常蹩脚的色情照片，照片上是他以明确无误的某种姿态和几个裸体女人在一起。这些照片，连同一些粗俗不堪的注解，被寄给了诺维茨基的妻子。十二月事件后民主选举出来的许多工会领导人的家里都收到过类似的信件。这些剪贴照片的匿名作者始终未被揭露。

工会中央理事会难道没有从十二月事件中吸取任何教训？难道对工人的批评始终充耳不闻？在口头上，是的，它是吸取了教训；但在实践中，很遗憾，并非如此。在1971年2月24—25日的工会中央理事会第二十一次全体会议上，瓦·克鲁切克说：

"工人的批评使我们看清了，在那些以其行为歪曲了社会主义思想的人的面前，工会没有真正尽到它作为工人和全体劳动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工人阶级事业的捍卫者的基本职责。

"……工会工作的危机，其根源在于社会主义民主不完善，在于党和政府的旧领导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这些问题在工

会工作中同样存在。盖莱克同志在党的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对这个问题作过明确的阐述。

“……工人们要求改善劳动组织，消灭停工待料，消除行政机构的臃肿现象，尊重劳动者的尊严。工人们期待工会将和他们一起，对于社会寄生现象、贪污受贿、搞宗派集团和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等等现象开展坚决的斗争。我们向劳动人民保证，我们将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铲除无所事事和社会寄生现象的每一种表现。

“……但是，我们也有责任指出，要求和愿望是有一个最高的界限的。凡是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共同责任的每一个劳动者是不应逾越这个界限的，否则就会有通货膨胀和破坏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危险。在市场上买不到所需商品的纸币我们是不要的，而这些商品必须由我们自己来生产。”

上面这些话，除了一个人名以外，可以不加丝毫修改地在事过十年之后的今天再重复一遍，而且确实是正在重复了。

就在这次工会中央理事会第二十一次全体会议的报告中，还有一些其它的批评性结论：

例如，法律保证的职工权利和实际执行有差距，而且差距不断增大的问题；

例如，国民经济的管理不善，往往建立在错误的设想和概念之上的问题；

例如，各级工会机构的领导和群众的联系削弱的问题；

例如，这些机构官僚化的问题；

例如，职工不满的原因之一是明的和暗的提高物价的问题；

例如，职工所批评的侵犯他们权利的事例，使规章制度适应工厂行政领导的需要的做法，在处理有关人的事情上的漠不关心，推脱责任和官僚主义态度等问题；

例如，没有向中央领导反映职工的真正意见、要求和情绪的问题。

工会中央理事会在十年前从十二月事件中总结出来的这样的结论还可以举出长长的一大串来。它当时表示深信，它将按这些结论去做，它将改正一切错误和缺点，它将把弯路修直。

这些结论、要求和想法在1970到1980的这十年里到底怎么样了呢？为什么到了1980年，关于工会问题的讨论又需要重新开始，而且可以用与十年前几乎一模一样的那些提法来发动这场辩论，尽管工会运动的组织状况已经完全改变。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回答这些问题不是本书的目的。我们不打算回顾十二月事件后的正确决定被逐步勾销的各个阶段，也不去分析专家治国论和狂妄的官僚主义的攻势。这个狂妄的官僚主义一面把成就的宣传挂在嘴上，一面却完全无视列宁主义的这样一条原则，即工会有保卫劳动群众利益以及不断纠正经济机关的错误和头脑发热毛病的绝对责任。

我们甚至也不提下一个阶段即1976年的一次社会危机，尽管它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插曲。那一年又一次爆发了大罢工，还是在沿海地区，而且工会的态度又一次与工人群众的利益和情绪大相径庭。

1976年之后，关于自由工会的要求已经具体化。两年后，一小群人越过合法的范围开始来实现这个要求了。他们成立了自由工会筹建委员会。

八月罢工期间，成立自由工会的要求被充分地提了出来。这里，让我们超越一下叙述的时间顺序，谈一谈在罢工日子里的一个情况。当时，在许多工人的讨论会上明确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捍卫职工及公民权利和利益的保证只能是独立于政权的、真正自治的工会。在和政府委员会谈判的过程中，关于这个工会

的设想又有了前进。最后形成的提法是"独立自治工会"。它的活动遵循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准则，它坚持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它承认党是国家的领导力量，承认国家的联盟关系的不可动摇性。

但是，八月斗争的背景要广得多。这里，需要引用波兰统一工人党格但斯克省委第一书记塔德乌什·菲什巴赫在党的八大会议上讲话的一些片断。他说："关于我省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党员们在总结——选举运动过程中已经纷纷指出。其范围之大、情况之复杂，需要由中央来作一个通盘的考虑。"

1980 年 8 月 18 日，在省委全体会议上他又说：

"当前我们所经历的社会冲突具有一种戏剧性。它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冲突的根源在于劳动人民对生活条件和国民经济的领导方式的强烈不满。虽然十二月事件后我们党的全部政策正是为了实现人民在这方面的期待和愿望。

"……应当公开指出，我们与社会对话的内容、形式和所使用的语言，往往和对方的看法和感觉背道而驰，往往更多地是体现了我们自己的愿望，而不是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想法、需要和问题的反映。

"……要确定由于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各种机构的工作缺陷而造成的后果的严重程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明显的是经济后果：欠外债，价格和工资螺旋形上升，市场供应严重不足，经营效果日益恶化，许多家庭生活困难，等等。由于社会政治生活不正常而出现的其它一些消极现象也严重起来了。这一切归结起来，就是要求更公正、更诚实、更坦率、更公开化、更多的负责精神。

"此外，还暴露出我们和社会缺乏真正的对话。对待人，包括对待党员，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切实的讨论不见了，形式主

义的做法盛行起来，不重视自下而上的活动，向社会报导情况的制度有缺陷，对社会现象不再采取科学的即批判地理解和解释的态度，所谓的忌讳问题日益增多，以致把思想划分为'官方的'和'私人的'，出现了所谓'官方的乐观主义'，教育制度也存在弊病，等等。

"强调集中制的结果，是把十二月事件后好不容易恢复起来的政府和社会的联系又给破坏了。"

够了。还可以加上许多，不过我们不想过多地停留在分析十二月和八月之间的这段时期上。这是一个放过了巨大机会的时期。现在该来叙述又一次开辟了巨大机会的那个事件了。谁能知道，再过十年之后，人们又将会怎样来议论它呢？

八月十四日，星期四

1980年的8月中旬。

这是一个多雨的、阴沉的夏天。就社会气氛来说，这是一个很热的夏天。

从七月初开始的几个星期以来，在全国各个城市、各个地区的许多工厂里开始发生动乱。罢工（一直被称作"停工"，好象这个吞吞吐吐的字眼可以糊弄什么人似的）一般是短暂的、犹犹豫豫的。从华沙开始，接下来是特切夫，然后又蔓延到米耶莱茨和罗兹，到了卢布林就闹得更凶了，然后又回到华沙。首都的居民在看到停驶的公共汽车和电车的时候，还带着一种看热闹的好奇心。他们还不知道这是一场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外部信号。每个人都已意识到，经济情况不妙，而且越来越糟，商店门前的队伍越来越长。但是真正了解这场危机深度的人还为数不

多。电视上是一片乐观景象，小车走得很好，牛肥马壮，人心舒畅。只是自然灾害，暴风和洪水在和波兰作对，给全国人民的奋斗带来干扰。然而，在某些报刊上，一些领导人在内部会议上的讲话里，时而也出现了诸如“不平衡”、“困难”，甚至“严重困难”等字样，还谈论起什么“失调”等等，不过这些警告却都是用一层豪言壮语的软垫包裹着的。

在波兰的一些地方，开始发生整个车间、甚至整个工厂停工的事件了。

直到卢布林发生的“停工”，因其规模之大，才使人们大吃一惊。为什么恰恰是卢布林？人们感到奇怪。空气中已经闻到一股什么味道了。卢布林铁路工人的抗议规模之大，气氛之激烈，使得华沙的一些办公室里开始忧心忡忡地议论起来。而在波兰全国，人们从小道消息中得知，谁罢工，谁就能多拿钱。这当然是为罢工做了很好的广告。到处都知道，在某些工厂里罢工之后，职工们选出了新的代表，罢工委员会并没有解散，而是在监督厂领导对所作承诺的执行情况。这真是事态发展中的重大新闻。

全国各地的这些反映也传到了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而且在这里遇到了特别合适的土壤。原因是多方面的。对十二月事件记忆犹新，这是一。在“列宁厂”里围绕这个主题几乎产生了一套工人神话，而且生动得很。人们在悄悄的、甚至大声的议论中，不知多少次地提到，要为死难的造船工人建立一座纪念碑。可是“上头”却千方百计地想使人们忘掉这次事件。1976年，造船厂也发生过相当大的罢工，尽管当时人们谈论得更多的是拉多姆和乌尔苏斯（拉多姆——在华沙以南100公里处，是拉多姆省的省会。乌尔苏斯——华沙附近的一个工业城市，波兰最大的拖拉机厂在此——译者注）。沿海地区有自由工会的幼苗

(当然是非法的)在活动，总共才几个，或者十几个人。其中有几个原来是造船厂的职工，那年罢工之后被开除出厂并且遭到迫害。他们的悲惨遭遇，造船工人都很熟悉。它激起的反应是一种愤怒、同情和恐惧的混合物。

沿海地区还是“青年波兰运动”的全国中心之一。很少有人对这个尚属非法的组织有更多的了解，但是即使是它的活动也引起一种期待：“要出事”。沿海地区，包括造船工人中间，流传着各种地下出版的传单、印刷品、刊物。格但斯克同全国一样，痛感供应不足，尤其是肉类。另一方面，在格但斯克可以更多地见到来自那些没有肉食紧张和诸如此类麻烦的国家的旅游者和海员。通过这个“观察世界的窗口”，看到的东西比起譬如说在比亚威斯托克(波兰东部紧靠苏联的一个省的省会，是波兰一个比较落后的地区)这样的地方来要多得多。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情况也往往使人对国内情况产生不太正确的看法(确切说是不能正确理解)。它容易混淆两边的好坏事物的比例。

造船工人又有他们额外的困难和不满的理由。停工待料是经常的事。这里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是要规定新的劳动定额。这样一来，工资就要下降或者使本来就很繁重的劳动还得增加强度。造船厂里还有一种说法(很难核实，是否当真如此，但这种看法是有的)，说是在这里干够了年份而退休的职工，很快就会用不着国库来负担了……(意思是说造船工人平均寿命短——译者注)。

暂时还没有罢工，只是有一种闹哄哄的，普遍的不满情绪。但是省里的同志们相互之间已经不再问“会不会?”，而是在问“什么时候?”了。大家都明白，既然罢工的浪潮席卷全国，那它总要奔流到海的。而当它一旦来到，必然是轩然大波，因为它将是一个“回浪”，是裹着这个地区长期积累下来的一大堆麻烦问

题的回浪。

不是今年夏季就是今年秋季的某一天，格但斯克造船厂总会发生罢工的。但是为什么恰恰是在8月14日这天开始，这就很难说了。这一天并没有什么具体的原因，也没有发生什么鼓动和挑起罢工的“诱发事件”。尽管有几个或十几个青年人确有在这一天发动的计划。但若是认为就是他们，这一小撮人竟能在一个有着一万多人的厂里“制造”了这次罢工，那就太天真了。这些青年人，每人所认识的并能得到他们支持的只不过是职工人数的百分之几，甚至千分之几而已。假若不是在一部分车间（特别是工作最重的车间）里早就埋下了“地雷”，几个月来已经在“嚷嚷”的话，光是这根“雷管”的火力那是太不足了。何况在其它车间，如同全国各地一样，抗议的理由是够充足的了。

列宁造船厂罢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在场，而且我们也没有遇到一个人（这样的人恐怕根本没有）能够原原本本地讲述罢工究竟是怎样开始的。我们只能介绍两位罢工参加者的谈话，是由罢工新闻公报《团结报》的记者整理发表的。它们对于“究竟怎么开始的”这个问题还不能说是一个完整的和客观的报导，因为这两位罢工发动者中的每一个也仅仅接触了那天所发生的事件的一部分。不过我们认为，这两份材料还是较好的反映了罢工“发生”时的气氛。

问：“罢工是怎样开始的？”

答：“我们和博格丹商量好了，1980年8月14日那天我们提前一个小时来上班。我们要在更衣室张贴关于抗议解雇安娜·瓦伦滕诺维奇以及要求提高工资1000兹罗提和实行涨价补贴的标语。标语是“青年波兰运动”搞的，共有七张。我是第一个到的。过了一会儿，卡齐克来了，他是我前一天约好的。卡齐克是第三车间的，所以我们先去他那个车间。我们把标语贴

在大钟下面。卡齐克和几个伙伴留下来看守，以防有人撕掉。这时我回到车间等候博格丹，但他迟迟不来，我就决定自己先动手。我用丁二烯橡胶把标语贴在更衣室门上，然后又去别的更衣室。在我贴标语的时候，人们都向我致敬。”

问：“人们是不是感觉到了要罢工？”

答：“没有。不过事先我们曾经通知过一小部分最可靠的人，但一到早上，造船厂里已经在谈论罢工了。人们的反应怎么样？好，很好。人们向我们提出各种问题，想了解详细情况。人们已经开始一群一群地集合起来要见工长。我于是向大家报告，整个造船厂已经开始罢工。我们都到广场去集合。工长们看到那些标语了吗？那当然，所有的人包括干部们都能看到。领导人有没有采取什么反措施？没有。因为在标语周围已经形成了人群。他们不敢干涉。尽管这样，最初的15分钟是相当紧张的，工长们还是干涉。我就跑到一个我熟悉的班里，开始向他们解释，我们为什么而斗争。大多数人是赞成我的。工长们预感到要出事，根据他们的请求，我们走得远一些，在焊条仓库那儿集会。过了一会，形成了一个三十来人的人群。一会儿附近出现了第二个人群，就在工具间更衣室旁边。为了怕人群走散，我跑过去对他们大声说罢工的事。人群已经有五十人左右了。我们做了一条横幅标语。这时候巴尔茨主任来了，他问是怎么回事。我说：‘主任，罢工了。’‘为什么罢工？怎么回事？’我回答：‘怎么，您不识字？’我把标语指给他看，还给了他几份《工人报》（地下刊物——作者注）以及关于安娜事件的声明，然后我就去召集人们。我回来的时候，车间党支部书记玛祖尔凯维奇来了，他想把横幅拿走。小伙子们比他快了一步，阻止了他。书记嚷了起来：‘这是要干什么？’人们回答说：‘这事您管不着……’书记走后，我拿起横幅带着小伙子们到了广场。这一切都是

在下水车间的场地上发生的。人们分散地坐在广场上。突然，车间副主任布雷奇科夫斯基来了。人们劲头来了，都站起来向广场中央集中。其他人也开始加入进来，人群已经集中得相当多了。这时候，响起了吊车鸣笛声。电笛不大，是尤泽克按的。主任开始火了。'这儿要干什么？'他喊了起来，'都干活去！'但是没有人听他的。有人向他喊道：'你看看标语，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一辆机车开过来，在我们跟前停了下来，开车的人向我们鼓掌。我带着广场上的人群来到了半成品车间。越来越多的人从车间里跑了出来。一会儿，工长们出来了，开始把人们推回车间里去。但是，车间里已经停止干活了：人们放下锤子，收拾好工具，加入到我们的队伍里来了。"

另一位的报告说：

"我是四点一刻到的造船厂。直到罢工的这一天以前，我没有向任何人说过要开始罢工的事。我们那儿党员占多数，我担心会有人走漏消息，罢工可能就搞不成。所以我一直等到最后一刻。罢工的那天，我和卢德维克约好，叫他等着我。我们车间就我一个。我贴了七张标语，还有五张给了卢德维克。贴过标语之后，我就准备传单。一共有五百张。凡是进更衣室的人，我每人发给一张，并且说：'给你，看吧，今天全厂罢工。'传单上写的是罢工吗？没有。但是前一天我曾经问过一些信得过的人，如果开始罢工，他们怎么样。其中许多人表示说他们将参加罢工。现在我就把传单给这些人，对他们说：'向大家散发'。

"六点差一刻的时候，更衣室附近已聚集了不少人，大约有三十来个。有几个人害怕起来了，他们说：'这事搞不成的，干吗那些大的车间不先干起来？'我们告诉他们，船体三号、四号车间都已经罢工了。一会儿有人说：'我们别站在这儿了，回车间去吧。'我尽量劝阻，但是我孤身一人留不住他们，大家已经开

始往车间走了。我知道，我们一回到车间，那里有工长们，还有党支部第一书记，中央委员杨·瓦本茨基，那就一切都完了。人们已经站到机器旁边，而且开动了机器。我过去对他们说：'我们大家到船体三号、四号车间去，他们已经停工了。'我这是把话说在前头，因为实际上我还什么也不知道。我只是要把人拉走。终于，他们下了决心。'那就去吧！'可是在关掉机器的时候，还是磨磨蹭蹭的。最后还是出去的愿望占了上风。我们集合了大约三十来人就走了。我带上了横幅标语，有两个人打起一幅走在前头。我们到了食堂，然后又继续向前，走遍全厂。人们从四面八方出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就向他们喊：'关上机器，跟我们走！'不少人参加了进来，我们过桥的时候人就更多了。在船里的人也走了出来。他们也已停工，但还没拿定主意是否参加进来。他们说：'活我们不干了，不过现在我们还不能跟你们走。'很明显，他们是害怕。我们到了船体三号车间，看到那儿已经集合了一堆人，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鼓舞。我们已经可以肯定，这下子有门儿了。于是我们向他们欢呼：'乌拉！'有人从设计室的窗口探身张望。在三号车间前面已经集合起一大群人了。一大群，那就是说超过一百了？是的。我想让人向他们讲讲话，这样就能把人们稳住，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了，得继续朝前走。我们一直走到造船厂的尽头，厂长已经等在那里了。他的头一句话就是：'这是什么意思？'我说这是罢工。'为了什么？'我说为了安娜·瓦伦滕诺维奇被解雇的事。'安娜·瓦伦滕诺维奇？'厂长说，'你们知道她是什么人吗？她是受纪律处分被开除的。'我说：'怎么可以开除这样的人呢？她得过铜质的、银质的和金质的奖章，三十年的工龄，只差五个月就可以退休了。'厂长正要找话辩论，博格丹说：'我们现在先不跟您谈，我们走。'我们把厂长留在人群里，到了桥上，我们派几个人

留下看守，以防有人把退路堵上。这时候队伍里的人越发多了起来。我们走到大门口，在那儿向1970年牺牲的人默哀一分钟，接着大家唱起了国歌。”

这就是两位组织者讲的罢工开始的情形。

事情肯定就是这样的。几千个早班工人决定停止干活，离开自己的岗位，开始占领性罢工，而且没有以任何形式事先通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是的，横幅有人做，有人拿，要求提高工资和恢复安娜·瓦伦滕诺维奇工作的传单有人印，有人发。但是可以说，决定这次罢工的，并不是几份传单，几条横幅，也不是几个组织者。它的原因要广得多，严重得多。后来的那些日子以及所签订的协议都证明了这一点。

在二号大门口，聚集了几百名造船工人，他们唱起了“波兰没有灭亡……”（波兰国歌的第一句——译者注）造船厂的吊车司机从那高高的操作舱里看到，全厂已经停工。这次可不仅仅是那些通常发起停工的船体工人，那些大多是进厂不久、不满情绪最大的小青年。那些人在露天工作，既受班组长管，又受老天爷管。无论是太阳晒烤的夏天还是寒风凛冽的冬天，这里都是不安全的。你一摸钢板，就有发生事故的可能。条件的艰苦养成了他们语言的尖刻。要是加班赶起任务来，那地方人都站不下，互相碰撞，互相拉扯，互相碍事。他们不听警告，事故不断。要是他们停工，象几个月前就有过的那样，那还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是只有他们自己。可要是船舶设备班组也参加了进来，那可就“是一件事”了。搞船舶设备的都是些比较好的专家，他们很看重自己的工作。他们要是从船室、船舱、船桥、船梯上统统走了下来，那一下子就是好几百人。那就是说——高高在上的吊车司机在心里琢磨——这“是一件事”了。他居高临下，瞧着各个车间，瞧着工具车间工人，瞧着发动机车间工人。

喔，这些人可是造船厂里的贵族。他们级别高、工作好，他们有现代化的机器，工龄补贴多。他们互相尊重，也尊重自己的工作。他们可不想丢掉这样的工作。他们还得对付别人呢。所以，当这位司机从他的鸟窝舱里看到，连这些人都关上机器走了出来，他也就收拾好吊车，爬了下来。他不会再上去了。肯定有事，而且事情可大了。

这次的情形就是这样，不过当时并不象我们现在谈起来那么简单，那么平平稳稳就是了。那是一片喧嚣、嘈杂、混乱、推推搡搡。并不是所有的人一下子就下了决心的，有二、三个人还想干活。那就得把他们的机器关上，然后还得盯着。既然大家干，那就大家都得干。

年纪大点的人在想，让年轻人跑去吧，我们已经跑够了，游行也游够了。但是，时候一到，每人头脑里一切都分明了，好的、坏的都清楚了。肯定是什么东西占了上风，什么东西戳到了人们的痛处，使人们家也不顾了。人们咬紧了牙，握紧了拳。到了这时候，一场厉害的罢工就来了。

从大门口回来的时候，人们更坚决了，劲更足了。人们在离工厂医院几十步远的一台挖掘机旁停了下来，有几个人爬了上去。

“我们罢工了！他们赶走了瓦伦滕诺维奇，必须让她回来！”

“我们要团结一致，成立罢工委员会！大家把信得过的人提出来！”

“我们要建立纪念碑！”

一群群造船工人站在厂部大楼门前和厂部到大门口的路上。总经理克莱门斯·格涅赫带着一批人穿过人群向挖掘机方向走来。人群闪开了一条路。有人伸出一只手，帮他爬上“讲台”，他开始说话：

“我们可以谈判，但这用不着停止工作。大家都回车间去！”

这时候，从他背后冒出一个人来，他就是瓦文萨，是翻过了一堵4米高的墙进到造船厂里来的。

“您认识我吗？我在造船厂干了十年。可是十年来我就回不了这个厂！我失去了工作！可我感觉我还是一个造船工人。这回，我就留下不走了，我有职工们的信任！”

这些话引起了人们的欢呼。

“我宣布实行占领性罢工！”瓦文萨大喊。

“乌拉！”响起一片有力的喊声。有人要求用厂部的车把安娜·瓦伦滕诺维奇接回来。经理同意了。这次集会就结束了。这一天，这样的集会有多起。我们叫它“集会”，因为全是单方面的喊叫，是不能称之为“谈判”的。这种情况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高兴的。经理不是说了吗，可以谈判，干吗非得罢工？如果谈不成，再罢工也行嘛。这种意见最后没有占上风。罢工继续进行。安娜·瓦伦滕诺维奇已经回到造船厂。同意让她回来，而且她现在就在罢工工人中间，这个事实鼓舞了大家的斗志，也显示了罢工的威力。职工们为瓦伦滕诺维奇的事斗争了许多次，几个月前就有过一次。瓦伦滕诺维奇在造船厂工作了30年，开头是个焊工，后来又当过天车司机。在50年代，她是劳动模范。就在那个时候，有一回她在生产会议上发了一次言。从那以后，她和领导的关系就不好了。1968年，有一个工会干部挪用三千兹罗提的补助费去买彩票，结果输掉了。瓦伦滕诺维奇给电视台写了一封信揭发这件事，结果她所在的车间工会干部建议将她解雇。职工不答应，但她不得不被调到另一个车间去。1970年占领性罢工的时候，她在船厂食堂工作。1971年1月她被选为职工代表去见盖莱克。他们正要到华沙去，已经上了汽车才知道，盖莱克已经在格但斯克。他接见了一小批职工代表。第

一书记讲话之后，代表们纷纷发言。他们谈得很坦率，要求释放被捕人员，提供全部死难者名单。他们谈了住房缺乏，工资和奖金制度，物价等问题。总理告诉大家，奖金制度将由他们自己制定。什拉赫齐茨保证说，被捕人员已经全部释放。这不是事实，一位代表当场列举了仍然被关押着的人的名字。于是立即进行了交涉，结果把人全放了。最后盖莱克说，他的目的就是把波兰的事尽量搞好，等把国家搞好了，他就引退。他说，他要开这个自动辞职的头。这时候响起了"我们来帮助"的著名口号。到1971年5月，列宁造船厂为合理分配奖金的事又举行了罢工。

后来几年，安娜·瓦伦滕诺维奇不断遭到打击。她被分在落后的班组，两次调动工作，一次是厂部决定，一次是她自己要求。1978年夏天，瓦伦滕诺维奇和刚成立的沿海地区自由工会筹建委员会建立了联系。经过一年的工作，她成了一名全权筹建委员。1980年，厂部没有少给她小鞋穿。到了8月，瓦伦滕诺维奇终于被开除了。这次罢工的主要口号之一就是恢复她的工作。

现在，罢工委员会负起了全厂的责任。它下令禁止喝酒，清除厂内一切藏污纳垢的角落，建立罢工纠察队。它必须保护工厂的财产，防止罢工期间发生挑衅事件。要做到这些是不容易的。造船厂很大，它有几公里长的围墙，几个大门，还有生产车间，吊车，还有岸边地带，船坞，船体以及正在保修的船只，等等。

这些在罢工中担任工作的人，这个阶段他们自己并不是在罢工，而是在保护罢工。一批情绪激动，总是不满的人吵吵嚷嚷地跑来跑去。他们要求更多的东西。他们是发动机，他们暂时还决定着事件的速度。

"把设计室的人扣起来！"

“还有厂部的人!”

谈判在各个不同的阵地上进行着。不仅仅是跟经理谈，这当然是最重要的。积极分子们揪住主任，班组长不放，搞围攻，根本不让他们说话，好象是在闹着玩一样：吓唬他们一下，看看他们能坚持多久。如此而已，可绝对没有让他们受委屈的意思。

行政人员们感到惊恐。这叫罢工？这叫谈判？一些工人也有反感，尤其是那些“贵族”。他们知道，占领工厂本身就已经使他们有了雄厚的力量，用不着用凶狠、粗野的动作来助威。

罢工委员会心里明白，过于文雅是不行的。必须从心理上激发人们的坚定和无情，这些都还是有用的。这里青年人数量最多，也最为积极。他们看事情最富批判眼光。他们在生活上立足未稳。他们对这些年来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感触最深。对他们起最大推动作用的是感到没有指望。住房，更好的生活，全都没有指望。他们和现代化的技术打交道，他们身处港口，对外部世界有所接触。他们看不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而且也看不到将来会有。

罢工者和经理的谈判在这种不利于谈判的气氛中进行着。他们要求恢复安娜·瓦伦滕诺维奇和莱赫·瓦文萨的工作，建立十二月事件殉难者的纪念碑，每人提高工资2000兹罗提，按民警同等条件提供家庭补贴，保证罢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今后的安全和能安心地劳动。

莱赫·瓦文萨，1970年罢工委员会的委员，曾经被迫离开造船厂。他当时并不是起首要作用的人物。不过在罢工之后，他的劲头还是太高，而上级最关心的则是把十二月事件从人们记忆中抹掉。瓦文萨难于找到工作，尽管到处都缺少他这一行的专业人员。他是一个电气安装工，最近几年又干起了汽车电工。现年37岁。他只要在什么地方一开始工作，无穷的好奇、

怀疑就紧盯着他，“保护人”也就随之出现。他多次被拘捕，多次被登门查询。他有六个孩子，最大的11岁，最小的在罢工爆发前一个星期，即瓦文萨还在押的时候，刚刚出世。他在电气安装厂工作过很长时间。“保卫工人委员会”成立以后，他得到了一些帮助。他是沿海地区自由工会筹建委员会的成员。现在，他在他的老单位里被选为罢工委员会的主席。

第一个罢工之夜很冷。谈判持续到深夜。人们各想各的办法来找地方睡觉。更衣室的柜子之间，车间的角落里、铁板上、木板上。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一夜似乎过得挺快。

八月十五日，星期五

今天，三联城的居民们都被罢工震惊了。公共汽车、无轨电车都没有上街。没有准备的居民们上班都迟到了。食品商店门前排起了长队。凡是能买到的东西，人们争相购买储存起来。不安的情绪在增长，旅游者开始纷纷离去。到了中午，格但斯克市和国内其他地方的电话电报联系也中断了。这更加深了人们的担心和不安。这种混乱和紧张在格但斯克是第一天，也是最后一天。以后几天，市民们心神定了下来。他们知道，要去上班得花更多的时间。当局也努力使基本商品不致缺货。罢工的人也明智地作出决定，哪些人可以在罢工期间照常工作。

公共汽车车场的大门已被横着停在那儿的汽车挡住。在服务大楼前的广场上集中着好几百人。大门外是带着吃的东西的罢工工人家属。单位里没有食堂，所以得弄一些夹肉面包，保证小卖部的供应。设在一辆汽车里的罢工委员会对一切事情都得作出决定。他们得研究吃饭问题，车场的安全问题，一直到如何

提出要求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提高工资，是的，但是怎么个提高法，提高多少？司机的收入包括几十个不固定的项目，总数加起来高于基本工资。领导在这些项目上可以耍花招，所以得设法加以简化。他们要求提高基本工资，还得研究如何防止那些不合格的车辆投入运行。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是在拚死拚活地蛮干。一个电瓶往几辆车上装，只要能开动就行。要拚凑出一辆好车，得拆十辆破烂车。我们这样死命地干，结果却挣不到钱。这不能不改改了。就得要求：没有电瓶就罢工！没有基本零件，就罢工！不这样不行。我们并不是落后得连零件也搞不出来。没有零件完全是不象话！"

"要是再这样下去，那我们罢工就一直罢下去，直到汽车能在城里开动，而不是停在场里。也不能光让我们拚死拚活地干，也得让我们挣工资。"

经理说，有没有零件，这并不取决于他。"你没听见电视里说，全国都缺吗？"

人们马上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

"罢工不是针对经理的，是针对经济中的混乱的。汽车公司的经理没有电瓶，这怎么能行呢？罢工也是针对经理的，如果他们自己在那儿增加混乱的话。其实厂部自己早就'罢过工'，上次碰到百年不遇的寒冬，说是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做不到。那时候大雪帮他们说了话，什么都解释过去了。可是现在呢？大家都看到，阳光明媚，而我们出不了车。"

在列宁造船厂、巴黎公社造船厂、修船厂和北方造船厂，当厂长们呼吁工人上班的时候，差不多全是这样回答他们的。

"在座谈会上我讲过，在各种会上我嗓子都喊干了"，一个罢工委员会的成员说，"可是没人理睬。他们连想都不曾想过，

要不要把所讲的事研究一下。这种言论自由对我有个屁用。几千几百的人在说话，而几个人装着在听的样子。即使我讲完后把我关起来，把我开除出党也好。可就是毫无下文，就象话是说给墙壁听的。结果只有一个，我不说话了。这回我们可绝不让步了！”

列宁造船厂罢工的第二天，和厂部的谈判已经深入了一步。不仅谈了要求，也谈了生产组织、整个经济状况以及没有兑现的诺言等等。这时候在北方造船厂里，罢工还刚刚开始。

上午7时，300多人集合在调度室门口。集会是乱哄哄的。人们叫嚷着宣布开始罢工。人们不愿意和厂工会主席及党委书记谈判。船体车间的青年职工从铁路门进入列宁造船厂，这里的罢工委员会在最初几个钟头里成了他们的依靠和智囊。总经理格涅赫把他们赶了回去。

“你们有自己的厂长，你们的事情到你们自己那儿解决去。”

他们回去了。厂长同意在俱乐部和罢工委员会见面，并通过广播站转播谈判实况。厂长已经知道昨天列宁造船厂的罢工情况，所以对谈判是有所准备的。关于提高工资的要求，他已经有了答复：政府同意在造船厂实行五级工资制。根据这个办法，每个人增加的工资数不是大家所要求的每人二千兹罗提，而是一千多。同时还算出，厂里每月挣一万三千兹罗提以上的共有270人，这个数字包括基本工资、各种附加收入和加班费。一般说，月平均工资合计不超过一万兹罗提。应该说，这个数字不低。不过光靠八小时工作还达不到此数，必须加班才行。

他们不是在谈判，而是在开群众大会了。对什么事不满意就吹口哨，要求却不提。谈判只是喊口号：要求恢复三个人的工作，每人提高工资二千兹罗提。为什么是二千？说不出个道道来。恢复三个人的工作的要求也不能使人人信服。其中有两

人确实是因为散发《工人报》而被开除的，可是第三个人，一位电焊工却是由于工作马虎造成了一次损失几百万兹罗提的事故而被开除的。可是人们说，和厂领导的错误及其造成的经济损失相比，这个人的过失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

"多少财富扔在泥里了？"

"我就要退休了，可住房始终没有。我住招待所却又被赶了出来！"

谈判陷入僵局。厂领导在办公楼里固守。罢工的男人们要求妇女给他们做饭。她们抗议说，罢工就是罢工，不能干活。问题提到了罢工委员会。委员会决定：人人都得动手削土豆、切面包。人们对这个决定又有意见。和厂领导谈判固然困难，自己相互之间也并不好谈啊。

在列宁造船厂里，罢工委员会控制着局势。正在讨论所提要求的清单。同昨天相比，增加了自由选举工会的权利。厂领导建议，除罢工委员会之外，吸收各车间代表参加谈判。同意。不过这些人不太坚决，容易被厂领导说通，容易相信厂领导的保证。提出建议的人为什么这么做，他心里明白。后来，参加谈判的有表决权的人数进一步扩大，又增加了几十个人。这次则是罢工委员会建议的了。双方都在施展策略，既要对自己有利，又要为对方所能接受。谈判在进行着。

对经理发言的诚意和当局意愿的信任被昨天"国际通讯社"发的一篇公报打破了。公报对造船厂罢工仍在继续的消息进行辟谣。

"今天的情况倒确实如此，"有人笑着说，"因为罢工不仅仅在我们这里有。"

船厂在闹事，而大门口那儿整天有一大堆人陪着。都是些妇女、姑娘。她们带着一包包吃的东西和暖和的衣服。在大门

里边站着的造船厂职工们很乐意地告诉我们，广播喇叭里谁在讲话。船厂经理、书记、瓦文萨，还有参加谈判的其他许多人的声音他们都听得出来。

在讨论修建纪念碑的要求时，人们心情最为激动。

“已经答应了十年了。还能叫人相信现在会造？除非我们夜里把它建造起来。”

“这纪念碑建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问。

“这里，就在大门前面。最初他们想在这块地上盖一个贸易大厅。已经挖了沟，打了地基。我们不答应。他们又砌了个新的围墙，把这块空地圈在厂里了。这儿，这些沟是在挖一个新的停车场的地基。将来把贸易大厅的地基一平，就是一个停车场。他们在玩花招，想弄得纪念碑没有地方可建。你们写吧，就说我们不会忘记的。上次周年纪念的时候，在最高的那个烟囱上挂起了志哀的旗帜。这是很危险的，但是有人上去挂了。他们费了多大劲，想叫我们忘掉，但这是不可能的，造船工人的记性好着呐！”

三号门那儿也有转播喇叭，可以听到谈判的实况。一个带着罢工纠察队红袖章的青年工人在向我们解释他们所建议的提高工资原则。工资不足五千兹罗提的提高两千，不足一万兹罗提的提高一千五，不足一万三千兹罗提的提高一千，一万三千以上的不提高。除此以外，还要求涨价补贴。

他说着停了下来，和另一名纠察队员喊住了一个从厂内电车那儿过来的、背着一个运动包的男人。他们查看了包里的东西，说了声对不起，放他走了。

“你们查什么东西？”

“有人出于好心，往造船厂送白酒，我们得看着点。”

造船厂的围墙上，每隔几步坐着两、三个带红袖章的工人。

临街的一面，有人在打扫废纸和烟头。白一红的国旗和白一蓝一白的造船工人旗在飘舞。砖墙上写着标语："人民和造船工人在一起，造船工人和人民在一起！"，"站到我们中间来！"，"给政治犯以自由！"，"造船工人不可侮！"，"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你若同我们站在一起，就停止工作吧！"，"我们要面包！"。这最后一个口号第二天就被抹掉了。还有几个也抹掉了。据说还出现过带着皇冠的鹰，工人们立刻把它们冲刷掉了。沿着停车场和大门，看热闹的人的汽车排成长蛇阵。开车的人非常想停下来，但是纠察队不让。他们只放港口来的煤汽车和运输公司的车辆进厂。上面开过的电车响着笛声吸引人们的注意。总有人朝他们招手。他们和罢工工人是团结一致的。格丁尼亚的"巴黎公社"造船厂也开始了称之为"中国式"的、坚决的罢工。

来自"巴黎公社"造船厂的一些离奇的消息传到了城里，传到了各个单位。说什么那儿把所有的党员驱逐出厂啦，他们决定搞什么维持法庭啦，他们把技术监督人员赶走了，等等。许多人认为，有关罢工命运的最大危险当时就在格丁尼亚。不过很快就发现，这些消息是不真实的。后来事实也证明如此。

在那儿领导罢工的是安杰伊·科沃杰伊，一个二十岁的造船工人。他在格但斯克干的时间比在格丁尼亚要长。他只是两天前才到"巴黎公社"造船厂的。他是抱着"碰碰运气"的心情向人事部门提出申请的，他自己也不相信能被录用。因为他的档案里有一个大污点：因为参加自由工会运动，散发《工人报》而被列宁造船厂解雇。不知是怎么搞的，他被录用了，结果一进厂就搞起了罢工。城里很多人有意见，认为他太年轻了，和这样的小孩子能谈些什么？他能担当和政府谈判的对手吗？但最终人们还是认为，既然罢工的有几千人，而这几千人把科沃杰伊当成自

己的领袖，那就得这么办再说。至于他的威信究竟是实际的、真正的威信，还是自封的，得到罢工之后再看，而且将由那些在罢工期间跟着他走的人来决定。

八月十六日，星期六

这是一个戏剧性的日子。上午9时。通往造船厂二号门的狭窄的路上，熙熙攘攘，人们用砖头和木板搭起了临时的板凳。有人带来了旅行马扎。旅游者倒也真有，他们走来走去，衣服与众不同，在这里显然不合时宜。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匆匆忙忙地走得最早。剩下的人通过广播站的广播好象也是在参加罢工者与厂领导的谈判。在这儿听会的人大都是男人。妇女们沿着铁栏杆各自和栏杆那边穿着蓝灰色工作服的丈夫或小伙子面对面地站着。从他们的手势、表情看，她们也很难理解。也许是妇女的直觉在劝说人们去干活，劝他们"算了吧"，但妇女的责任心和对自己男人的信任又让她们送来了装满食品的篮子、暖和的衣服、香烟，还有——如果弄得到的话——报纸！这几天里报纸卖得象流水一样快。报亭前面的队伍可以同食品商店前面的队伍相媲美而毫无逊色。也许买牛奶和面包的队伍更长些，总之是没法分个高下。报纸是大家传着看。今天星期六的《沿海之声报》出于大家的意料，这个周末刊昨天就出版了。在"沿海地区目前形势"的标题下，确有东西可看。

往三号门走是一道砖墙，上面是电气火车站的天桥。天桥上，大门口全是人。罢工纠察队在维护线路畅通。他们向在这儿停下的司机有礼貌地打招呼：请开车，我们请你开车。他们把大门前站在马路上的人推到人行道上去：我们负责维持秩

序，我们必须做到无可指责，使谁也抓不住什么把柄。

从造船厂广播站里听到的罢工者和厂领导的谈判，正谈到罢工结束后对罢工委员会成员和车间代表的安全保证问题。一个纠察队员告诉我们说，五号车间的一位代表建议到星期天，就是18号以前暂停罢工。经理马上抓住了这个建议，说是这样他就有时间仔细地研究各项要求并作出具体答复。但是建议没有通过。

“您过来一下……”纠察队的两个小伙子叫住了一个男人，把他带到墙边。他们查看了那人皮包里的东西，客气地向他表示歉意。

这样的场面很多。没收酒的情况也不少。这时候连瓶带酒都送到工厂医院，那儿忙得团团转。诊所里各科大夫全都上班工作，夜里通宵都有人值班，因为工作也确实很多。胃不舒服、喉炎、咳嗽、神经衰弱……神经衰弱患者已有很多人，有几个带着医生开的条子出了厂，他们最好是呆在家里。

精神上疲乏，支持不住，但没有来找大夫的人比来找的要多得多。他们各有各的治疗方法：检查出入证或到车间值班，到伙房帮厨，缝袖章，写报导，或者就来回蹓跶，从一个大门走到另一个大门，到会议室那儿，到正在举行谈判的劳保办公室，到厂部办公楼，到车间，然后再转到大门口，看看三号门那儿情况怎么样，然后抽支香烟。许多人在动脑子，怎么睡个好觉，铺个什么东西。反正有的是时间来考虑，而这对神经又是没有什么坏处的。

我们和纠察队的小伙子约好，过一个钟头再来，然后我们就去新闻俱乐部。一辆市交通公司代表团的汽车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刚才他们是从自来水公司出来的。这就表明，罢工各单位之间是有协议的，哪个单位情况如何，他们都互相通气，有可靠

的情报。

在《沿海之声报》编辑部，我们拿到了上面登着刚才提到的那篇文章的当天报纸。编辑部的文章说："十四日，星期四早晨，格但斯克造船厂早班刚刚开始工作不久，某些车间有一些职工呼吁停止工作。这些人依次来到了各个最大的车间，劝说船厂工人停工……波兰统一工人党厂党委和厂领导的代表从一开始就设法同聚集起来的人们对话，听取他们的要求。这时候厂里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停止……聚集在厂部办公楼前面的造船厂工人表示同意由他们推举的代表同厂领导开始谈判……他们提出了十几条要求，其中包括提高工资，纪念1970年十二月事件期间殉难的造船工人。要求中还包括改善市场供应，提高退休金和家庭补贴以及工会活动等问题。"文章接着介绍了谈判的经过和厂部的建议并且说："……格但斯克造船厂星期四的事件并不是个别的。在格但斯克和格丁尼亚有十几个工厂都停了工；省交通公司的公共汽车也停驶了。已经上了街的电车陆续回场。这些集体行动的理由之一是，在其它单位职工看来，挣钱已经相当多的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还在要求大大提高工资。"作者在文章中还报导，三联城的日常活动受到干扰，当局力求迅速研究所提出的要求，而这是不容易的。一则，职权有限；再则，临时提出的新的要求愈来愈多。

在编辑部里，有一段话引起了人们的气愤。这段话暗示，除造船厂之外的罢工都是反罢工，是反对那些日子已经过得很好却还要求更好的人，即反对造船工人的。这不是事实，这一点大家都是清楚的。伤脑筋的是，如果有那么个轻率的人写了出来，那末又是谁和为什么竟然把这句话保留下来了呢？爱德蒙特·皮埃特扎克，编辑部海洋部主任，在这个问题上是绝不会同意刊登个别人的看法和意见的。特别在目前，每一个字，每个句子，

每一段这样的话都有重大意义。到底有多大？过一个钟头，到了造船厂我们就能体会到，现在不过是个直觉而已。

10点50分。尽管时刻都很紧张，总编辑塔德乌什·库塔还是接见了我们。他表示抱歉，不请我们喝咖啡了，因为喝咖啡时间可能不够。他估计罢工不可能在今天或最近几天内结束。他认为，罢工单位的数字还会增加，将扩大到邻近的城市。他一再呼吁罢工者和当局要慎重。他在被问及罢工的原因时回答说，人们都记得在这里许下的诺言，记得“我们来帮助”这个义务对于他们造船工人意味着什么。经济危机打击了劳动人民。社会危机动摇了公民的信心。它们使社会上大多数人产生了一种心灰意冷的情绪。

“那么为什么恰恰在这儿，在沿海地区如此严重呢？”

“这儿人们的思想意识来自同外部世界的接触，是由现代化的工业、工艺和技术形成的。同时，最近几年来，错误的经济政策在我们这里是恶果累累。”

电话铃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库塔总编辑接完电话后说，他得到消息，塔德乌什·菲什巴赫同志在列宁造船厂里作了罢工人员不受侵犯的保证。据说他受到了亲切的接待，罢工委员会不排除向其他单位建议结束罢工的可能性。

11时10分。在三号门那儿我们又见到了纠察队的那个熟人。他象欢迎好朋友一样欢迎我们。他脸色疲倦，胡子也没有刮。我们问他站了多久了。

“从开始到现在一直这样，而且看不到结束。下午我得睡它一觉，因为再往后可能很艰苦。各种各样的挑衅都有。有人向大门扔石头，我们没有理睬，保持镇静，我们不能激动。还有打电话来的，说是我们的宿舍被砸了，玻璃打破了，门被撬了。人们都已经想回去了，有的已经在收拾汽车了，但是罢工委员会不

让。莱谢克(莱赫·瓦文萨的爱称——译者注)叫大家先查证一下。人们往家里打了电话，叫家里的人去看一看。结果是什么事也没有。你们瞧，我们得看着点，别让大家出去。”

他还告诉我们，他没有让当地电视台的一个女记者进厂。这位记者尽用一些色彩缤纷、赏心悦目的镜头来美化那个“每晚新闻”节目。

“‘外面’的人，当局派的人都没有来过，菲什巴赫也没有来过。”

罢工委员会的一位代表证实了这个消息，他迷惑不解地打量着我们惊讶的表情。我们完全不能理解：是什么人，为了什么目的向库塔主编谎报情况？现在是只能谈论确凿无疑的东西才行，要不然我们就可能帮忙传播谣言。形形色色的谣言本来就已经够多的了……

职工代表和厂领导举行谈判的劳保办公室在一座红色的砖楼里。楼里除了摆着四张铺着绿呢长桌的谈判大厅外，还有两个小会议厅，两间大屋，厕所和其它辅助房间。印刷所已经在工作。大屋里有不少青年造船工人。在楼前、扩音器前人就更多了。对每一个发言，他们不是鼓掌就是吹口哨，或者哄叫。经理的讲话引起的哄叫最多。工人代表也有被哄的。

到目前为止，谈判已经就十二月事件殉难者纪念碑问题、恢复莱赫·瓦文萨和安娜·瓦伦滕诺维奇工作问题和造船厂职工会自由选举问题等项达成了协议。这些都已经被接受了。关于工资的要求有了变化。

12点5分。

经理说：“现在我提出我能做得到的东西。我可以保证，按第五级的标准处理。”

“我们只要每人一千五，不要什么级不级的。”

经理："我不能作这样的承诺，但也可能结果就是一千五左右。我们还没有算出各类人员的数字。我们总得考虑确定什么样的原则……"

"我们不管什么原则不原则，反正就是一千五百兹罗提。"

"物价补贴也在内？"

"不，每人一千五，外加每月的物价补贴。"

"要不就先按第五级，至于物价补贴以后再定。"

经理："由于生活费用上涨而引起的补贴问题我决定不了，这不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

"那就让上头派人来，来个能解决问题的人。"

经理："我可以担保，按照第五级计算，每人可以有一千五百兹罗提。"

"没有经理作担保这一说，经理是下命令的。请经理写到纸面上。"

经理："每人 1500 这个数，我没有受权来签字。但是作为你们的经理，作为一个造船职工，我可以向你们担保。我也是一个职工，只不过是担任经理而已。这笔钱我可以向大家保证。"

"书记同志"，一位代表向坐在格涅赫经理身旁的厂党委书记耶日·武伊齐克说，"书记同志能不能对经理的话作担保？"

书记："可以，我担保。"（鼓掌）

经理："其它我都做不到。如果你们不接受，最多把我撤换就是。"

"经理向我们作了口头保证，书记也为经理作了担保。我们接受算了。大家就可以回家了。"

"他们可以把经理换了，那保证也就白搭了。"

"我们不能同意，必须得来人，得签字，不能光口头答应。"

经理："我们得相互信任，彼此相信。要是谁也不相信谁，

那就没法生活，也没法工作了。”

代表们开展了一场长时间的、尖锐的讨论。年纪大的倾向于相信，年轻的不干。前者责备后者工龄短而自以为是，而年轻人则埋怨年老的记性不好，忘掉了十年前人家是怎么许下诺言，他们又是怎么相信的。可现在怎么样？纪念碑有了吗？有一个代表建议拿到各车间去讨论，到底是要第五级，还是要1500兹罗提。这个建议引起了站在窗下和扩音器下的船厂工人的一片嘘声。讨论被一个消息打断了，说是来了个省交通公司代表团。据他们说，当局企图挑起造船工人和电车工人不和。讲话人念了一段《沿海之声》报上的那篇文章。

“电车工人万岁！”造船厂里响起了一片“乌拉”声。

“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和他们站在一起！”又是一片欢呼。

报上的这一句话，本想挑起各厂罢工职工和社会各界同造船工人的对立。这个不负责任的企图激起了公愤，加深了对当局的怀疑，结果是促进了工人之间的团结。

省交通公司代表团在掌声中进入大厅。一个代表告诫说，只要没有写成文字的东西，就千万不能妥协。他们那儿也答应过每小时40兹罗提，可是后来厂领导一算，变成了38.5兹罗提。现在他们退出了谈判。

大厅里骚动起来。罢工委员会的委员们坐不住了。原来劝大家接受条件散伙的代表，脸色变得难堪起来。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个人说：

“我们的要求已经达到了，我们回家去吧。如果省交通公司继续罢工，那我们星期一也不来上班。可以这样来支持他们。”

经理：“在第五级范围内的1500兹罗提我可以保证，这是应该得到的。因为你们的工作就象矿工一样辛苦。大家就这样算了，要知道这事对波兰全国都很重要。”

在谈判期间是经常提到矿工的。昨天的《人民论坛报》第一版报导了“哈伦巴”矿完成计划和超产的情况，说那儿正在有节奏地工作。

“别把我们跟矿工比。他们呆在地底下，看不到外面的天地。他们想的是吃饭、住房、有一辆汽车，再来个烫头发的老婆。我们在这里是面对着全世界，我们见得广。我们懂得该怎么办。我们接触的是有教养的人。何况在那儿，小伙子们也不愿意照现在这样生活下去了。”

经理：“你们可知道在波兰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吗？你们能负这个责任吗？”

“那就让波兰聪明起来吧。国家和经济的情况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光换几个人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换个班子也不行。需要的是实质性的变革，能保证安定和不再重犯错误的变革。”

经理：“那好吧，我同意。我在这纸上写明，根据第五级工资，每个职工将提高1500兹罗提，行不行？”

“行。”

格涅赫经理在一张打字文件的边上空白处写上了这一条。

13时30分。

瓦文萨说：“大家满意不满意？如果我们这样结束罢工，大家会不会对我有意见？”

“谁能向我们保证，他们不会改口，我们出去之后，他们也不会追究我们？”

“我们能肯定菲什巴赫保证的最后那句话不是一种花招吗？在波兰可没有罢工权。”

瓦文萨问：“我们结束不结束？”

“不，不结束……十二月事件的时候也有过保证的。”

给每个代表和罢工委员会委员准备了保证书，保证他们不

因8月14到16日的罢工活动而受到侵犯。保证书的末尾有这样一句话，即不受侵犯的保证不包括违反波兰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行为。

14时17分。

瓦文萨说："大家听得见我说话吗？听得见就鼓掌(鼓掌)。如果我宣布罢工结束，有没有人会对我有意见？听见了吗？结束不结束？(鼓掌)。造船工人、工人代表和罢工委员会认为，我们的要求已经达到。我感谢大家的坚持。我已经说过，我将最后一个离开造船厂。我宣布，基本问题已经解决。结束我们斗争的时刻来到了。现在我允许大家在下午6点以前离开工厂。"

格涅赫："我感谢大家保持了平静，守护了厂里的财产，维持了秩序。我们大家将要精神饱满地在星期一再见。我们将努力把耽误了的生产补回来。我要尽一切努力搞好供应，把工作做好。"

大家鼓掌之后，有人提议唱国歌。

急于赶回车间的代表们在大厅门口挤成一团。并不是所有的人急着走，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对达成的协议感到满意。

许多人感到经理关于增加工资的附言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省委第一书记所作的关于罢工工人不受侵犯的保证也是令人担心的。特别是据说今天要召开省委全体会议。只需把菲什巴赫一撤，保证和提工资就会告吹。还有些人认为，根本用不着撤换任何人，"他们"也会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为这事，修船厂、北方船厂、汽车运输公司、铁路设备修理厂和海洋电机厂等单位的罢工委员会的代表都来了。

14时25分。

"你们怎么搞的？菲什巴赫的保证毫无价值。我们根本没有接受！"北方造船厂的人喊道。

“他们会把我们压垮的，要是你们把我们扔下了，那所有的小厂都会被压垮的。”

有人喊了起来：

“列宁厂的罢工委员会背叛了工人的理想！”

关于结束罢工的决定，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民主表决通过的。他们在谈判过程中取得了每人提高工资1500兹罗提、工会自由选举、恢复瓦伦滕诺维奇和瓦文萨的工作、建立殉难造船工人纪念碑等项承诺。取得了不因14—16日的罢工活动而受到侵犯的保证。同时还决定，对于改善市场供应，取消议价，统一各类职工的家庭补贴和罢工期间工资按休假待遇发给等四项要求，将在两星期内收到答复。这不算少了，这一点大家都明白。那么，究竟该怎么办呢？

“如果你们结束罢工，我们这些弱小者就会被压垮！”

人们重复着这些道理。挤在一起听着这些话的人们知道，正是这些现在在呼吁的人，用自己的罢工行动促成了这儿的胜利。难道可以把他们扔下不管？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团结呢？怎么办？他们懂得，要是延长罢工，他们已经取得的东西就可能丧失，包括罢工者的安全在内。他们知道，如果再干，那就不是为力量最强者争几个钱的罢工了，而是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他们坚决决定，不能这样就算完事。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这样办！

被告知罢工结束的人们，已经脱下了工作服。罢工结束了。三天三夜的神经紧张、心神不定和担惊受怕的痕迹明显可见。他们疲乏不堪，准备回家了。人们成群结伙地往外走。他们还不知道罢工的前途未卜。纠察队也不知道，因为厂部已经把广播站关掉了。

瓦文萨：“我们继续占领性罢工。我们必须一块儿坚持到

底，必须团结一致，否则我们就会失掉一切。我们现在继续罢工。”

听到这些话的人们用欢呼声表示拥护这个决定。人们嚷着要求把大门关上並向各车间发出通知。大家聚在二号大门口，用话筒鼓动进行团结罢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工人们，从车间里跑了出来，他们本来已经打算走了。他们在已经关上的大门口停了下来。听说罢工还在继续，那些决心继续参加的人加入了支持罢工集会的一支几百人的队伍，另一些人则退到了厂里。

14 点 30 分。

“有人从一号门和三号门出去了，得挡住他们！”一个年青姑娘喊道。

瓦文萨说：“我去三号门，瓦伦滕诺维奇去一号门。”

电瓶车载着鼓动员们走了。大门关上了。

瓦文萨说：“我们不能把人硬扣下来，他们会对我们有意见的。谁身体不好，感到吃不消，就让他们回家，到明天或者星期一再回来。我留在这儿，我已经说过，我最后一个离厂。谁愿意继续罢工？”

“我们！”

“谁愿意干到底？”

“我们！”

“那就继续罢工。谁愿意出去现在就出去，然后把门关严。”

几天之后，城里散发了一份传单，题目叫作“八月十六日星期六格但斯克造船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是第一份传单，传单是没有署名的。作者对事件过程是很了解的。他写道：“会议结束了……这时候，罢工委员会主席在完全没有同其它委员和车间代表商量的情况下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宣布罢工将继续

下去。这不再是为了解决造船厂职工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是为了支持其他尚未解决问题的单位……这完全是自食其言，公然背弃委员会和代表们的决定。这是撕毁协议，也是破坏造船工人的团结……让我们抛弃那些空话吧……大家想一想，是谁背叛了谁？是谁在撒谎？究竟是谁和为了什么需要这一切？这个行动的组织者究竟怀着什么政治目的把一部分职工留在厂里？……"

传单对事实的报导是相当客观的，但是对罢工者的意图的报导则是歪曲的，因为罢工者是遵循工人团结的原则行事的。

大门的外边，欢呼声已经不如前几天，也不如今天谈判的时候热烈了。显然事情出乎意料。我们和船厂工人的亲人、家属、同事们在一起。他们也不知道是否应当为之高兴。我们感到不安。妇女们在一起谈话，男人们也单独在一起。直到广播通知，谁在什么地方等谁，才恢复了平静。造船工人又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扩音器里传出一个年轻的男声，正在宣读"青年波兰运动"在门口散发的一份传单的内容。

"我们是'青年波兰运动'。去年七月，我们这个组织把波兰许多城市的思想界的青年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我们的目的是在我国保卫人权，保卫民族大家庭的权利，为争取波兰独立的来临而工作……"

这人中断了宣读，让出了话筒，因为有许多组织公报要广播。我们听到的是，人们正在继续从造船厂里往外走。

我们走近一批在船厂门口等候的人群。他们在念"青年波兰运动"的传单。"……要求改变波兰社会的精神面貌，保卫波兰文化免遭控制、没落和苏化，要求普遍有权接触知识和情报，发展符合波兰人民意愿的思想和政治纲领。'青年波兰运动'是一个独立的思想运动，其成员渴求实现上述目标。这些目标是

根据对我国人民所处的情况的分析而提出的。我国人民没有真正的独立，他们处在一个极权主义的共产党的无能的统治之下。”

人们感到惊愕。这个“青年波兰运动”是些什么人？他们要干什么？在一种激动的气氛下，每一句反对当局的话都可能获得喝彩，不过这个号召不仅是针对当局的，而且是针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针对波兰国家利益的基础的。人们简直迷惑不解了。这个声音即使跟那些最激烈的工人的言辞相比，其调子也是大不相同的。

“三号门得派十几个得力的人去，那儿顶不住了。”

“各车间必须搞纠察队，不少原来在那儿的人也走了。让大家自愿报名。”

一个戴着无沿帽的老先生哭了起来，流着泪……他感到不舒服？

“不，我是害怕，先生们。这对我是一个节日，一个最感人的节日。他们在为我们而斗争。可是我害怕，结果会怎么样呢？将来怎么收场呢？你们是造船厂的？”

“不是，我们是华沙来的，是记者。”

“唔……”

我们跑到门口，那儿在往外散发印着修船厂工人要求的传单。一份公报说，经理在厂里到处劝说人们离厂。他答应派一只拖船把他们送走。人群哄笑起来。谁要是记得十年前的事件过程，谁就不应该笑了。那时候也是竭力想把尽量多的人弄走，特别是把纠察人员弄走。过了一会，有人从铁栏杆里往外撒七月份的和更早一些的《工人报》。报纸不够分的，于是每一堆人里有人自愿出来高声朗读。一会儿就用不着了，那个熟悉的年轻的声音开始说：

“怎样收听跟波兰电台说得不一样的广播节目呢？最好用克劳伯牌、梅罗津牌、伊丽莎白牌和苏联的斯波多拉牌的收音机。天线必须……”

16点40分。

当地基层教区神父的来到打断了《工人报》的朗读。

“我到你们这儿来是因为你们向我们的主教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神父说，大家呆在这里并没有罪，他明天来做弥撒也没有罪。弥撒将在明天上午9点在二号门口举行。最后，他向大家祝福，随后就离开了船厂。

造船厂门口的人群越来越密。其他一些罢工工厂代表的汽车难以穿过人群。车子是从埃尔布隆格、特切夫、斯乌普斯克等地来的。一位消息灵通的人士说，明天的弥撒将是游行式的，边走边举行，将走遍各个车间和各个船厂。另一个人补充说，省长和卡赤玛尔克主教举行了会谈，要求不要举行弥撒。据说主教对他的要求表示理解，不过主教指出，如果他的神父不做，耶稣会的神父还是要做弥撒的。我们就是置身于这些焦急不安的、消息灵通的人中间，有些面孔我们已经熟悉了。

17点5分。话筒里传出的一个声音打破了相对的平静。

“我是罢工委员会的委员。你们都认识我，我和大家一起干了二十五年。我没有变成胆小鬼，我现在在这儿。罢工委员会的许多代表已经不在了，他们走了。我们进行了谈判，结果是我们的要求被接受了。经理表示同意并接受了。这当然不是他一个人同意的，这是上头同意的，是上头听取了我们的要求。难道这一切我们都要失掉吗？到下午6点，莱谢克就不再是造船厂的工人了。你们知道，警察和保安机关会对他采取什么行动。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因为是我们撕毁了协议。在下午6点

以前，我们必须离厂。难道你们愿意流血吗？难道你们愿意十二月事件重演吗？我们并没有承担团结罢工的义务，我们必须出去。到下午6点，警察和保安人员就要进厂了。你们知道这里将发生什么事情吗？难道你们忘了？我这不是吓唬你们，我和你们在一起，但是我们必须离开！”

“他在说些什么？把他扔出去！”

瓦文萨说话了：

“是我说了算。我已经宣布了罢工，现在罢工继续进行！”

“我是炼油厂罢工委员会的代表。从早上起炼油厂就停工了，我们在罢工。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你们也应该跟我们站在一起。”

瓦文萨说：“你们愿意保卫我们的事业吗？”

“愿意”的喊声响彻大门两边。

“你们愿意坚决干到底，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吗？”

“愿意！”一片喊声。

“我是格丁尼亚巴黎公社造船厂的代表。我们从昨天起罢的工，现在正在进行占领性罢工，我们没有谈判。我们支持你们的罢工，但是我们大家必须站在一起，城里已经有人在说，你们复工了。”

瓦文萨：“我们罢工，我们必须准备保卫工厂！”

大门口的不安到了顶点。带着孩子的妇女匆忙跳过沟渠向城里跑，男人们也四散走开，有的简直是逃跑了。一批坚定分子留了下来，他们是一开始就在这儿等着的。随着下午6点的临近，不安情绪在增长。现在只是从市内方向还有一批批人来到这儿，那些刚才没有听到讲话的人还比较平静。有人往大门上放了一架梯子，瓦文萨爬了上去，他用嘶哑的声音说，他们将斗争到底，现在已经是胜利在望，需要的是坚定和顽强。他停了下

来，用最后一点劲带领大家唱起了国歌。披挂着鲜花的大门两侧响起了激动人心的歌声，然后是“上帝保佑波兰……波兰万岁！造船工人万岁！”的喊声。

站在瓦文萨身边的一个姑娘在安慰妇女们。她说，他们有吃的，有人照料他们，情况很好。她感谢大家来到这里，感谢对他们的支持。

瓦文萨又说：“我想和大家在一起多呆一会儿，但是已经在讨论成立市罢工委员会的问题。我们在拟定共同的要求。”

接下来是播送公报。二号门口的情况开始恢复正常。

我们把老练的报导员尤雷克留在岗位上，大家到《沿海之声》编辑部来了解具体情况。在总编那儿聚集了一批记者。他们对我们关于“下午6点”的消息感到吃惊，他们一点也不知道。我们感觉他们似乎不相信我们的话，但是又无法肯定。有一个人说，在格但斯克附近集中了一支志愿警察的摩托化后备部队。另一个人解释说，那是万一市里发生动乱时准备应急的。

大门口很平静，人越来越少。话筒里不断播送着《工人报》的摘录：“为什么没有肉？为什么缺少住房？”

6点钟愈临近，我们愈是不安，在“停”字交通标志下我们遇到了刚才在编辑部分手的那批记者。

18点正。公报说：看来当局改变了决定，或者是推迟了时间。

然后是第二个公报：格涅赫经理乘摩托艇逃跑了。

这条消息使大家开心地笑了起来。似乎消除了紧张的气氛。但是它到底是不是一条好消息呢？

接着又是一条：“国际通讯社”发的一条消息宣称，造船厂的罢工已经结束。“这是真的吗？”扩音器里问。

“不是”。

“他们是在讲真话吗?”

“不是。”

“是不是在说谎?”

“是!”

“大家同意不同意,我们让西方电台的记者以我们的名义发表真实的消息?”

“同意!”

19点正。我们走进附近的一所楼房,承一楼住户的好意,我们在那儿看了当地电视台的“全景”节目。播音员念了几段前面提到的《沿海之声》上的那篇文章并报告说,格但斯克造船厂里已经达成协议,星期一将开始正常工作。这些话听起来真象是讽刺,因为从300米外的大门那儿就可以听得见,罢工正进入最激烈,最富于戏剧性的阶段。仅仅过了一会儿,全国新闻节目却报道说,格但斯克沿海地区的罢工事件仍在继续。这次新闻节目结束得特别的早。

主人说:“恐怕是为了让人可以听听8点钟其他台的新闻。”

我们收听了格但斯克的详细报道,关于罢工停止一事只字未提。

造船厂附近试图拍照的人越来越多。在传达室屋顶上设了岗的罢工纠察队把这些人看得一清二楚。出来两、三个人,一下子就把一个家伙架着带进了工厂。这样的小组还走进几乎就在工厂范围内的一所住房,几分钟之后就把挂着摄影机的“摄影师”带了出来。

20点50分。门口出现了经理。他想回厂。

“经理回来了,让进吗?”

“不!我们不放工贼进厂!”

“他说他也是一个船厂职工,应当相信他,是不是让他回

家？”

“不！让他在门口等到天亮！”

“那不行，让他回家。”

这就是罢工者的决定。我们现在才感觉到大门里面的纪律。我们周围的那些人都觉得前景不妙。在格涅赫经理一生中，有家难回的情形恐怕是莫此为甚了。

后来的日子，确切地说是日日夜夜，格涅赫经理是在厂里度过的。他和同事们在一起，和罢工委员会以及后来的政府委员会保持联系，关心着工厂和罢工工人的事情。整个罢工能够保持平静，明智的过程，也有他的一份功劳。他从来也没有“被抓”过，也没有限制过他的自由，尽管有过这样的传说。至于全国各地流传的谣言，那就简直说不出口了。

已经很晚了，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共同要求还没有提出来。造船厂罢工的第三个夜晚是平静的，不过很冷。明天将会怎样，仍在担心之中。

担心是有道理的。与地方当局有联系的一批人中间，出现了几个人（幸亏只有几个，而且是外来的），正在考虑能否用从海上登陆的办法占领工厂的意见。“只要800人就够了。”一位他主张使用武力者言不惭地说。人们愤慨地望着他。但是，任何一个认真思考的人都不能排除，万一有人神经和理智失去控制的话，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一位地方报纸的记者说了话，1970年时的候他是个造船厂工人，十二月事件时罢工的参加者。他说：

“罢工工人的决心和团结大得很。罢工能改变一切。酒鬼变成了禁酒者，小偷小摸的人睁大了眼睛盯着有没有人‘顺手牵羊’。而另一方面，民警志愿后备队的积极队员成了罢工工人的保卫者。人们一旦感觉到罢工的力量就能激发起斗争意志和坚

定精神去捍卫他们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十二月事件的时候，我们迎着催泪瓦斯的阵阵袭击，谁也没有动一下。我们窒息，流泪，可就是站着不动，就好象生了根似的。”

“可是，假如真来个登陆……那又会怎么样呢？”

“吊车将会松开滚进船坞，滑坡上的轮船会放下来沉进海里。油料将会燃烧，焊接用瓦斯的管道阀门将会打开，只要碰上一粒火星，就是一场大火。生产车间将会倒塌。不，这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样的事是不能让它发生的。”

几个人迈着坚定的步子走出了房间。

还是造船厂里最平静，这个感觉看来是确实的。

八月十七日，星期日

这一夜在造船厂里和以往不同。第一次讨论起不是一个工厂的罢工，而是十几个，而且是海洋经济和城市生活中最大、最重要的工厂的罢工问题。公路运输公司、造船厂、市内交通、港口、炼油厂、海洋电器厂，还有几个公用事业单位，一共有 21 个罢工单位的代表团出席。

谁也不知道这次联合行动会带来什么后果，政府的反应又将如何？大厅里除了各厂的代表外，还请来了几位不同政见团体的活动家。他们在帮助代表们把所讨论的要求整理成简明而贴切的条文。

讨论是既累人又杂乱的。这里谁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有的问题似乎都很重要，都值得单列一条。他们讨论的问题有：要求清单上应该包括各厂职工的所有要求呢，还是只列出各厂的共同要求？如何把对大家都重要的东西和只对某一部门，如交

通部门来说是重要的东西区别开来？拿充分供应汽车另件这一条来说，它仅仅对省交通公司来说是重要的，还是对大家都是重要的？讨论持续到天亮。人们还来不及为罢工者规定睡眠时间的最低限额。

这一夜在市内也和以往不同。在市中心的停车场上、在郊区的住宅区里、在十字路口和大工厂的附近停着一些警车，到目前为止，为数还寥寥无几。也可能正因为如此，才引人注目？也可能是因为把什切青警官学校的学员弄到格但斯克来执行任务？

从早上起，警察就二人一组开始巡逻。他们穿着熨烫整齐的裤子和衬衣，没带武器，也没有警棍，连记事包也不带。他们以自己的出现似乎在使行人放心。他们仪容整洁，举止安详，並不查看任何人的证件。当我们乘汽车来到造船厂的时候，也没有查问我们。

二号门前的广场上和街上挤满了市里来的工人家属、青年和穿着丧服的妇女。

9点。用鲜花和国旗装饰起来的大门上方耸立着一个巨大的柞木十字架，上面挂着红白两色花圈。十字架的右边是约翰·保罗二世的画像。圣布列基达地区教堂的神父主持了弥撒。参加弥撒的在大门祭坛的一边是造船厂工人，另一边是他们的家属，未婚妻、同事。神父在布道词中讲了劳动和人，讲了两者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讲了劳动的尊严，劳动的安全……弥撒变成了一次爱国主义的，团结的示威，最后在“上帝保佑波兰”和“耶稣呵，人民在向你恳求”声中结束。

弥撒结束后，十几个穿着蓝灰色工作服的船厂工人抬起了柞木十字架，人群闪开了一条路。他们把它抬到了广场附近的一块草地上，在夜间准备好的一个架子上立了起来。1970年，最初殉难的三个造船工人就是在那儿倒下的。

“它将立在这儿，让我们记住十二月的牺牲者。”

神父向十字架洒了圣水，向唱起“波兰不会灭亡”的人群洒了圣水。几分钟之间，鲜花堆成了高高的一堆。燃起了蜡烛和火炬。肃静，流泪……

弥撒一完，劳保大厅里有十二个工厂代表参加的厂际罢工委员会成立大会开始了。列宁造船厂罢工委员会主席莱赫·瓦文萨当选为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发表了印成传单的第一号公报。公报说：“根据沿海地区罢工工厂企业达成的协议，厂际罢工委员会已于本月十六日成立，会址设于格但斯克造船厂。厂际罢工委员会的目的是协调各工厂企业的要求和罢工行动。作为各罢工委员会联合决议的要求文本业已拟定。现决定继续罢工直到职工的要求得到实现为止。厂际罢工委员会受权同中央进行谈判。只有厂际罢工委员会才能宣布结束罢工。罢工结束后，委员会亦不解散，它将监督要求的执行情况并筹组自由工会。”

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我们前往索波特城。在索波特艺术家和作曲家协会之家里一片度假景象。我们所遇见的记者和经理们惊讶地听着我们讲述罢工的情况。他们确信罢工已在昨天结束。“大饭店”旅馆里住着歌曲会演电视报导组，又可以听到人们在开玩笑地说，今年的歌曲会演的余兴节目将是历来最好的。有谣传说，歌曲会演将停止举行了。但是对主任委员的信任驱散了这些谣传。关键是要有舆论基础。在休息区散步的歌星及其崇拜者稀稀拉拉。文艺演出和在格但斯克差不多，上座率很低。

15点。造船厂附近情况正常。我们得离开格但斯克了。我们中有一位必须把度假结束的孩子送回华沙家里。在回去的路上，我们向这个小姑娘解释，什么是造船厂，二号门，瓦文萨，还

有害怕。大人怎么也害怕呢？幼儿园的孩子是无法理解的。但是孩子们兴奋得不得了。直到华沙一路上不让我们好好地谈话，每说一句话他们都要插嘴，问个没完。

23点20分。格但斯克《时间》周刊编辑部的同事们留在现场，在造船厂里。因此我们来引用一下他们的报道："劳保大厅。四排空桌，中间是十几个人在低声讨论。这是厂际罢工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会议已经进行了几个小时，议题是提出要求清单。主要问题是工会问题。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应该从事什么活动，为谁服务，等等。半夜过后，经济的、社会的、还有政治的要求清单已经拟好。头一条就是支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经过革新的工会。接下来是保证罢工的权利和罢工者的安全、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更大的批评自由。应当容许发表不同于官方宣传公式的观点、不同于我们公共生活许多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的领导者要求的观点而不致引起对发表者不利的后果。提出的要求还有，通过群众性传播工具发表建立厂际罢工委员会的消息，政府采取切实措施向公众发布社会经济情况的全面消息以引导国家摆脱危机，以及让社会各界，各阶层参加改革计划的讨论。经济方面的要求包括确定罢工期间的工资，确定因生活费用上涨而对每个职工具体的补贴原则。罢工者还要求国内市场食品的充分供应，出口仅限于多余部分。要求按照切实的业务标准选拔领导干部。另一类问题涉及老年人和有工作的母亲的生活条件，肉类供应以及休息日等等。"

这一天，就在这次会上，第一次宣读了21项要求。这21项要求是：

1．根据波兰人民共和国批准的国际劳工组织有关自由工会的第87号公约，同意建立独立于党的和雇主的自由工会。

2．保证罢工权利和罢工者以及罢工支持者的安全。

3．遵守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所保证的言论自由，对独立的出版社不采取镇压措施，允许各种信仰的代表使用群众性传播工具。

4．恢复下列人员的原有权利：

1970年和1976年罢工后被解雇的人员；

因政见问题而被开除学籍的大学生。

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对埃德蒙德·扎德罗任斯基、杨·科兹沃夫斯基和马雷·科兹沃夫斯基的迫害；

停止因政见问题而实行的迫害。

5．通过群众性传播工具发表厂际罢工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公布其要求。

6．采取以下实际行动以引导国家摆脱危机状态：

向公众发表关于社会经济形势的充分消息；

让社会各界、各阶层参加改革方案的讨论。

7．全体罢工参加者在罢工期间的工资按休假办法发给并从工会中央理事会基金中支付。

8．提高每个职工的基本工资每月2000兹罗提，作为对迄今为止物价上涨的补贴。

9．保证工资随物价上涨、币值下跌而自动相应地增加。

10．实现国内市场食品的充分供应，出口仅限于多余部分。

11．取消议价和所谓内部出口商店（即外汇商店——译者注）中的外汇销售。

12．实行按业务能力而不以党派隶属选拔领导干部的原则。采取如下措施取消民警、保安机关和党的机关的特权：

统一家庭补贴标准；

取消特殊销售。

13．实行肉类和肉制品票证即食品券制（直到市场形势得以

控制时为止)。

14. 将妇女退休年龄降至50岁，男子降至55岁或者不论年龄而以妇女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工作满30年，男子满35年为标准。

15. 将按旧工资标准计算的抚恤金和退休金统一到目前支付的水平。

16. 改善卫生保健工作条件以保证劳动者有充分的医疗护理。

17. 保证劳动妇女的孩子在托儿所和幼儿园有相应的名额。

18. 实行3年制带薪产假。

19. 缩短等待住房时间。

20. 出差补贴由40兹罗提增至100兹罗提并增加夫妻两地分居补贴。

21. 实行所有星期六为公休日制。对于不能间断工作的职工和四班制职工所缺的星期六公休日应以增加休假天数或用其他的带薪休息日予以补偿。

厂际罢工委员会

把上述各项要求宣读完毕已经是星期一了。这个繁忙的、寒冷的和充满忧虑的夜晚过后又将是什么呢？那些将要回来上班的人将持什么态度呢？在家里和亲人一道度过的这个星期天会不会把人们软化？要是罢工垮了，那些今晚留在厂里的人又将会怎样呢？

罢工委员会准备第一次交班轮休了。厂领导和当局也一样。

八月十八日，星期一

在造船厂上空盘旋的飞机惊醒了罢工的工人。从飞机上撒下号召复工的传单："工人们！你们不要卷入旷日持久的罢工。你们要考虑考虑，这种罢工是在为什么人效劳？"

5点50分。厂领导封锁了罢工工人进入广播站的通路。不知是谁没头没脑地切断了二号大门边上的广播喇叭线，结果弄得医院断了电。

造船厂经理通过广播站号召从城里来的造船工人们复工。几座大门前都在散发传单，飞机也在撒传单：

"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人们注意！

我们根据罢工委员会、各车间的代表和造船厂领导之间达成的协议恢复工作。

所有的提案都得到了解决。我们赢得了每个工人增加工资1500兹罗提的成果。

我们都要各就各位去干活。唯有在工作岗位上我们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和造船厂的问题。不用担心害怕。我们都回到我们的工厂去。各自到自己的车间去。

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经理

克莱门斯·格涅赫"

罢工工人也在说服工人们回到造船厂去，但不是去工作，而是继续罢工。没有了广播站和广播喇叭的罢工委员会，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他们分成了组，在各座大门前，从墙头上分别进行宣传。他们预先估计到了事态的这种发展，他们决定等工人们都进厂之后再采取行动。

“我们不是孤立的。别厂的工人也在罢工。几十个工厂都在罢工。”

“我们並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没有得到保障。”

后来，在工厂的更衣室，在各个车间，在船台上都在进行宣传鼓动。他们分组或个别地进行工作。

“怎么，伙计，难道你罢工已经罢够了，你的衣袋已经塞满了?”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罢工工人战胜了厂领导。格涅赫经理企图用谈判达到复工目的的打算落空了。事态发展到有可能扣押经理，但是没有走到这一步。

7点10分，局势已经控制住了，罢工在继续。越来越多的参加罢工的工厂代表团来到造船厂。他们从电瓶车上向聚集在一起的人们报告他们本厂的形势，报告支持21条要求的情况以及为厂际罢工委员会和修建造船工人纪念碑捐款的数字。厂际罢工委员会的代表向省长呈交了罢工工人提出的21项要求的清单。

确定了参加罢工的工厂向厂际罢工委员会登记的原则。只有参加罢工的人员才能登记。申请登记的工厂必须派出两名代表，该代表必须持有注明当前工作地点的身份证、罢工职工的全权委托书和罢工工人对21项共同要求的赞同意见。各厂代表隶属厂际罢工委员会，该委员会有权同中央进行谈判，决定罢工和复工。各厂代表在登记时可提出本单位的要求。

登记号为63号的是三联城的私营出租小汽车司机。他们已在北方造船厂的停车场上召开过群众大会。他们表示同工人们团结一致，並不因自己是“私营”的而难为情。他们拿出了二万兹罗提做厂际罢工委员会的经费，並且每天派4-5辆小汽车供罢工者使用。这些事他们在星期天就已经商量好了。但是交

通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他们第一次集会的地方记下了他们的车号，然后任意找借口剥夺他们的驾驶权。他们遇到了麻烦；参加罢工的工厂都挂出了国旗，他们把国旗挂在哪儿呢？

到傍晚，登记的已有156家工厂。罢工普及开了。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扩大到十八人。说它是扩大，因为主席团不是选举产生的。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是从各工厂的代表中产生的，就是说由那些在星期六决定进行团结罢工的工厂代表组成的。随着参加罢工的工厂不断增加，参加厂际罢工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人数也不断增加，但主席团无大变化。参加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的除了那些强有力的，能量大的大工厂的代表之外，还有：文学家莱赫·邦德科夫斯基，格但斯克工业大学的化学家，工程师沃伊切赫·格鲁谢茨基博士。邦德科夫斯基和格鲁谢茨基作为本阶层的代表带着表明跟罢工工人团结一致的信件走进造船厂的时候，並不知道他们将会留在这里，並站在这个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的前列。他们跟工人们一起参加了主席团。这些工人是：海洋电器厂的博格丹·利斯，有轨电车司机亨雷卡·克日沃诺斯，格丁尼亚港的码头工人斯泰凡·伊兹德布斯基，格但斯克港的起重机司机斯泰凡·莱瓦多夫斯基；装配工耶日·西科尔斯基，船体工耶日·克维耶齐克和焊接工安杰伊·科沃杰伊，他们在主席团内分别代表船舶修配厂，北方造船厂和巴黎公社造船厂。仓库管理员兹齐斯瓦夫·科贝林斯基是格但斯克公共汽车公司的代表，工程师安杰伊·格维亚兹达和安娜·瓦伦滕诺维奇都是沿海地区自由工会筹建委员会的成员。安杰伊·格维亚兹达工程师在主席团里代表自己的工厂——海洋电器厂。

“格丁尼亚造船厂自由印刷所”发表告三联城居民书：

“鉴于大规模流传不真实的消息，我们谨将目前的罢工形势

敬告诸位：罢工在继续！成立了厂际罢工委员会，总部设在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该委员会是我们同当局谈判的唯一代表。各工厂罢工委员会维持各厂的秩序。秩序井然，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大家可以放心。我们一定能坚持下去！！！”

印刷的质量不算好，不是行家们干出来的。工人们在学习印刷，干得很吃力。由于缺少纸张，他们只得通过广播车喇叭向社会呼吁。结果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效果。

出版了单页的罢工情况通报，该通报报道说，“厂际罢工委员会的活动范围已经超出了三联城地区，也包括普鲁什奇格但斯克的一些工厂以及斯塔罗加尔德格但斯克、埃尔布隆格和特切夫的一些工厂。”罢工並不总是意味着停止工作。经厂际罢工委员会同意並受该委员会的委托，那些生产活动为社会所必需的企业都坚持工作。“厂际罢工委员会特别保障医疗部门，自来水，煤气以及生产食品的企业部门的工作。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我们是我国劳动群众第一个真正的、自由的代表。我们肩负着对整个社会的重大责任。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成立独立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和雇主之外的自由工会。因为只有那时才能有效地保卫职工的权利和利益。在我们赢得自由工会之前，保卫我们利益的唯一方式只有罢工，然而这对社会来说是一种代价最大的谈判方式。只有自由工会才能既保证国民经济不受干扰地运转，又保证实现职工们的要求。

成立自由工会的第一步就是通过当局派遣代表到格但斯克造船厂来，並与之进行谈判，从而取得中央当局对厂际罢工委员会的正式承认。厂际罢工委员会所属各厂罢工委员会，随时准备就改善工作条件和提高劳动报酬问题同各厂或联合企业领导进行谈判。但我们要强调指出，这类谈判的结果对决定何时结束罢工没有影响。结束罢工的决定只能在同中央进行谈判之后由厂

际罢工委员会作出。在所有这些谈判中，厂际罢工委员会必须得到确保罢工成果不会丧失的保证。

因此，我们期待中央当局代表的到来。每拖延一天都将是当局不愿承认波兰劳动者有权选派自己真正的代表的证据。我们谨以我们所代表的职工的名义声明，我们渴望尽快复工，然而是作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作为工厂的真正的共同主人而复工。每拖延一天，对于我们由于领导的过错而危机重重的经济来说，就是上十亿兹罗提的损失。我们是在为正义的事业而斗争，我们必胜。我们的人数正在与日俱增。拖延所付出的社会代价的大小将完全取决于当局。我们再一次向当局呼吁：要审慎，要有负责精神。”

当局也采取了反措施。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思想教育工作部印发了一份就要求成立“自由工会”一事进行解释工作的辅导材料，在这份材料中历数了成立这种工会的消极后果，说这种工会“有可能导致工会运动的分裂，”“有可能导致经济管理各个环节的活动瘫痪，不利于摆脱当前的危机，”“实际上有可能成为西方反共势力在我国土地上的立足点。”上述材料的作者们写道，“所谓自由工会的活动目的、范围和方式都是由反社会主义的中心炮制出来的。他们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波兰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第87号公约……”结论是：“只有能与政府合作的，能团结一切劳动者的，作为政府伙伴的强有力的中央工会才能真正确保工人的利益。实现成立‘自由工会’的要求，就可能会排斥劳动界这一代表机构存在的可能性。”

傍晚，党中央第一书记爱德华·盖莱克在发表电视演说时，指出了应寻求达成协议的界限。他表示同意罢工者提出的经济要求，对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活动进行了批评，预告了在工会运动中进行改革的必要性，答应按照秘密的、民主的选举原则，不限

候选人数来选举工会领导机构。

在格但斯克举行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省委员会全体会议一直开到深夜，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亨雷克·雅布翁斯基，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和塔德乌什·佩卡。省委第一书记塔德乌什·菲什巴赫作了情况介绍，他肯定了这次罢工确实是工人的行动，同时也指出了用政治办法解决危机的必要性。

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发言时指出，不能说当前的局势只是由三联城局部的、特殊的原因造成的。

在省委委员们的发言中贯穿着当局必须同人民，党必须同自己的阶级取得谅解的问题。海军司令扬奇申上将强调说，军队不会采取任何可能动摇它跟社会联系的行动。

参加会议的党的领导成员排除了使用武力来解决紧张冲突的可能性，“当前的困难局势应该用政治方法来解决。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唯一的途径。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

由副总理塔德乌什·佩卡领导的政府委员会开始了工作。

八月十九日，星期二

城里是平静的。罢工工人保证了食品商店的供应。美食店里出售子鸡，几个品种的熏肉、干酪。基本食品——面包和牛奶不缺。由三位市长：格但斯克市长耶日·姆温纳尔奇克，格丁尼亚市长杨·克热奇科夫斯基和索波特市长莱赫·希维翁特科夫斯基签署的致三联城居民书倒使格但斯克人读起来感到有点惊讶。

“自星期四以来，也就是说，几乎一个星期以来，我们在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和索波特一直在过着充满了紧张和焦虑不安的

日子……不管在许多工厂里如何进行讨论，不管如何提出和逐步实现职工们的要求，反正我们的城市必须生活。为的是让它的居民能够生活，也就是让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亲人，医院里的病人能够生活……我们千万不要觉醒得为时太晚，我们千万不能允许我们的孩子向我们乞求一片面包和一杯牛奶的局面出现，我们不能允许病人面临缺乏迅速有效医治的威胁……大家都来为我们的城市恢复安定的气氛，恢复不必为明天担心的气氛，恢复生活的气氛而努力吧。”

格但斯克印刷厂也参加了厂际罢工委员会，在这个印刷厂里迄今一直是在印刷反对罢工的传单。

清晨，厂际罢工委员会代表团在省政府呈交了一封给爱德华·巴比乌赫总理的信件，要求中央当局前来进行谈判。但“国际通讯社”下午报导说，当局将不与厂际罢工委员会进行谈判，只同各厂的罢工委员会进行谈判。那些谈判也确实已经开始……

从附近农村运来的首批粮食到了造船厂，而一个私营面包师送来了面包。

副总理塔德乌什·佩卡于星期五下午飞抵沿海地区，但直到星期一在格但斯克举行了统一工人党省委全体会议之后，他才比较果断地以政府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开始自己的活动。星期二早上，政府委员会得到消息说，格但斯克港港务局和船舶修配厂的罢工委员会打算进行初步的，试探性的谈判。14点正，省政府的纹章大厅（指挂有城徽的，举行重要活动的大厅——译者注）里聚集了这些工厂的代表、厂长以及统一工人党工厂委员会的书记们。佩卡作了自我介绍并请参加会议的人进行自我介绍，代表们虽说有些迟疑，但都作了自我介绍。小伙子们都年青，似乎不太轻信。他们说，他们不打算谈论政治，但他们都带

来了具体的经济要求，他们想知道副总理的态度——这些要求是否能得到解决？

佩卡说，“你们把那些要求提出来吧。”

不知是谁递给他一分由厂际罢工委员会集中的21项要求的全文。佩卡看了这些要求，就开始讲话。这次讲话既没有录音，也没有作记录，只能根据当时始终跟佩卡在一起的绝对可靠人士的详细叙述，记下一个梗概。

“先生们，我到这里来，不是因为有人命令我来，而是我自愿来的，因为我喜欢格但斯克。我期望问题能得到合理解决，我感到痛心的是竟发展到了罢工，发展到了冲突的这一步。我想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且要迅速解决。但是，在问题全部得到解决之前，需要我呆多久我就准备呆多久，哪怕呆到十二月份，哪怕呆到明年。

我有政府、政治局和盖莱克同志本人授予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全权。我有充分的资格进行谈判並作出决定。”

接着佩卡简短地谈到了21项要求，並示意所有各项都可以解决。在谈到工会问题时，他说，工会工作得不好，反应迟钝，人们对他们很有意见。应该把工会改造得能够真正代表劳动者的利益。他认为，罢工委员会，倘若得到了职工们的承认，在罢工结束之后将继续活动，也可以——如果大家愿意的话——选进现有的厂工会委员会里去。

“什么？”有人问，“厂工会委员会和罢工委员会能够弄在一起吗？”

“是的，直到召开工会代表大会。而在这之前，我将一直在这里办公。”

接着在谈到细节问题时，佩卡考虑的问题有：是实行三年制产假好呢，还是建托儿所好。

他接着说："我们要算一算，哪种做法经济一些，我们就决定采取那种。没有不能讨论的题目。"

代表们走出会场时都被佩卡的话所陶醉了。他们答应说，晚上他们准备同许多工厂的代表团进行广泛的接触，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这么坦率，这么具体地讨论过问题。他们说，副总理的态度使他们喜出望外。午后，佩卡以同样的精神又同"维斯瓦"造船厂、格丁尼亚海洋代理公司以及格但斯克鱼制品工厂的代表们进行了交谈。干剖鱼工作的妇女们伸出她们被潮气泡红了的双手，抱怨他们的工作条件极端艰苦，而工资又极低。厂长肯定了她们的诉怨，还就供应困难和社会福利条件差等问题作了几句补充。然后谈话转到星期六公休的问题上。佩卡用开玩笑的口吻说：

"你们，大婶们，你们……你们不会生气吧？你们，大婶们，你们想要歇星期六，那你们的男人那时不是就得去工作吗？"

妇女们纷纷抱怨说，总得有时间洗衣服，整理家务呀。副总理说：

"你们不是比男人活得长吗？"

妇女们听了他的话都乐得心花怒放，尤其是他答应把工资提高500兹罗提。这些妇女也参加了晚上的会见，到了那里她们便有点恼火了，因为听别的工厂说人家那里是提高1000兹罗提，甚至1500兹罗提。

晚上9点，有16家罢工工厂的代表走进了省机关大楼(这时参加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已经有近200家工厂了)。一开始是就如何结束罢工问题进行讨价还价。佩卡要求马上结束罢工，然后讨论问题，因为那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代表们询问有何保证。结果是，将达成一个总的协议，然后各罢工委员会宣布复工，而政府委员会着手讨论细节。但是，大厅里有人开始窃窃

私语。不知是谁突然站出来发表了这样的宣言：

“好吧，形式上我们可以结束罢工，但是，只要列宁造船厂还在罢工，我们就不回厂工作。当然，那些边远的小厂可以工作，但是我们，我们这些跟列宁造船厂相邻的工厂工人，北方造船厂的工人，船舶修配厂和港务局的工人，只要列宁造船厂的工人不上班，那我们也不能上班。而且还有个实际问题：既然全市交通部门都罢了工，我们又怎样去上班呢？”

于是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去找省交通公司谈判。半夜时这个小组回来了，毫无结果。这次访问的消息早就传到了省交通公司，起初他们根本不放这些特使们进门，后来终于放他们进去，但只是为了骂他们是破坏罢工的工贼。他们听到的是：只要厂际罢工委员会不宣布结束罢工，他们就要一直罢下去。

这时，副总理在大厅里吩咐上夹肉面包。但是，三更半夜的到哪里去弄夹肉面包呢？佩卡冒火了，“怎么？在华沙只要我吩咐一句，一刻钟之内就来了！”夹肉面包总算是找到了，还是科沃杰伊斯基省长通过自己的大本营在“海韦柳斯”旅馆搞到的。

让我们把从星期二一直拖到星期三的这些事件的描写先放一放，暂时换个地方看看。

深夜我们到了埃尔布隆格（格但斯克的邻省的省城——译者注）。城市就像死了一般——但这也许是这个市中心分散的工业城市的正常现象吧？我们来到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省委会。这里也是一片寂静，只有一个门房，但是在第一书记安东尼·波沃弗尼亚克的办公室里却聚集了省里整个的政治司令部。“第一把手”很殷勤地欢迎我们，请我们喝咖啡。他往桌子后边一坐，便开起玩笑来。

“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

“遗憾啊，我不能回答你们提的任何问题。”

一片令人局促不安的沉默。

“我们对局势尚未能作出充分的估计，”波沃弗尼亚克解释道。“再说，我们认为向新闻界报告消息也不合适。”

“那就难了。我们只好满足于我们带来的那些消息了。”

“什么消息？”

“听说埃尔布隆格有25家工厂停了工，其中包括机械厂。”

“这些消息可是错误的呀。机械厂在干活，只有两个车间停了工，而且您所说的停产工厂的数字是大大地夸大了的。嗨，我倒开始向你们提供情况了！”第一书记忽然明白过来，便笑了，“哎，哎，你们可真是记者，把我给唬了。我再多一句也不告诉你们了。”

但是，归根结底，並不是那么糟。波沃弗尼亚克和他的司令部施展开了自己的本领；再说他们也没有理由(至少是在这一天)向我们隐瞒实际情况，因为从当局的观点看还完全不到报警的程度。只有运输系统是硬碰硬地停了工。工业企业都是“软”罢工：工人们来了，工作一会儿，然后开开群众大会，又工作。任何地方也没有出现反对党的干部和厂领导的敌对性示威。省委会的工作人员都呆在工厂里，听工人们发牢骚，进行一些劝说，一直没有失去同诉苦的人们的联系。只是他们不能作出多少许诺。

“在埃尔布隆格发生的这一切，是否就是格但斯克罢工的反映？”

“难说。要是格但斯克没有罢工，这里肯定也不会出这种事。但是我们这儿也有自己的令人不满的原因。最概括地说——生活上的原因：工资问题、物价波动问题、工作条件问题、供应差的问题。只是有的地方受格但斯克来的特使煽风点火的影响，或者是从这里到造船厂的厂际罢工委员会去取经，才出现一

些从那里照抄过来的要求。”

夜深了。我们喝完了咖啡，便到省委会招待客人的一座不算难看的别墅睡觉去了。没有任何东西可吃，我们只好拿出自备的干粮，幸好电冰箱里有冷饮。

睡得很舒服。这是我们在最近这几天里多多少少睡了个整觉的最后一夜。

八月二十日，星期三

早晨在埃尔布隆格度过。匆匆忙忙，得看看城里是怎么回事呀，但是我们一直急于尽快到那里去，到运动的中心去，到格但斯克造船厂去。

商店都正常开门，交通却停了摆。统一工人党省委会主管宣传工作的书记博热娜·雅尼科夫斯卡主要讲了“特鲁索”公司所属各服装厂的形势，几天来她一直在那些厂里转。妇女们上班时已是筋疲力尽，因为都是走着去的，而许多人半夜里就得在商店门前排队。她们都焦躁不安，哭哭啼啼。干一会儿活，停一会儿，聚在一起议论一会儿，发发牢骚。为什么富得多的格但斯克在七月份没有实行议价，而穷得多的埃尔布隆格却实行了？在议价商店里一公斤糟糕的碎肉末要119兹罗提！

“我能向她们许什么愿呢？”雅尼科夫斯卡说，“她们对十二月事件后的那些许诺不是记忆犹新吗？妇女们能赚到4000兹罗提，但她们只计算基本工资，近2500兹罗提。她们提出形形色色的要求，我耐着性子听她们说，可是，我又能说什么呢？她们噙着眼泪请求说，‘你们那怕是让一步吧，我们也让步。’这对她们来说是个面子问题。如果我们寸步不让，她们就会固执

地罢起工来。”

我们跟省委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在城里转了一圈，我们只能站在工厂门口看看，因为波沃弗尼亚克书记很客气地请求我们不要进入工厂，以免局势复杂化。此地的巨型企业——机械厂是在工作，只有两个车间停了工，但是看样子全厂停工在即。从“特鲁索”的窗口可以看到很多妇女；大概都没有去干活。啤酒厂没有开工，但这也许是正常停产(我们得打听一下)，由于原料短缺，这样停产的工厂是很多的。公共汽车公司的车场——一个巨大的广场上摆满了公共汽车，看不到人。罢工。省交通公司的车场上，站着一群一群的人，插着红白两色国旗——占领性罢工。有轨电车的轨道上横放着许多小汽车，封锁了交通。昨天这里还放了一位省委书记进去，今天罢工者就提高了调子：他们说，要跟他们谈判至少得是一位副总理。

我们的小汽车停在禁止停车的地方，被民警的无线电通讯车拦住了，他们仔细检查了车辆执照和记者证。“跟你们在一起的是什么人?”“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哪个委员会?”“波兰统一工人党埃尔布隆格省委会的工作人员。”“嗯，好吧，”民警说，“你们停吧，我不罚款了，虽然你们有两条违章。”

第二个举行占领性罢工的单位是房屋工厂。大门紧闭，旗帜飘扬，一群群穿工作服的维持秩序的男人，有几个手里拿着长棍——这是我们在那些罢工的日子里看到的唯一的一次拿棍子的情况。

因为埃尔布隆格所有的运输企业都停了工，便动用卫国同盟(一个业余群众性组织——译者注)的卡车以及那些至今尚未参加罢工的工厂的汽车以保证供应。

我们乘车到格但斯克去，沿途没有遇到一个民警监督岗，虽然有几个地方停放着民警的无线电通讯车。进城的时候，看到

炼油厂和其他几个工业企业都飘着罢工的旗帜；围墙里面是工人纠察队。

天气暖和，阳光灿烂。列宁造船厂二号大门的前面出现了格但斯克人的名副其实的游行队伍，另有一些人同家属和熟人谈过话或听过广播喇叭播送的公报之后从那边回来，跟到那边去的人流擦肩而过。许多人在看罢工传单，大门前抢传单简直像打架一般。

但是，此时此刻主战场是在另一个地方——省机关的大厅里。这场斗争已经持续了好几个钟头。

我们已经知道，佩卡副总理同16家罢工工厂的代表之间进行的主要的一轮谈判在8月19日的后半夜已经开始了。

佩卡又把厂际罢工委员会提出的21项要求拿来作为谈判的基础，虽说他根据当局的立场不承认这个罢工组织能作为跟政府委员会谈判的享有全权的谈判对手。他显然是认识到应该抓住最大的一头公牛的牛角，因为厂际罢工委员会的要求走得最远，而且措辞也最坚决。

他把左手大拇指插在腰带上，用右手比比划划，动作很大。他像在上午一样，对什么都一概应承。

"副总理先生能够解决这一切吗？"有个持怀疑态度的人问。

"你们不知道我是谁。要是在华沙，就会有人对你们说，佩卡就是这么一把大镰刀，只要一拿起来——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那得看，它会碰到什么样的石头。"旁边有个工人嘟哝说。

"我受最高当局的委托，"佩卡重复了一遍，他又说了好长一段话，说得天花乱坠，发挥了他全部能言善辩的演说才能，拚命用这种演说往在座的每一位心里灌蜜糖。一个多么了不起的

政治家！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船舶修配厂的小伙子们，整个下午跑遍了格但斯克，为的是把其它厂也拉来参加这次会见。现在他们带着得意的神情瞅着新来的工人们的脸：怎么样，我们没有道理吗？这难道不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物吗？

甚至在场的有几位党的领导干部也被佩卡的讲话的魔术般的力量迷住了，他们开始思索起来，这大概不是虚张声势糊弄人，他可能真是受了盖莱克的特别委托：你把一切都解决了吧！每个党的干部都清楚，佩卡是第一书记最亲密的私人朋友圈子之内的人，是他家的常客。但那些干部同时也感觉到，这事总有点不对头。因为佩卡毫不迟疑地许诺的对罢工工人作的一些让步，是属于议会和中央委员会管辖范围的。

佩卡的举动太出格了。

"我知道，在你们格但斯克住房问题特别尖锐，有12万人在等待解决住房问题。你们知道，菲什巴赫在中央委员会上提出过。好吧，我们给你们建两个房屋工厂。一个是普通的，生产大预制板，第二个是法国进口的，生产独户房子，非常漂亮的小房子。这对你们够可以的了吧？"

"当然！"

但是，有人插嘴说，在沿海地区现有的三家房屋工厂中，一家只开工60%，第二家将近30%，而第三家根本就不开工。因此再建两座新厂未免就多余了吧？

关于肉的问题：

"呃，不错，我知道，你们这儿供应很糟。但是已经决定进口6万吨肉。问题解决了。"

"这肉什么时候来，副总理先生？"一个妇女问。

"什么时候？等一等，等一等，我得问问部长。啊，不错。如果是从欧洲经济共同体进口，两个星期之后就到货。如果是从

阿根廷进口，那就得三个星期。”

有一个顾问对佩卡轻声说道，由于技术原因这么快到货是不可能的，即便只考虑到港口罢工这一点也是不可能的。但佩卡只是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谈到发肉票的问题：

“如果你们都愿意发，那就发肉票。不过，我并不主张发肉票，因为这会引起许多疑问和执行上的问题。这个问题得仔细考虑考虑。我们先把它放一放吧。”

星期六公休？当然可以，没有问题。在供应不足，原料不足，能源不足的情况下，这样做在经济上甚至是合算的。

耶迪纳克部长补充说，在他主管的机器制造业部门去年由于种种原因平均有100天没有工作。

轮到了书报检查问题。

“诸位，”佩卡说，“问题不在于书报检查，问题在于出版物的质量。书报检查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一定得有。啊，党中央主管宣传的伊尔丘克同志就在座，让他谈谈吧。要不，还是我来说。您们瞧，不是书报检查不好，而是记者们不好。是他们在掩饰缺点，是他们在报刊上写得那么圆满。他们经常在报纸上把这个盖莱克和膘肥肉壮的奶牛照在一起，他们对什么都一律赞扬，可是黄油没有还是没有，尽管记者们说，在我们这儿‘牛奶流成了河’，但我们仍然不得不进口黄油。”

“我抗议，副总理同志！”

“您是什么人？”

“我姓加卢斯，是《沿海之声报》的。我们是你们允许写什么就写什么！我们不掌握情况，我们也就没有可能给社会报导消息！”

“您是这么说的？也许是这样。”佩卡附和说，“这是我们

共同的过错。但是，加卢斯同志，我们是不是非剥得只剩一件单衬衫不可呢？而且，您很疲乏了，加卢斯，您的脸色很难看，您去睡一觉吧。”

“谢谢，我能坚持。”

“嗯，你们大家觉得怎么样？”佩卡对大厅里的人说，“这个加卢斯恐怕可以参加罢工委员会吧？”

“当然！不过我们还要看看他在报上写些什么。”

“因为，副总理先生，我们一看报纸，就觉得，一切都象是一个记者写的。可我们希望有许多记者。我们不希望到处的报纸都像是从《人民论坛报》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

佩卡对此也表示同意，他继续讲了下去，一条一条地讲，直讲到清晨 5 点钟，对什么都一口应承。

6 点左右，大部分与会的人都回家去了。留下委员会的人，要把协议的最后文本写好。决定 11 点正将这分公报的内容交电视台播出。可惜的是，由于技术原因办不到，因为格但斯克电视台这个时间没有节目。

文件起草小组在工作。包括 12 点内容的文本写成之后，佩卡加上了一句：“本协议将呈部长会议批准。”

“什么？”代表们吃惊地问，“副总理先生不是说过，您有充分权力签字吗？”

“你们要理解，诸位，我是个副总理，我上头还有政府、党的权力机构，因此我不能绕过这个手续。”

代表们也就不多追究，因为有的人已经站着睡着了。佩卡的精神却一直很好，他的精力充沛的样子使人钦佩。

“马上送华沙。”

“什么时候会有答复？”

“现在是 9 点。两个小时之后就会有答复。”

“副总理先生，”一个工人反驳说，“这恐怕不可能。我了解华沙，到11点召集那么多人甚至都来不及，又是政府，又是政治局。再说，他们还得考虑考虑呀。”

“如今是特殊情况，”佩卡驳斥道，“大家马上就会集合，举手赞成。”

下午两点到3点之间，答复下来了。十二点协议中，同意了三点不太重要的：关于房屋工厂的一条，关于进口肉的一条以及关于罢工委员会在罢工结束之后仍然能够活动的一条。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回答都是模棱两可的。

下午5点正，代表们又都来了，大厅里挤得满满当当。来了许多记者，其中有许多外国记者。佩卡受了很大的挫折，但尚未灰心。他一开始不是介绍中央当局的立场，而是发表长篇讲话，讲话中重新许愿，说一切都会顺利解决。但是大厅里已经纷纷发出抗议、挖苦的质问、不友好的叫喊。有人打断了副总理的话：

“佩卡先生，9年前也有个像您这样的人到过我们这里，他叫什拉赫齐茨，他也是说，他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可后来，他溜了，从此杳无音信。”

“您的这个比喻是对我的侮辱。我是副总理，教授，我跟盖莱克共事有二十年了，我跟他是很亲密的。”

他还谈到了许多怪事，倘若符合实际的话，那就大有泄露国家机密之嫌。

他还援引了自己写的提出经济改革的书，“就像匈牙利那样的经济改革，只是还要好得多。你们看过这本书吗？啊，没有，你们不可能看到，因为只发行了1200册，波兰就是这样，形形色色的谬论大量发行，而好书却买不到。”

虽然他耍的是最高水平的把戏，但人们听佩卡讲话的热情却越来越低，因为他们已经猜到，协议是要落空了。大家开始显

得很不愉快，甚至很不客气。会议在愤怒的气氛中散场。佩卡到了省委会，了解他的“表演”的政治局委员们已经在那里恭候他了。到底是谁到了那里——保密；他们之间的谈话是如何进行的——保密。第二天10点佩卡飞往华沙，离开前一个钟头，他的继任者雅盖尔斯基来到了格但斯克。佩卡眼里含着泪水。他说，他是带着最良好的意图来的，他选择了这样的一种策略，就是多多许愿，停止罢工，然后慢慢地、心平气和地一点一点来实现。没有成功，难啊，他输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厂际罢工委员会会议大厅去吧。代表们全部聚集在这里。除了从省机关传出佩卡失败的消息之外没甚么大事。那些跟他进行过个别谈话的罢工工厂的代表们纷纷寻找遁词，以便“体面地”回到厂际罢工委员会来。此时厂际罢工委员会已经有将近250家工厂参加。

佩卡不愿同厂际罢工委员会谈判，政府委员会用沉默推开了举行谈判的建议。政府委员会对厂际罢工委员会存在的事实置若罔闻，虽然这个委员会是在主宰罢工，并且实际上是在共同管理城市，是在领导城市的公共经济、供应、帮助秋收。动力、自来水、煤气部门应该工作——这是瓦文萨决定的。医疗卫生部门照常工作——当然也是。商业运输基本上罢工，但是根据这样一个准则送货：面包——运，糕点——不运。如果哪里的机械工人缺少什么垫圈或别的什么配件，通过扩音器一广播，大厅里马上就有人宣布：我们那儿有，我们给。厂际协作从来没有像罢工时期搞得如此有效。厂长们，如果这儿也有厂长在座的话，是可以学到不少东西的。

休息片刻之后，我们去找瓦文萨。

“啊，《政治周刊》来的？你们来得晚了10年，但是晚来总比不来好。”“我搞过罢工，”他说，“在1970年就搞过，我输了。在

1976年我输了50%。当时我在电气安装厂。倘若拉多姆再坚持一天，我们就赢了。现在我有100%赢的希望。”

“可是，如果您这次也输了呢？”

“那也会留下觉悟和组织。别人会重新干起来，也许是没有我。通过这一次罢工，现在人不同了。不可能回到前几年那种情况去了。只要继续斗争下去，就会取得胜利。”

这种自信心感染了这里的每一个人。这次罢工——对于它的参加者来说，就像过节一样。他们摆脱了那种灰暗的平凡的日子，不用每天劳碌奔波着去上班，去挤商店买东西，不用去看别人不友好的脸色，也摆脱了那些不该由他们负责的停产的旋涡——或因为缺少部件，或因为别人不供应什么，或因为工具太糟，或者材料用完了。他们也不用再去听那些高喊什么“提高效率”，“挖掘潜力”而实际上早已成了空洞的、公式化了的、单调的召号和废话。他们也不用去喝从电视新闻中溢出来的那种浑浊无味，令人恶心的迷魂汤了；造船厂里根本就没有电视机，可是谁也没感到有所欠缺。他们参加的是一种重要的，崇高的活动，虽然被戴上了“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帽子。这顶帽子只能使他们觉得滑稽，因为这与他们的意图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到了这里，他们突然发现，原来语言是可以和思想一致的，并且能引来有意义的活动。良好的组织工作一天天在成为现实，不错，不是在工作中实现，而是在停工的时候。大家都很友好，彼此都很团结，而且会团结到底，谁也不会屈服。因为政府终归会明白，罢工工人的要求是正义的，丝毫也不会威胁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也不会威胁到国家的盟友。

他们之间没完没了地交谈的就是这些事。

他们不想要任何人的脑袋。他们对国家政治领导机构中的变化也不感兴趣。倘若盖莱克像10年前一样到这里来，他们也

会静静地听他讲话。一个造船工人说："请他不要表示什么歉意，他也不用解释，什么愿也不用许，既然国库空空如也，许什么愿也没有用。我们理解，我们会以充分的尊重接待他，只要他能跟我们认真谈谈，像跟成年人谈话那样。因为在这之前，他每次来，便会有这么一个积极分子站出来，拿着一张纸片向他报告，为了庆祝什么，完成了什么任务，再向他作一些庄严的、骗人的保证。而盖莱克，不是在他屁股上踢一脚，叫他别再这么搞，而是拍着他的肩膀，对他说出许多感激的话。"

这是正常的罢工的一天。大理石的列宁塑像在倾听着工人的会议。舞台上方挂着白色的鹰徽，十字架，国旗，还有一架钢琴——波兰的乐器，还有一面令人颇费猜测的白—蓝—白旗帜，因为在波兰总得有某种费解的东西。有人说，这是圣母玛利亚的旗帜，也有人说这是造船厂的旗帜。

像每天一样，从主席团桌子的后面发出公报和形形色色的代表团的声明。

铁路枢纽站的女代表说：

"只有那些保障运输不间断的人在工作。从明天起，铁路工人队伍开到农村去，帮助农民秋收，省得别人指责他们偷懒。"

格丁尼亚建筑联合工厂的代表说：

"我们把募捐到的2300兹罗提交给造船工人买粮食。沃伊齐克厂长向职工们建议跟政府进行谈判。我们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只有厂际罢工委员会才有资格进行这种谈判。"

瓦文萨报告了一个新情况：民警开始阻拦给居民分送食品的车辆，阻拦分送粮食和煤。民警命令取下红十字——它是表明司机在罢工，但受厂际罢工委员会委托运送必不可少的供应品的标志。怎么办？

"叫他们别去送！"

“他们还得送，这是居民的生活必需品。”

“让他们在前窗玻璃上写上：肉、粮食、糖。”

格但斯克——奥利瓦公共汽车公司的代表：

“我们装好了煤，却不准我们运，而此刻医学院附属医院正好没有煤烧了。我们全体员工都认为，应该停止这个行动。”

“不能停止。民警不让也得出车。”

瓦文萨说：

“让每个司机带一团红一白带子。在右边的小镜子上打一个蝴蝶结。民警要取就让他们取下，往前开它100米，再打一个新的。”

建筑维修装配工厂的女代表：

“我们全体职工募集了14,087兹罗提给造船工人买食品。”

主席团公报：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古钱币学家从自己的收藏品里献出一枚象征性的50兹罗提硬币，这枚硬币常给他带来好运，他希望也给罢工者们带来好运。”

斯塔罗加尔德“波尔法”制药厂的声明：

“我厂全体职工声援我省和我市大部分工厂所表达的总的不满运动，我们一致批判国家在政治、社会、经济中所犯的错误和缺点。同时声明，鉴于我们生产的人道主义性质，我们不能也不会让病人得不到必需的药物。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决定保持生产的连贯性。”

给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送来了扔在城里和造船厂周围的、由“民族团结阵线格但斯克省委员会”签署的传单。

第一张写的是：

“工人们！你们不要卷入旷日持久的罢工。你们要考虑考虑这种罢工是在为什么人效劳？”

第二张写得更明白：

“工人们！你们向当前事件的发起者们问问政治犯的姓氏吧！你们打听一下当前事件的外部教唆者们的履历吧！你们问问他们想要你们干什么吧！”

扩音器里在宣读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又一个声明：

“八月十八日，星期一和八月十九日，星期二两天内又有250多家工厂和企业参加厂际罢工委员会。几乎在所有的工厂里都是占领性罢工。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我们是我国劳动群众第一个真正的、自由的代表。

我们期待中央当局的到来。每拖延一天都将是当局不愿承认波兰劳动者有权选派出自己真正的代表的证据。每拖延一天，对于我们由于领导的过错而危机重重的经济来说，就是上十亿兹罗提的损失。”

格但斯克“海尔巴波尔”草药工厂的声明：

“在我们厂工作的80%是妇女。她们中不少是一家中唯一供吃喝的人，很抱歉，应该说是：一家中唯一的供养人。我们不上班，我们不接受工作，那些给各药房分送草药的人例外。”

弗热什奇格但斯克建筑公司：

“我们公司的领导企图成立‘三人小组’跟当局代表进行谈判。我们拒绝了厂长的建议，我们不同意成立任何三人小组。”

格但斯克火柴厂：

“我们从星期一就罢了工。市场上没有火柴卖了。厂领导在向我们施加压力。怎么办？”

“罢工！”

“不，应该生产火柴，这是人民需要的！”

大部分代表支持第二种意见。

“谢谢，我们将生产火柴。”

公报：送来了格丁尼亚一些不留姓名的园艺家的礼品：40公斤西红柿和10公斤苹果。

公报：联合医院的护士和卫生员来信说，她们的心是同我们在一起的，但她们不能罢工，因为病人的利益是她们的最高目标，她们这样宣过誓。她们的信最后说，祝你们坚持下去！

波兰轮船救生维修公司：

“在得知罢工工人的要求之后，我们完全支持21条。上述各项要求不会威胁波兰人民共和国制度的基础。我们成立了团结委员会。”

瓦文萨：

“重要消息。我们同船舶修配厂和北方造船厂重新联系上了。寻找电器测量厂代表的工作还在继续。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那里一切正常。我们在正常罢工。”

公报：自八月十六日到二十日在三号大门前向居民们募集了161,000兹罗提的捐款。

瓦文萨：

“地方报纸发表了对我们的种种诽谤性言论。我们要求，报纸要实事求是，要及时，要有言论自由。第二件事：在二号大门口发一个公告，如果没有厂际罢工委员会的通行证就别放出租汽车进厂，因为某些人士企图坐出租小汽车进来。第三件事：他们砍掉了我们的燃料油。当局对我们的这个打击真是又狠又准。我们的汽车开不动了，我们的联络车辆也没法开了，必须向社会呼吁捐献汽油。钱有的是，简直没法花，但是需要汽油。否则事情就不好办了。这並不意味着我们要输了。我们提出一个附加条件：如果不恢复我们的电话联络，不供给我们燃料油，我们就不接受谈判。如果他们要强行进厂，我们就手拉手地坐

着不动，让他们把我们抬出去。把这件事通知各厂。我们不能投降。”

“发行员”劳动合作社通知，说他们乘车到“巴黎公社”造船厂去取汤，同时也带回了传单。他们对一份传单有意见，因为那份传单号召三联城的电气火车罢工。这个号召是不正确的，这样做会破坏城里的气氛。顶多可以部分地限制流量，但电气火车不能停开。

大厅里出现了混乱状态。是谁发出的这种传单？是谁签的字？

巴黎公社造船厂的代表发言，罢工工人的最大的一家印刷所就在那座工厂里：

“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传单。你们都记得，出现过形形色色名目繁多的传单，其中也有挑衅性的。如果没有签名，就不是我们印刷所出来的，我们对此不负责任。”

公报：来了一个从前的国家军战士代表团，他们想给造船工人捐款，但一定要亲手交给安娜·瓦伦滕诺维奇女士。

公报：在二号大门来了两位神父，马上就要举行圣餐礼，如果有人愿意，也可以举行临终涂油礼。

公报：造船厂有63人到献血站去献血17.5公升——给托伦附近火车事故的受害者。那儿还有60个从炼油厂去的人。我们正着手组织固定的献血活动，因为三联城的医院里也开始缺少血液供应了。

公报：有人在广播站接了根线，企图播发假消息。马上检查线路！

波兰保险公司的代表站在讲坛上：

“今天经过长久的协商我们宣布了我们的15点要求，但是我们没有中断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是在为居民工作。是应该

工作？还是中断工作？”

大厅里响起了混杂的声音：“工作，”“不工作。”“居民可以等一等再交保险费”。“工作！”最后一个声音占了上风。

“好，我们将提出我们的要求，同时正常工作。”

有人鼓掌，但掌声很弱，越来越弱。波兰保险公司的事情解决得不怎么好。不好办，既然已经如此，也就只好这样了。

鲁米亚船舶设备厂：

“我们向厂领导提出的要求都已得到满足，但是只有在厂际罢工委员会宣布复工的时候，我们才复工。”

暴风雨般的掌声。

“在我们开车到这里来的路上，民警拦住了我们。他们问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回答说到造船厂去。他们拿去了证件，登了记，很客气地交回来了，他们还祝我们一路顺利。”

掌声。

会议休息的时候我们抓住了一直被人团团围着的安娜·瓦伦滕诺维奇。她没有时间谈话，没有时间回答记者的问题。“你们写吧，”她说，“只有一点要说明，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尊严，我们在谈判中可以在许多问题上让步，但我们永远不会屈服，因为蔑视我们工人的尊严的时间太长了。”

一个年轻姑娘手捧鲜花走上讲坛。

“这是教师们送给造船工人们的花，祝大家坚持到底。”

从西里西亚来的两位女士站在扩音器前。欢呼！大家都站了起来……两位女士有些腼腆，说话语无伦次，她们解释说，她们只代表自己（她们看来确实是偶然到格但斯克来度假的），但她们会把波罗的海海滨的好消息，把造船工人英勇斗争的全部真实情况带回西里西亚，带回下西里西亚去。“我们同你们在一起！”她们说。

“工人的西里西亚万岁！”大厅里响起了口号声。

“全世界都在谈论你们！”泪流满面的下西里西亚女士接着说道，“你们不要屈服，但愿波兰女王圣母玛利亚鼓舞你们前进！”

此刻农业小组合作社代表团来了。

“现在是秋收。我们该不该工作？”

“当然应该！！！”

公报：从居民那里募集来了30公升汽油，谁急需可以来领。

瓦文萨怒气冲天地说：

“我们吩咐用我们的汽车给人们分送粮食，他们却卡我们的汽油，是何道理？人们总得吃饭呀，让省长，省长先生，给我们燃料！”

克维齐尼代表团，一位搬运工人：

“很遗憾，纤维厂复工了，别的工厂也复工了。此刻在克维齐尼只有我们第七队在罢工”。

大厅里一片沉默。也有失败，必须加强工作。

广播站在播送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304名成员的声明：

“我们的要求的第一点具有关键性的意义。没有独立工会，其他各条将来都会成为泡影。在波兰人民共和国短暂的历史上，这种事发生过不止一次。官方工会过去和现在不仅没有保卫我们的权利和利益，而且在对待罢工的正义行动上，他们表现出来的敌对态度比党政机关有过之而无不及。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什德拉克同志对于罢工行动所发表的言论最为激烈，他却自认为是劳动者利益的捍卫者，其实他代表的是对国内最近几天的局势负有主要罪责的机构。”

杨·什德拉克在最近同所谓格但斯克省积极分子会见会

（参加会见的有 14 位厂工会委员会的代表，只占现存的厂工会委员会的一个极小的百分比）上的发言中，不认为对工会中央理事会迄今的态度提出批评是值得称道的。他甚至连像党和政府的发言人那样做一点点自我批评都不肯。他把我们的罢工说成是敌对势力和恐怖手段的表现。他的话都是气势汹汹，带威胁性的。什德拉克说，“我们不交出权力，我们不跟他们分享权力。”他这样说就是告诉公众舆论，他想不经我们的同意而当上我们的代表。我们的授权对于他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厂际罢工委员会和全体罢工职工对于工会中央理事会的这种官方立场不能不闻不问，他们认为有必要对它作出答复。这个答复就是厂际罢工委员会所属全体罢工职工的代表关于退出党和政府控制的工会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在今天的会议上于 10 点 20 分通过的。

“我们的罢工得到了全国的支持和同情（……）因为我们提出的 21 点要求是非常合乎情理的，是非常人道的（……）工人们不是在为一口残羹剩饭而斗争，而是——正如我们的口号所说的，‘为整个祖国争取正义’。我们一定要起来反抗地方当局和主管部门所采取的分裂我们罢工运动的一切图谋。我们是‘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也要自由地活着’这句话的当之无愧的继承者（……）各个工厂的罢工委员会不应同政府当局进行任何涉及到我们共同要求的谈判。我们过去呼吁过，现在继续呼吁政府代表来同我们进行这种谈判。迟迟不同厂际罢工委员会举行谈判只能使自己越来越站不住脚。我们早在本月十六日星期六就准备进行这种谈判。厂际罢工委员会是使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实现工人的要求的唯一保障。”

瓦伦滕诺维奇在一旁讲这家造船厂罢工初期的情况。

“我们没有打字机，没有广播站，甚至既没有印泥，也没有图

章。一切都是人们从城里给我们带来的。”

水果加工工厂代表团：

“我们是不是继续工作？如果不工作，水果就要烂了。如果工作，我们需要煤、糖、酒精。”

主席团：

“这得马上解决。我们一定能解决。你们工作吧。”

公报：整个什切青都停工了！电视台于16点15分报告了这个消息。

暴风雨般的掌声，全体起立。他们已经不是孤军作战了。

主席团的声音：

“瞧，政府‘高瞻远瞩’的政策导致了什么？罗兹也部分停工了。纺织工人跟我们站在一起！”

斯塔罗加尔德的“海王星”电视机工厂：

“我们厂职工已经投票表决通过了退出工会的决定。”

肉类加工工厂：

“我们在上班。但是，一旦我们得知，这儿造船厂里，你们得不到熏肉，我们就自动停工。”

17点35分，瓦文萨就所传“保卫工人委会员”在领导厂际罢工委员会一事，发表严正辟谣声明（“保卫工人委员会”是一个政治反对派组织——译者注）。

“虽然，他们给我们做宣传是事实。但我们只是，也仅仅是劳动者的组织，我们和其他的组织没有关系。我们自己领导自己。为了实现我们的21项要求，我们必须在这里坚持斗争。不错，这里有许多外国记者，因为全世界都对这件事感到兴趣。”

过了一会儿，他说：

“下一次全体会议于20点召开。现在各位代表可同自己的工厂联系。”

公报：波兰作家协会青年组送来437兹罗提。

昨天同政府委员会谈判的那十几个工厂的情况不明。谈判已经中断，佩卡已被召回，但是那些工厂的代表们是否已经回到厂际罢工委员会举行全会的大厅里来了呢？

对这些工厂逐一点名：

“船舶修配厂？”没有消息。

“北方造船厂？”不清楚。

“格但斯克港务局？”

北方港的代表走上讲坛。

“你们都知道，昨天格但斯克港务局同佩卡进行了谈判。我们作为北方港，马上跟港务局脱离了关系，我们将在这里跟你们一道罢工，直到胜利。我们是堡垒！”

“海军造船厂？”寂静，没有代表团。

“拉杜尼亚造船厂？”没有回答。

“电子工业联合企业？”

“波兰煤汽公司？”

“冷藏设备企业？”

“海洋气象服务公司？”

“普茨克机械工厂？”

“海洋技术服务公司？”

“第二热电厂？”

有一位代表：

“昨天厂长拉我们的两个人去参加谈判，但他俩都辞了职。因此，除了厂长之外没有任何人去跟佩卡谈判。我们是代表，我们在这里。一切正常。”

“瓦迪斯瓦武夫的‘纵帆船’企业？”

“维斯瓦造船厂？”

“格但斯克鱼类加工厂？”

18点左右厂际罢工委员会会议大厅里几乎没有上述各厂任何一个代表。但两小时之后，几乎所有的代表都来了。

又是一串声明。

纳格莫尔公司：

“我厂全体职工通过投票赞成罢工。”

波兰远洋公司，汽车公司：

“有人建议我们跟政府成员谈判。我们拒绝了。我们向你们致敬，我们是站在一起的。”

海洋技术服务公司：

“去参加谈判的代表团不是受全体职工委托的。我们继续罢工。”

海洋气象服务公司：

“那个谈判，仿佛是以我们的名义，而去谈判的却是厂长和党委书记。”

北方造船厂：

“我们一直在罢工。”

维修服务公司：

“我们在罢工。”

格丁尼亚的港口工人：

“我们将坚持到底。”

有机化学厂：

“我们是个小厂，但昨天我们也参加了罢工。”

格但斯克—玛奇科夫乳制品厂：

“厂长企图搞一个两人代表团去见省长。我们召集了全体职工，职工们没有同意。但厂长还是带着两个人去了。我们拒绝谈判。要谈判就得跟厂际罢工委员会谈！”

主席团公报：

“很遗憾，机械厂在工作。但埃尔布隆格的厂际罢工委员会答应让它停工，並支持作为罢工的中心基地的我们的厂际罢工委员会，直到最后一口气。”

埃尔布隆格城市绿化企业也在罢工。

地质设计公司：

“我单位全体人员通过投票决定继续罢工，投票时四票反对，九票弃权。”

特切夫的省交通公司：

“省长呼吁我们停止罢工。我们的回答是：我们不理睬他的呼吁。还有一件事：我们的妻子收到了特切夫市政府去谈判的请帖，但是她们不去。”

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的代表再一次宣读了那些——实际上或据说是——参加了同政府委员会进行个别谈判的工厂的名字。格但斯克报纸说共有47家。再读一遍之后却发现，这些工厂中的多数在厂际罢工委员会的会议大厅里有自己的代表团，他们或者是根本没有参加过分裂主义的谈判，或者是从谈判中撤回来了。只缺9家工厂，后来只缺6家。

乌尼莫尔公司：

“我们在罢工！我们和你们在一起！”

波兰汽车—拖拉机销售公司：

“我们为你们募集了1800兹罗提，其中1200兹罗提用于买汽车燃料。”

公报：遗憾的是，在索波特开始了歌曲会演。

公报：救护车被民警拦截，他们怀疑救护车运送传单。

奥利瓦金属铸造厂：

“我厂全体人员只有50名，其中15人在休假，家在农村的

工人放假回家秋收去了。但为了参加罢工有一部分人已放弃休假回来了。我们虽然厂小人少，但我们的心和行动都跟厂际罢工委员会在一起。”

有人宣读省民族团结阵线的传单，该传单说，罢工的参加者如果没有犯罪行为，可不追究任何责任。这把大家都逗乐了，满堂笑声。

大厅里一阵窃窃私语：船舶修配厂回来了！

船舶修配厂的代表进来。全体起立。前所未有的欢呼声。

“只是我们厂的部分人员委托我，叫我先到这儿来，”他小心谨慎地说，“一个钟头或者两个钟头之后，恐怕我们整个代表团就要来了。”

大家知道，那个代表团已经来了，就在厂际罢工委员会的侧厅里。每个人都可以透过休息厅的玻璃墙看到他们：三个满面通红，惶惑不安的小伙子。他们正在同列宁造船厂罢工委员会和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几位委员谈话。他们在竭力寻找一种方案，以便打破两家大厂之间产生的僵局。这两家船厂只隔一道几百米长的围墙，而有一座铁路大门把它们连在一起，如今大门紧闭。这一场戏剧性的交涉就是为了使大门敞开。

傍晚时分，我们在船舶修配厂。在一个小房间里(门上有块牌子：“思想一教育工作中心”)罢工委员会的值班员坐在一台电话机旁，正在心急如焚地给某一个跟“列宁厂”有联系的人打电话。收音机里正在播送地方公报，呼吁那些“考虑到工人阶级和国家的真正利益，同诸如‘保卫工人委员会’和‘青年波兰运动’等敌对组织划清了界限的工厂罢工委员会去跟政府委员会谈判。”

后来，那些对罢工进程和罢工后果负有责任的小伙子们走了进来。昨天，同佩卡会见之后一切都似乎非常顺利，现在突然

给浇了一瓢冷水，因为“华沙”无视已经定下和初步达成的协议。“我们怎么办？”他们问。在本单位的职工面前，他们成了嘲笑的对象，在厂际罢工委员会（它就在一墙之隔的邻居那儿办公）面前，他们成了破坏罢工的工贼。他们看到，在这扇紧闭的大门的两边都站着一大群情绪激动的工人。在“列宁厂”的那一边，是愤慨，但也有希望，相信修配厂的那些人会加入到罢工中来。在修配厂的这一边，是分裂。一些人希望，不管怎样，还得继续跟政府谈判，另一些人则希望到“列宁厂”去认输。但是“列宁厂”的人如今是否会不带讥讽地接受他们呢？这些决定数千名劳动伙伴的命运的小伙子，担心厂际罢工委员会“极端的”、“受反社会主义势力指挥的”的纲领会把国家引向悲剧（佩卡副总理的话是发人深省的），但他们更担心的是，一旦他们脱离了罢工，一旦他们破坏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就有可能在造船工人的兄弟相斗中发生流血。

这一切都发生在几个钟头之前。现在他们都坐在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这个侧厅的安乐椅上，他们已经知道佩卡把他们骗了，他们已下决心跟大多数工人团结在一起。但他们一直不放心的是，他们会受到怎样的接待呢？这都是些二十来岁的人，要他们咬咬牙，把自尊心扔在一边，对整个沿海地区的八百名代表说一句“我们错了，请原谅吧”，那是太不容易了。

但是回头路是不能走的。一个钟头之前，把两家造船厂分开的那座大门终于打开了一道缝，一大群人从船舶修配厂，到了列宁造船厂，人们带着讥讽的欢乐迎接他们，“他们总算是聪明起来了！”

已经是夜晚了。没有一个代表离开全体会议的大厅。大家都在等待。

没有办法，还得走进大厅去。

一切都进行得再平常，再自然不过了。

鼓掌、欢呼，扩音器里传出了简短公报：船舶修配厂跟我们在一起，分裂消除了。

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增补了两名新成员，船舶修配厂和北方造船厂的代表。

八月二十一日，星期四

我们在音乐剧院（也在罢工）好客的院长安德杰伊·采布尔斯基家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清早就到什切青去了。沿途经过斯乌普斯克和科沙林，一路上看不到罢工的迹象。但是，汽车一进入什切青，便看到几家工厂飘着红一白旗帜，大门口有工人纠察队，墙上写着大幅标语：占领性罢工。全部公共交通都停止了，商店和饮食业照常工作，一句话，跟格但斯克一样。

13 点过后，我们的汽车停在 A·瓦尔斯基造船厂大门附近。这里跟格但斯克不同，似乎是更激烈、更严厉。进入大门的通道被罢工当局用两道铁链拦截，他们检查证件，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查。聚集在大门口的人比在格但斯克少得多，只有几十个。他们都在抄写一块大黑板上的罢工要求，共 36 条。什切青厂际罢工委员会提出的要求比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多，其中包括要求追究对造成国家危机局面犯有过失的人的责任以及成立新的政治一社会组织的自由。从他们所提要求的行文、修辞、以及语法错误甚至书写错误来看，这儿没有（至少到目前为止）知识分子作他们的顾问。

“不，报界不能进去，我们不放外面的任何人进去。”他们在大门口挡住我们说。我们要求连络员用电话跟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的成员联系。过了一会儿，他回来说同意。好的，下午 5

点放你们进去，因为那时将开始同卡齐米耶日·巴尔齐科夫斯基副总理率领的政府委员会代表团举行第二轮谈判。

这时，我们便绕着造船厂走走。造船厂是用铁栅栏围着的。栅栏后边是大群小群的工人，有的散步，有的闲谈，有的维持秩序。栅栏里边有一队工人顺着栅栏站着，这是因为他们的母亲、妻子、姐妹和爱人前来看望他们。那一边都是男人，这一边都是女人。妇女们带来了干粮、鲜花和鼓励的话："你们可别投降！"那些最年轻、穿著讲究的妇女，脸上都带着自豪的神色，因为她们的小伙子是这么英勇。罢工自有其雅趣。

跟抱怨罢工给家庭带来了许多痛苦哭诉的宣传大相径庭，妇女们看起来比男人还坚决。

17点整，造船厂大门前排了一条长而密集、悄然无声的夹道队列，政府委员会在十几名头戴工作帽、膀大腰圆的造船工人的护送下穿过队列向开会的地方走去。人群中没有人说一句话。只有那阴沉的、冷漠的眼神……

联络员来找我们，把我们带到全体会议的大厅，再从那里把我们带到后边的一个小房间里去，这里是电话总机室（在什切青没有切断电话联络网，只是不准同格但斯克联络），还有传声设备。

"你们在这里会听得很清楚，"联络员说，"你们可以录音。"

这里跟格但斯克不同，罢工工人态度冷淡，不愿同记者们交谈。也许这是因为，我们是第一批来的记者（除了一个发回许多耸人听闻的胡言乱语的丹麦女记者之外）；也许是因为，瓦尔斯基造船厂的罢工工人四天没有离开工厂，有些疲乏和烦躁。

此刻，在什切青有82家工厂罢工。后来罢工工厂的数字还有所增加。

谈判开始了。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马里安·尤尔奇克主持

会议，他说话简短，内容充实、态度坚决。针对政府委员会在答复36条罢工要求时提出的反提案，逐点阐明了厂际罢工委员会的立场。在提到大部分条款时提出，“我们坚持我们的要求。”在提到某些条款时指出，“同意政府的反提案。”在提到另一些条款时说，“同意在对方立场的基础上进行详细讨论。”

在这里也看得出来，主要争论——而且要一直争下去——是围绕第一条，关于自由工会问题展开的。

我们作为什切青匆匆的过客——观察员，既不想去谈论这一轮谈判的过程，也不想去谈论它的内容，我们只不过是这一轮谈判的偶然的见证人罢了。再说，这一轮谈判所花的时间很短，似乎只是初步试探了一下谈判双方的态度。我们到什切青来只是为了把这里的气氛同格但斯克的气氛作一番比较。果然，这里的气氛与那里的不同。没有那么多的唇枪舌剑，没有那么多的心理——宣传战术。这里是按工人的办法，直截了当：**行**，或者**不行**。

对我们记者的态度也不一样：既感兴趣又怀疑。格但斯克的报刊相当多，甚至太多，因此已经变得司空见惯了。在这里我们却引起了一场小小的轰动。我们同厂际罢工委员会副主席卡齐米耶日·菲施拜因，而后又同尤尔奇克谈话时，周围一直围着几十个工人，似乎是担心我们会进行宣传或挑衅。有时我们还得冒点风险。在我们同菲施拜因谈话的时候，一个老工人突然插了进来。

“我们要求，”他说，“党员不能参加新工会的权力机构。”

我们问：“这是您个人的意见，还是厂际罢工委员会的立场？”

没有回答，却出现了一阵敌对的窃窃私语，而且主席团里马上有人高喊道

“谁放报界到这里来的？经谁同意的？”

几个罢工工人跑了过来，要没收我们的录音带。但尤尔奇克迅速进行了干预。

“是我允许他们进来並允许他们找人谈话的。”

马上就是向我们道歉，气氛一下变得友好起来。

同政府委员会进行的这一轮谈判结束后，便传出了消息，说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杨·什德拉克不顾自己在格但斯克的失败，又到什切青这儿搞他那一套来了。如今他企图在这里的罢工工人中间制造分裂，用的还是那一套幼稚的做法：召集各个小厂厂工会理事会到铁路工人之家去开大会。厂际罢工委员会进行了闪电般的对抗，代表们排队轮流使用两部电话，对本厂员工简短嘱咐一句，“不要同什德拉克进行任何谈判。什德拉克不是政府委员会的。这是破坏罢工的行为。只有厂际罢工委员会有权就我们的要求进行谈判。”

我们夜里动身去华沙，以便向自己的编辑部提交沿海地区事件报告。我们走了一条较远的路线，经过格但斯克，为的是到那里去收集最新的消息。旅途异常艰苦：倾盆大雨，有时瓢泼似地劈头盖脸浇下来；狂风大作，公路上有许多树木被连根拔起。深夜两点，我们到了格但斯克造船厂的门口。在入口处遇上了民警检查，这一次可不像平常那样走走形式，而是长久的、仔细的检查。他们还往什么地方打电话，报告了我们的简历。可也是，深更半夜的，我们的样子一定有点儿可疑。最后他们还回了证件，说，“请吧。”

厂际罢工委员会有几位代表尚未睡觉，虽然他们疲乏得几乎站都站不住了。我们找弗洛里安·维希涅夫斯基和亨雷卡·克日沃诺斯谈了谈。他们说，这一天罢工工厂的数字从304增加到340，“也许更多，很难统计得那么准。”他们都焦躁不安。

他们在进行无线电监听，消息並不令人愉快。代表们在工厂的各个部门找地方过夜。参加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妇女中有一个人精神受不了回了家，直到罢工结束也没有回到造船厂来。她的丈夫在坚守岗位。

政府委员会的新主席雅盖尔斯基副总理已经前来接替佩卡，但尚未跟他取得联系。也许到早晨能联系上，尚不得而知。但是在过去的这一天里政府委员会一直试图同某些工厂，主要是同“三人小组”——厂领导，党的基层组织，厂工会代表——进行试探性谈判。这些“三人小组”即使是在一些小厂里对于罢工职工也都没有多大的影响，甚至没有任何影响。

在政府看来，厂际罢工委员会仍“不存在”，仍不承认它是有全权的谈判对手。

“不承认就不承认，”维希涅夫斯基说，“我们可以等待，甚至可以等很久。人们已经适应了这个环境，自我感觉越来越好，越来越有信心。”

他们给了我们几份文件。其中之一，就是波兰作家协会格但斯克分会的声明。声明呼吁“平静、秩序、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武力，不以武力相威胁。”声明接着说，“罢工工人没有提出——对此我们深信不疑——将来也不会提出威胁波兰安全（诸如用非民主的手段改变国家制度）、削弱同苏联的联盟、降低华沙条约防卫能力的要求。”格但斯克的文学家们在支持成立新工会的同时，呼吁当局同厂际罢工委员会进行谈判，认为这是“尊重罢工工人团结的道义价值”的表现。

第二份文件是厂际罢工委员会今天的声明，摘要如下：

“众所周知，有人在有目的地、挑衅性地拖延举行谈判。（……）厂际罢工委员会代表所有的工厂再一次呼吁当局举行谈判。（……）只有诚心诚意的、民主的对话才能结束罢工。（……）罢

工人员不会破坏波兰民族的团结，不会有损于波兰国家。如果当局希望证实这一点，那就请他们到罢工人员这里来。”

我们开车到华沙去。幸好风暴减弱了，早上9点我们到达首都。这里一切如常，似乎波罗的海海滨的回声传不到这里，似乎国内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其实很难说，这是好还是不好？

八月二十二日，星期五

已经是罢工的第九天了。罢工经历了不同的时期和阶段。在罢工的开头，在最初的几天里，罢工工人把重点放在工资和生活要求上。这类要求最能团结人，使人能忍受罢工生活的艰难困苦。当时罢工进行得最激烈，人们在受到考验，在精神上受到锻炼，同时拚命发泄自己的怒气，表明自己的信赖。人们要求释放一些人，恢复一些被解雇的人的工作。当时罢工的命运尚摇摆不定。年轻人是运动的动力，因为只有年轻人才敢于孤注一掷，从过去的经验中得出积极的结论；而成年人的心中则主要是担心害怕以及前几年，前几十年带来的失望。下一个阶段，也是最短的一个阶段，有那么几天，对于许多人来说是喘口气的时候，当时造船厂部分人员回家去了，回厂之后，罢工的信心更加充分，顾虑更少了。因为罢工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越轨行动越来越少，罢工中可以按照“正常的”节奏生活——一日三餐、报纸、香烟、会议、讨论，讨论时也开始允许那些对某些要求的现实性表示怀疑的人的发言。罢工已不再具有破坏性，而是对所有的人有力地起着建设性的影响了。

厂际罢工委员会也意识到了自己作用的变化。在罢工初

期，最关心的是罢工的力量和团结。这一点他们已经办到了。人们决心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尽管这样做会给他们个人带来痛苦。在许多情况下，参加罢工的工厂舍弃了自己一部分要求，尽管他们对这些要求的重要性深信不疑，但是一旦提出这些要求，就有可能超越 21 条要求中规定的界限，而 21 条是大家一致通过的，他们便舍弃自己的要求。这就是格但斯克罢工行动团结一致的证明，说明罢工者深刻地意识到，不能让一些人能得到一些东西，而另一些人——弱者什么也得不到。

但是，应该从战斗的罢工阶段过渡到谈判的阶段，这就需要有一些头脑冷静、具有调停本领、实事求是而同时又有威望的人来进行。工人们，厂际罢工委员会的成员们也深信应该如此。于是他们请求学术界人士同罢工工人一起共同挑起这副担子。这並不是工人和知识分子相互支援的第一次尝试。在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工作的已经有文学家莱赫·邦德科夫斯基和格但斯克工业大学讲师沃伊切赫·格鲁谢茨基。

星期五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罢工日，看看造船厂和城市，可以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像往常一样，工人们成群结伙地在议论，到食堂排队买饭；纠察队坚守岗位；发表各种组织公报；猎取写有诗歌或厂际罢工委员会声明的传单。代表们坐在烟雾弥漫的大厅里，互相讨论问题，交流经验和提出要求。

但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政府委员会的成员们在同各行业进行谈判，並由地方电台转播。午后，不啻是霹雳一声，传来一个消息：菲什巴赫到了“公社”（指“巴黎公社”造船厂——译者注）。使人感到惊讶的，不是菲什巴赫到某一个工厂去，（因为大家都相信，他不论到哪里去都不会吃闭门羹）。而是他去的恰恰是“公社”这个厂。那里的罢工是最具有斯巴达的性质的。这一下可真像闯进了马蜂窝。

省委第一书记塔德乌什·菲什巴赫和部长安杰伊·耶迪纳克在“巴黎公社”造船厂参加情况汇报会。这一次一切推测都是多余的。看起来，菲什巴赫对“巴黎公社”造船厂的造访预告了副总理将同厂际罢工委员会举行谈判。菲什巴赫是这里的船体二号车间党组织的成员。他是来跟自己的同志们会面的。他受到了亲热的接待，他在造船厂里不感到陌生，也不觉得不友好，但是谈话却和这些日子里的真情一样，是沉痛的。罢工期间对当局的愤怒、抗议，同样也转移到党员身上，这是可以理解的。党员们觉得自己对于导致罢工(现在他们本人也参加了)的局势应该分担责任。与此同时他们又感到自己对罢工及其进程也负有责任。现在不是强烈反驳那些並非总是有根有据的指控的时候，而是应该跟同事们在一起，跟劳动伙伴们站在一起，跟他们一样劳动，跟他们一样罢工。因为大家每天所见所闻都一样，並为此感到自己负有责任。起来进行罢工，同时也是自己反对自己，这样做是不是比别人困难些呢？是要困难一些——他们每走一步，甚至一有机会就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他们说，他们过去对那些坏事都说起过，都敲过警钟。党员中有些人早在10年前就提出过一份要求，共60条，在党内，和在他们的基层组织内被认为是必须实现的。但是他们没能实现，他们缺乏力量去实现他们确信是正确的东西。重要的是意图，而那些意图对于所有的人来说是共同的。罢工者们的路在这里汇合到一起来了。

菲什巴赫对自己的同志们说，“首先得是个人”。如果接受这个准则，那么不论是在罢工时期还是在罢工结束之后，就不会有党员——只有个别例外——不敢正视自己的亲人、同事和同志们的眼睛。

在“巴黎公社”厂进行的谈判使政府委员会的成员们确信，

工人们和罢工委员会主席主要强调的是所提要求中的头几条，特别是强调成立自由工会；同时也使他们确信，只有同厂际罢工委员会举行谈判，才有希望实际解决问题。

几乎全体罢工人员都是不间断地呆在厂里，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扳盖小房子的“罢工建筑”发展了起来，主要是为了把人吸引住。罢工工人对新生活越来越适应了，唯独没有女人使他们很难受。一个工人来找安杰伊·科沃杰伊，向他要出入证。

“你知道，我真想回去看看老婆……”

科沃杰伊马上对工人群众说：

“你们觉得怎么样，我们大家都在这里熬光棍日子，是不是同意他回去看老婆？”

“不行！！！”

“公社”的罢工制度依然是严格的。与此同时，那个造船厂由于跟厂际罢工委员会经常取得联系，关于谈判的情况消息灵通，对外部的宣传具有抵抗力。北方造船厂、船舶修配厂以及什切青的瓦尔斯基造船厂的工人的情绪比起“列宁”厂的工人情绪来都要更强硬，更无产阶级化。

在厂际罢工委员会登记的工厂已有400个以上。仍有许多代表团从全国各个地区来到这里。正义感和力量感在增长。责任感也在提高。厂际罢工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声明，该声明在全体罢工工人中和在城里广为传播。声明说，“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过去从未使人失望过，今后也永远不会使人失望。今天他们通过自己政治上的智慧，严守纪律的精神和为全民族谋福利的热切愿望，对此提供了光辉的证据。厂际罢工委员会代表所有的工厂，再一次呼吁当局举行谈判。”

声明的内容有一部分已经过时了。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的弗洛里安·维希涅夫斯基跟雅盖尔斯基副总理取得了电话联

系。不久之后便举行了主席团三成员和雅盖尔斯基之间的秘密会谈。主席团的成员解释了罢工的起因，向副总理介绍了主席团全体成员的姓名，还向他说明：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只代表自己的职工和他们的愿望、要求，这些愿望和要求不带政治性质，罢工工人不是受反社会主义集团策动的。

“我们是自己的职工们的真正代表，我们是根据波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举行罢工的，请您相信我们。”几天之后，维希涅夫斯基坦率地说出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谈判是不容易的，但它不仅对于我们，罢工工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在索波特的森林歌剧院里还在进行最后几场歌曲会演。观众寥寥无几，与每年的歌曲会演不同，前面许多排的座位上常常空无一人，看得出来，“官方人士”没有时间来享受会演的欢乐。但是会演仍在进行，因为，正如大家所说的，电视台总得应付差事。任何事也不能阻碍这家殷实可靠的商号去完成它的基本职责。演唱的有古巴双目失明的声乐家和作曲家奥斯瓦尔多·罗德里格斯，芬兰的马廖恩、苏联的尼古拉·格涅丘克和阿利恰·马耶夫斯卡，她刚唱到：“那里还在闪烁着白帆”，便有人接着唱：“每个人的好运只有一次……”

昨天由64位知识分子签署的呼吁书的内容传到了造船厂。这些知识分子呼吁政府委员会承认厂际罢工委员会，呼吁双方保持温和和理智。下面是该呼吁书的片断：“当前，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也许是危机的时刻。但谁也不会说，事态的发展使他感到意外。並不是没有出现过要发生政治经济危机的信号。但是人们忽视了这些信号，于是危机就来到了……今天波兰工人以其政治上的成熟和果敢为争取自己的权利，也为我们大家争取更美好、更相称的生活在进行斗争。全体进步的知识分子在这场斗争中是站在工人一边的。这是波兰的传统，这是时代的要

求。如今一切都取决于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来摆脱当前的危机。我们呼吁政府当局和罢工工人能选择一条谈判的道路，妥协的道路。任何人都不能采取任何不法行动或暴力，也不能尝试动用武力。10年前的悲剧再也不能重演了……今天我们民族的最高利益要求新建立的政府委员会立即同厂际罢工委员会举行谈判……在防止已造成的局势出现最可怕的后果的同时，也应尽快向整个社会充分介绍罢工的情况，开展真正的全民族的讨论，並创造条件去共同寻找改进的办法。我们所有的人——不执政的和执政的——都应以波兰的利益为重。在当前的局势下，应该力戒刺激，力戒使用欠考虑的言词和对人搞侮辱性的分类来分裂社会。在我们的记忆里，败坏别人名誉的仇视运动搞得已是够多的了。让我们大家学会互相尊重我们的人格吧。在这困难的时刻需要温和和多思。为摆脱今天的危机，就要求抛弃动辄把一切要求进行必要的政治改革的行动看成是违背国家利益、威胁国家制度基础的那一套呆板公式。为摆脱今天的危机同样也要求公众在争取自己的权利和更好的生活条件的正义斗争中持温和态度。要求大家认识到国家的困难局面。今天唯有审慎和多思才能在祖国利益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如果有人试图不通过协商的道路而采用什么别的解决办法，历史是不会原谅他的。我们呼吁走这一条路，我们呼吁审慎和多思，因为我们深信，当前对于波兰再也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了。”

代表们从雅盖尔斯基副总理那里走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0点钟了，代表们回来之后便召开了主席团秘密会议，会议在午夜前结束，向代表们发表了关于进行初步谈判的公报：“厂际罢工委员会三人代表团把一份要求进行谈判的呼吁书交给了部长会议副主席。副主席接见了代表团，並确认收到了呼吁书。决定第二天由格但斯克省长同厂际罢工委员会的代表进行初步

谈判。”欢声四起，喜气洋洋，人们热泪盈眶。

迟早要进行谈判，这一点双方都清楚。然而，在这造船厂里，人们却在日夜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这种期待反过来既使造船厂工人对他们造反的正义性深信不疑，同时又引起了不安。最大的威胁是全国其他地方不了解他们行动的性质。

雅盖尔斯基接受谈判，开始了罢工的新阶段——谈判阶段。他们许多天来在主席团和在全体会议的讨论中一直在准备着这次谈判。谈判是公开的，由电台和电视台转播，谁也没有秘密。主席团对每一个决定都跟代表们商量，代表中的意见分歧也公诸于众。谈判，就其本身性质来讲，必不可少的是保密。但是，怎样才能学会这样去做呢？

主席团会议之后，瓦文萨会见了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和布罗尼斯瓦夫·盖雷梅克教授，他们是前述知识分子呼吁书上的签字者派到造船厂来的代表。他们是要用亲临造船厂这个行动来证明他们同罢工工人的团结。瓦文萨问道：

“可是你们能给我们些什么具体帮助呢？我们在许多问题上需要帮助。”

根据盖雷梅克的建议，产生了成立专家委员会的设想。第二天，马佐维耶茨基编辑被授权组建专家委员会的班子。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在挑选人员时遵循的是有可能采取共同行动和具有彼此可以指望的知识的原则。

瓦文萨在宣读了公报之后，拒绝向记者提供任何补充消息。

本书作者在这里例外地离开了顺次叙述这几天的罢工事态的写法，而插进了莱赫·瓦文萨在罢工结束后的几天里对我们所作的一次答记者问。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认为瓦文萨的讲话对于理解有关罢工和谈判的某些情况特别重要。

我们问瓦文萨：“罢工期间造船厂里每天举行弥撒。主席

团办公处挂起了十字架。您在签署协议的时候胸前挂着念珠，这岂不是使未来的独立自治工会有搞宗教忏悔之嫌吗?”

“不，不，绝对不会。我把事业放在心上，放在良心上，我是个虔诚的教徒，但我永远不会导致这种状况。形势过去和现在都是困难的，常常促使我们去进行反省和思考。过去在造船厂里有严酷的斗争，现在也一样。没有这种内在的平衡，在某些关头，没有这种内在的压力是没法前进的。至于罢工期间常举行弥撒，这并不是什么深谋远虑的决定。我是个教徒，我需要这个，既然我有需要，我就建议举行弥撒。在这些问题上教会没有给过我们任何帮助，我们也不希望教会帮助我们，但我们希望把事业放在良心上。教会有它自己的事情。”

“厂际罢工委员会，今天的独立自治工会联合筹建委员会是否感到有力量履行自己承担的义务呢?”

“委员会本身没有，因为不论是我还是我们之中的任何人，都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现在必须有内行，专家，他们将领导事业，而我只不过是起个协调一致的作用而已。”

“在厂际罢工委员会里，当前的联合筹建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以及专家组里，有许多人都比您强，学识也丰富得多。您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使您的意图能够得以实现，您是从什么地方学会这种最完美地解决问题的技巧的?”

“天意。”

“?”

“克服障碍的力量。我过去的活动足以证明，因为我领导过罢工，我被解雇过。这在初期阶段是足够了。到后来需要有别的手段，我便随着需要一点一点往外拿。一旦需要，我会变成个缺乏教养的、蛮横无礼的人。我斗起来很激烈，虽然我不喜欢激烈的斗争，可是有时就得这样。不过，到需要限制厂长自由的时

候，我却没限制。各种情况都有。”

“倘若您和专家们或主席团的意见分歧有导致分裂的危险时，您将怎么办？”

“我有这种克服障碍的力量，将来也会有。如果我知道哪一群人不好，我就说出来。我会在全体会议上说，我将把事业进行到底，而且一定会赢，但是我得选择人，换掉那些干得不好的人。这一点我能办到。我会毫不客气地进行清洗，因为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事业，这个大厅里的所有人都会支持我。”

“您对跟雅采克·库龙的合作有什么期望呢？”

“他有经验，我了解他，我喜欢他也尊重他……我可以采用他的建议，但不是非采用不可。他不享有决定权。可是，如果他有道理，我会接受他的某些意见，为什么不呢？谁给我出的好主意我都接受，作为对方顾问的帕耶斯特卡教授的好意见我也接受。”

“难道同雅采克·库龙的亲密关系不会被认为是……（这句话我们没能问完）。”

“不，没有任何的亲密关系。或许在某些时刻我们会听他的，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时刻。我不会允许别人伤害他，因为我和许多人在许多方面都多亏了他的帮助。但是，我不能让他凌驾于我之上，我不会卷入那……我有我的目的，我有我的任务，同时我也有能力办到。我靠我自己的双手，靠这儿的人手。我没有必要用库龙或别的什么人的手去做这件事……这是实情。不这样不行，否则我会把他扔掉，我会干得出来的，你们自己也看到了。正如我所说过的那样，我们不过做到了可能做到的事。我有一种直觉，也不止是我，还有我们的顾问们，我们都知道，要不要把保卫工人委员会卷进来，我们心里有数。”

“您是否能证实，在罢工结束之前，在跟政府委员会谈判的

间隙期间，曾经有过许多危及协议文件签字的因素？”

“我曾经不得不做更多的工作。”

八月二十三日，星期六

《波罗的海日报》在第一版上印了个三栏标题：“一支歌的道路和绝路”。这是报导一场重要会演的。旁边是一篇没有署名的编辑部评论：“想想明天”。这篇评论开头像文学作品一样：“港口和造船厂起重机的长臂凝然不动地伸向蓝天，吊车停止了工作，车床、混凝土搅拌机停止了工作，听不到熟悉的有轨电车的叮当声和公共汽车柴油机的轰鸣……”写这篇评论的人只顾欣赏自己的文笔，却全然不顾文章读起来会产生怎样的效果。他恐怕既没有想到那些正在罢工、并且知道为什么要罢工的人们的耐性，又没有想到那些满脑子装的是21项要求，深信它会付诸实施、会给每天的工作和生活带来轻快感的罢工者的家属们的耐性，也没有想到当局——它充分意识到这个关头，特别是这个星期六的分量——的耐性。报纸没有报导关于举行谈判问题达成的协议。

罢工工人对厂际罢工委员会昨天的公报又持不信任的态度，不相信自己派到厂际罢工委员会的代表，而那些代表也是越来越留神地注视着主席团。消息壁垒——我们可以这样称呼它——仍未打破，沿海地区同全国各地仍然没有电话联系。

城市是平静的，或许人要比平常多一点，因为是星期六，不工作的星期六……没有醉鬼，民警只记录了些偶而出现的流氓行为和偷窃。饭馆、咖啡馆里空无一人，即使有的剧院没有罢工，上剧院的人也寥寥无几，去电影院的人也很少。

造船厂里同样一切正常。罢工已有相当时日，足以使得罢工机器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转，而不以外部的反对或来自大门外的好消息为转移。

在连接主席团会议室和厂际罢工委员会全体会议大厅的过厅里，在衣帽间的柜台后面，每一张办公桌就是一个罢工办事处的小窗口。在一个这样的办事处里正在进行新参加厂际罢工委员会的人员登记。“职员们”彬彬有礼，但有时缺乏耐心去解释他们为什么要搞点形式主义，为什么如果哪位代表身份证里工作地点的图章跟派他作为全权代表的工厂名称不相符就不给登记。但他们解释说，他们要组织“经过考验的”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到新参加的工厂去传达指示。在登记处和问讯处的旁边，是通行证发放处。每一位代表和其他不在造船厂工作但希望在造船厂走动的人，例如记者，都可以领到通行证。在这里，官僚主义以雪崩之势在增长。最初的手续是：证件，核对履历，验明照片，发通行证。当时就办。过了些时候，坐在那儿办公的一位女士成天干的就是把普通长裤换成灯芯绒裤子，后来再换成裙子，裙子又换成一套西服，先是浅色的，后又是淡褐黄色的，再往后就跟每天常见的一样了。再旁边是出纳处。这里的工作精确，安静，凡事都“当面”办妥。交纳的每一笔款子都要开证明，说明用处。瓦伦滕诺维奇太太在这里监督，捐献者经常只希望把钱交给她。再说瓦伦滕诺维奇太太又是这样一位好姑妈，谁家里需要照顾她都去关怀。主席团大厅的入口处由一位身材魁梧，年富力强的造船工人守门。这位“老爷爷”永远是那么幽默和安详。可他什么时候睡觉呢？

政府委员会还在试图跟个别工厂举行谈判，不仅是跟那些还在生产点什么的工厂。譬如说，在医学院里了解医疗卫生问题（涨价，投资），而在格丁尼亚的波兰远洋公司所在地了解航运

和渔业职工们提出来的许多问题。代表们都知道，这是些行业性的谈判，但是今天这些谈判使人很生气。加之报上没有消息，民族团结阵线省委员会又发了传单："政府委员会同各厂罢工委员会举行谈判。接受这种谈判原则就是寻找一条道路以摆脱对于我们大家来说都很困难的局势的现实机会。请大家考虑一下，能够罢工多久？一边工作一边寻求达成协议岂不是更好吗？难道我们大家真的必须有所失吗？"

12点40分，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说，"我们几乎彼此都伸出了手。作出了有关谈判的初步决定。"

各工厂的代表们以及通过无线电设备一直在注视着厂际罢工委员会一切事态的造船工人们都感觉到了即将来临的时刻的严肃性。他们用自己的态度、组织性、行动的一致性和愿望使当局相信，同厂际罢工委员会进行谈判的要求是正确的。

第一期罢工通讯《团结报》出版了，上面刊登了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全体成员的姓名和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结社和罢工权利的公约。

14点，格但斯克省长耶日·科沃杰伊斯基教授根据昨天的决定来到造船厂。他是政府委员会中第一个到造船厂同厂际罢工委员会举行谈判的人。这位职业的建筑家，由选举产生的政治家终于克服了采取这个步骤的种种疑虑。代表厂际罢工委员会方面出席会谈的有：莱赫·邦德科夫斯基、博格丹·利斯、安杰伊·格维亚兹达和兹齐斯瓦夫·科贝林斯基。莱赫·瓦文萨和克莱门斯·格涅赫以观察员的身分出席旁听。谈判取得了预期的结果。确定了谈判条件並决定于今晚20点开始谈判。

代表会议的大厅里在准备同政府委员会的会见。摆桌子，放椅子，对大厅进行必要的通风。桌上摆了各种不同牌子和质量的磁带录音机。

瓦文萨："谁的神经不健全就别让他参加。我们必须表现出我们的坚决态度，但得有礼貌！

鼓掌为时尚早！

只有主席团成员参加谈判。谈判内容由广播站转播。过后你们再告诉我们，我们什么做得不好，什么做得好。你们将作出决定，我们只是谈判。"

雅盖尔斯基副总理和政府委员会按预定时间于下午8点整到达造船厂。在二号大门前让出一条道的群众用拳头敲打委员会人员乘坐的大轿车。情绪敌对。进了大门，汽车经过数百名造船工人组成的夹道队列。下车后又是夹道的人群。一双双沉默的眼睛盯着副总理不放。有个人鼓了掌。副总理率领委员会进入沉寂的厂际罢工委员会全体会议大厅，跟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见面。挤来挤去的摄影记者和电影摄影师打破了寂静。

政府委员会和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的成员走进一个会议室，他们将在那里进行谈判，谈判将由广播站向全厂转播，并通过安装在各座大门上的扩音器向厂外转播。

确定会谈一开始由双方介绍各自对罢工工人提出的21项要求的观点。会谈时间限定为两小时。

米耶奇斯瓦夫·雅盖尔斯基表示自己对谈判者充分尊重，并表明了自己的谈判诚意。他就第一项要求谈到政府委员会的立场。

"工会活动是全国职工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劳动人民、对于国家的今天、明天和将来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理解，这一条要求的意图是，希望工会享有实际的权威，成为每个工人、每个工作人员有效的代表。我想借此机会指出，我作为政府的代表触及到了一个不在政府管辖范围之内的问题。我们既不能给工会规定章程，也不能规定它的活动方式……"

雅盖尔斯基副总理在继续发言中提醒与会者说，业已着手制定关于工会的新的法律草案，他承认，当前的机构已经过时，应该改变，充实新人，可以把“自己人”送进去。

“在当前事件的浪潮里涌现出各种各样的人物，你们自己也清楚，各罢工委员会的成分是不同的。在这些罢工委员会里，有的人享有真正的威望、具有真实的才干和真正的活动家的气质。为什么这些人不能进入厂工会委员会或工会的其他机构呢？这件事得由你们来决定，得根据你们的意见办。在这一点上我们恐怕是一致的，即工会应该更好地、更有效地代表劳动者的利益，维护他们的权利——这是第一点。第二，应该定出一些办法和措施来制止冲突局势的发展，学会有效地解决劳动界的各种冲突。第三，工会对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其中包括工资政策和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应具有更大的影响。工会和行政当局的对话不应成为难得的盛事，而必须成为平等伙伴之间的对话，工会法的修改和由工会进行的不以政府的结论为转移的对生活费用增加的调查研究都将有利于这种对话。工人自治法也将修改，修改方案的制定工作已处于最后阶段。”

下一点涉及到罢工权利以及罢工者和援助罢工者的安全问题。

雅盖尔斯基：“我们在这儿研究罢工权利的问题。不过，我们是否能够在当前条件下作出决定呢？要知道，在当前条件下是不宜就这个不仅对我们，而且对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来说都很重要的问题征求公众意见的。看来是，还不能作出决定。但这並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我们可以把这项要求看成是有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维希涅夫斯基：“不能这样提问题。用不着去寻找什么‘公众意见’。我们在这里就代表着382家工厂的职工。外面对我

们造了许多谣，可我们就是公众意见。”

雅盖尔斯基：“至于说到罢工者、支持罢工者或被支持者的安全问题，他们都不承担任何后果。只有触犯波兰人民共和国法律条例的行为，诸如：盗窃、破坏财产、使用暴力等例外。”（副总理的这番话在造船厂里引起一片唿哨声和不满的喧嚷声。）

维希涅夫斯基：“问题不这么简单。谁搞罢工马上就可能被解雇。许多工厂都是如此。这些问题得解决。我们这儿有许多人被逮捕，而且是由于政治原因。”

雅盖尔斯基：“可以给我一份名单吗？”

厂际罢工委员会的代表向副总理提供了他所要的资料，並请副总理对独立出版物表态。

雅盖尔斯基：“先生们，这个问题是否允许我下面再谈？”

要求中的下一点涉及到恪守宪法保障的言论、印刷和出版自由，其中包括不压制独立出版物以及向各种信仰的代表提供群众性传播工具的问题。

雅盖尔斯基：“毋庸置疑的，有宪法保障的言论、印刷和出版自由，自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在执行过程中，在实践中成了不安定的根源……我们必须，也只能根据我们社会主义民主的各个机构的职能这一点去看书报检查活动……群众性传播工具的监督机构在职能方面的变化将是这个过程的因素之一。我们大家所关心的是，消息应是充分的、真实的和可靠的……我们都赞成必须清楚、精确地规定书报检查活动的原则……这份精确规定原则的文件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这个问题在一个短促的谈判过程中，在当前紧张的局势下，是很难一下解决的……先生们，你们谈到过不压制所谓的独立出版物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解释。因为这类出版物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从批评性的，但还是立足于宪法规定的制度基础

上的内容，到诽谤性的——让我们说明白——即反社会主义的、企图破坏我们的联盟关系的内容都有。我们有许多证据。问题也正在于此。”

接着，副总理对向各种信仰的代表提供群众性传播工具的要求表态，他说，这不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过”，他说，“存在一个提供那些全社会性的工具到什么程度和范围的问题，这是一些可以提出並可同有关人士进行讨论的题目。”他还介绍了宗教报刊的名称、数字和总发行额。他说，波兰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宗教报刊数量最多，发行额最高的一个国家，这些宗教报刊有充分条件在信仰问题上代表教会、宗教团体以及社会组织机构，並代表他们的社会观点。

在对头四条中的要求互相介绍了各自的观点之后，谈判进入了僵局。原因是：格但斯克同全国的电话联系仍被封锁，事件真实进程的消息没有向全社会报告，对罢工工人的污蔑中伤仍在继续。

瓦文萨：“副总理先生是否看过《人民论坛报》对我们都写了些什么？”

雅盖尔斯基：“我没来得及看。”

瓦文萨：“可我来得及看。他们污蔑我们。我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得了精神上的重病。什德拉克在格但斯克都说了些什么！简直是荒唐！”

又回到封锁电话的问题。科沃杰伊斯基省长回答说，同什切青将可以通电话，但跟华沙的联系得由中央决定。

“我想问一句，我们是在同政府委员会谈判，还是在同地方委员会谈判？”

“这样搞是不行的，现在是假期，孩子们在夏令营里，家属不在格但斯克。副总理先生，这个问题得考虑考虑。”

雅盖尔斯基："这个问题由我来考虑，我去跟中央联系，把这个情况转告中央。"

格维亚兹达："我们把取消电话封锁看成是有诚意的表现。我感到震惊的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不能进行谈判。"

雅盖尔斯基："请你们给我一个谈话、解释的机会。"

瓦文萨："什么期限？"

雅盖尔斯基："明天。"

瓦文萨："一整天。"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杰林斯基：

"一场龙卷风经过华沙上空，破坏了在若利博日的电话总局的建筑物。我想，问题明天就可解决。"

"一个星期以来电话联系就被封锁了，没有提到过任何旋风。再说，前天才刮龙卷风。"

"这只是作个决定的问题。"

雅盖尔斯基："我们得中断谈判吗？我想，我们是带着诚意来的。"

瓦文萨："我们必须把消息告诉社会。"

克日沃诺斯："我们希望，整个波兰都知道我们这里发生的事。"

谈判处于僵局。不可能就各条要求谈下去了。于是决定，政府委员会对21项要求提出自己的看法，但不进行讨论。

原计划中的明天的会见也不再举行。副总理要回华沙参加四中全会。

什切青厂际罢工委员会代表团夜里来到造船厂。为保证代表团的安全比亚乌科夫斯基副部长陪同前来。

两个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一致指出，只有实现独立自由

工会的要求才能在整个沿海地区终止罢工。

1点30分，在省委会第一书记的办公室里，他的一群最亲近的同僚正在替他起草报告。工作进行得不理想，因为大家都精疲力竭。他们都脱掉了上衣，喝着冰冷的茶，大家都饥肠辘辘，但在这个时候已经是什么吃的东西也搞不到了。省长科沃杰伊斯基嘴上叼着雪茄烟睡着了。菲什巴赫叫醒了他，建议他去用凉水浇浇头，因为现在没有时间打瞌睡。科沃杰伊斯基回来的时候，给他出这个好主意的人自己靠在办公桌上睡着了。不过，危机还是过去了，报告及时准备就绪。只剩下菲什巴赫的华沙之行了，司机尽力加油开车，使省委第一书记在全会规定的开幕时间之前到达新世界大街（波兰党中央大楼在此——译者注）。同事们当时都认为，如果他一直把报告带在身边，宣读时就会镇定一些。他是四中全会上讨论时第一个发言的人。

八月二十四日，星期日

当地电台一次又一次地播送在造船厂第一次会谈的过程。

造船工业周刊《造船工人之声》编辑部正在编写当期的周刊。印刷厂在给一篇题为"应当相互了解"的文章排版，记者们在文章中写道："大家都感到，需要说出我们多年来积压在心里的话。于是我们就谈论大大小小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构成了一个东西，我们称它作波兰。因此，即便我们不愿去看最近一周在我们沿海地区发生的事件，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在直截了当说出的看法和谈话中包含着我们日常生活的真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在过去的日子里，一切构成社会主义主要原则的东西，构成其基础的东西，即要求对劳动人民公正，尊重，满

足他们的需要——正是工人群众的不安定情绪和各种要求的推动力量。当我们从思想意识的角度来看这些要求时，这些要求的现实性就成为次要的问题了。这些要求的含意无疑是社会主义的，因为它是从真实的，工人对民主和行使权力的理解中产生的……因此普遍认为，领导人必须善于在其实践活动中把这些希望和需要变成社会活动的纲领，並全力以赴地去实现……以后是否可能，每隔几年让党员作出抉择，是忠于党还是忠于工人阶级，是服从各级组织的命令还是与非党劳动同志们的利益保持一致？”

这篇文章，以及另一篇“关于变革的需要”一文，都已在印刷厂排好版，但刊登这两篇文章的这期报纸迟出了几天，却仍然用了原定的，较早的日期。这不是编辑部的问题，这一点编辑部已经告知自己的读者。

在这里，在格但斯克，这样思考问题，这样评价事件的人占多数。

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正同应邀前来帮助提出各项要求的专家们会晤。专家组组长是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联系》月刊主编。专家组成员有：布罗尼斯瓦夫·盖雷梅克副教授，历史学家；博格丹·齐文斯基博士，政论家，《不驯服者的家谱》的作者；塔德乌什·科瓦利克副教授，经济学家，波兰科学院院士；雅德维加·斯塔妮什基斯博士，社会学家；瓦尔德马尔·库琴斯基硕士，经济学家；安杰伊·维耶洛维耶斯基，经济学家，《联系》月刊编辑，华沙天主教知识分子俱乐部主任。我们可以看到，素不相识，来自遥远的华沙的人们，在这里如何受到无限的信任。工人们现在把自己最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他们。工人们将要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倾听和作出决定，而专家们则把他们的要求根据条文格式和谈判词令的要求进行语言加工。

城里流传着由省民族统一阵线委员会署名的传单，指责厂际罢工委员会不与政府委员会举行谈判，“尽管向他们发出了邀请。”这种对本来就很难的谈判进程的干扰是很多的。不过对这些干扰造船工人们还经受得住。看来，寒冷的夜晚以及与家庭分离不仅仅能锻炼人，而且能使人不失冷静地估计形势。

厂际罢工委员会全体会议批准了昨天提出的1970年牺牲的造船工人纪念碑的设计方案，並决定纪念碑将在今年12月16日揭幕。设计者是博格丹·皮耶特鲁什卡工程师，格但斯克造船厂的设计师。

瓦文萨周围聚集了许多记者。这是个机会，因为他正和代表们商议捕鱼快艇是否该出海去捕储备用鱼。

一位外国同行首先提问，接着我们中的一位捷足先登：

“您能指望得到全波兰工人阶级的支持吗？”

瓦文萨：“现在我在这里。在这里我是得到支持的。至于全波兰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想，我们的感觉是一样的。”

“你们如此为之而奋斗的，是不是最活生生的政治？”

“不，我们要当工厂的主人，在自己的岗位上的主人。这不是政治，这是21项要求。”

“您从那儿学来的这种外交词令？”

“是1970年流的鲜血教会了我。”

瓦文萨走了，而我们还在讨论，大谈政治。这种情况已经有过许多次了。这些事件的主角们很平常地对待一切，就像在池座中看演出一样。事实上也就像瓦文萨说的那样。他们已经用过去时来说“这跟物价一样，那样下去不行”，“工会解决了过冬的土豆，至于住房那就不管了，除非是给他们自己的人搞。”在记者圈子里，我们在研究各种各样的条件，关系、结构、阿富汗，马德里和奥林匹克，而这里说的是：**“更公正些”，“更坦率些”，“更尊**

重些”，“更平等些”，“更节省些”，“更聪明些”。一个独立、自治的工会是这些愿望的贮藏所，现在同时也是这些愿望的象征。

晚上的电视新闻中第一条是关于中央全会的消息，还有专题新闻，报导了关于党内重要职务和政府职位中的变更的消息。除了巴比乌赫总理辞职——这是世界上每个政府首脑在这种情况下都得这样做的——以外，还有在生活中受到批评最多的经济与宣传方面的负责人也辞了职。爱德华·盖莱克在讲话中说，沿海地区的事件表现了工人们合理的反对意见。“甚至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我们也要尽力通过讨论和对话，通过妥协和协商来寻求问题的解决。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但是在全会成员中对解决危机的途径问题恐怕没有完全一致的观点。弗罗茨瓦夫省委第一书记德鲁日治说道：“假如沿海地区的罢工继续拖延下去的话，就应当采取与迄今为止不同的行动。应当考虑一下帮助人们克服因交通运输中断带来的困难，首先要帮助格但斯克居民解决去上班的问题，然后打开我们的通向世界之窗——港口。”菲什巴赫却在头天夜里写的讲话中——这个讲话集中了整个党组织，包括工厂领导部门和职工中的党组织的知识和智慧——说道：“三联城的全体人民，包括党组织在内，感到只有负责任的对话才能导致打开僵局，並使罢工者复工。在我们工作方面采取的各种政治手段中，这一条是目前最重要的，並且可能是最有效的。省委常委会在事件一开始就表明了这个观点，现在仍然在继续努力促其实现。”

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一

清晨6点前，我们来到造船厂。纠察队的小伙子睡眼朦胧，

驰放我们进了工厂。细雨蒙蒙。主席团会议室和全体会议大厅里空空荡荡，几十个代表睡在沙发椅上或者各个角落里，但茶炊里有开水，暖瓶里有咖啡，我们喝着。瓦文萨在睡觉，不许叫醒他——这是主席团的决定，规定主席团每个成员必须至少连续睡够五小时。

值班的是电气安装公司的电气技师弗洛里安·维希涅夫斯基和市交通公司的电车司机亨雷卡·克日沃诺斯。他们十分疲劳，生着气，说话语无伦次。维希涅夫斯基代表厂际罢工委员会与副总理雅盖尔斯基联系，他知道，保持这个联系有多么重要，但电话封锁使联系无法进行。"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在与全国的电讯联系恢复之前，我们不开始谈判。这是我们的先决条件，当局必须表现出良好的愿望。"克日沃诺斯说："我们相信，省地方当局想达成协议，但解除通讯联系的封锁不是他们管辖范围内的事，这事中央管。这种等待是令人气愤的，"他说，"因为它带来巨大的损失。他们想把我们弄得精疲力尽。等着瞧吧，看谁坚持得更久。"

造船厂广播站几次重复广播一项公报，说一名曾经在造船厂工作的人，耶日·姆尼赫生病了，急需O型血，Rh阴性。请大家报名！

9点前，代表们开始聚集，作出了正式决定：不恢复通讯联系就不进行谈判。

结果将会怎样？毫无把握。

这天似乎都很空闲，大家都在等待。发布公报的次数比平常要少。

公报呼吁大家不要着急，要保持平静。

公报说，与各罢工工厂保持联系的联络员们被扣留了。诚然，几天来民警很明显已经放松了对进入造船厂的人的检查，但

零星的，也许是出于某些民警过分积极而引起的事件，常常把气氛搞坏。

一个人解释说，自由工会在沿海地区已经存在两年了。没有章程。要制订一个章程，並且要“对我们合适”，这个时间总算就要到来。

总的说来事情很少。到造船厂来的记者已经有五十来名——外国记者恐怕是这个数的两倍——他们在全体会议大厅和主席团会议室之间来回闲逛。他们聚集在前厅里（那里罢工的办事人员数目不断增加），最后集中在楼上，那儿临时搞了个新闻处，就设在列宁造船厂造的船只模型中间。《华沙生活报》的安杰伊·巴约雷克召集记者集会——有点像群众大会，也有点像讨论会——他建议通过一项决议（或者宣言），抗议封锁通讯联系，以致消息不能及时发出，对于向国内公众舆论界歪曲报导罢工的性质和目的的做法也应该提出抗议。讨论长达数小时之久，因为有多少记者，就有多少种态度。总的来说大家都赞成，但是有各种疑问。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宣言（或者决议）上签名时写明我们所代表的编辑部呢？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並没有得到任何授权。此外，我们的文件送给谁呢？——是给波兰记者协会当局和中央委员会新闻部呢，还是也送给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

我们多次重新修订文本。《人民论坛报》的伊雷娜·德雷尔，同时又是波兰记者协会中央理事会的副主席，犹豫不决，不知她是否有权在这个文件上签名。因为她作为记协理事会的代表，本身就是这个文件的接受者。我们决定，每一个愿意签名的人，都以一个记者的个人身分，而不是作为某一个编辑部的成员来签名。第二，我们“禁止”厂际罢工委员会在明天以前发表这一信件，他们只是我们信件的“抄送”单位而不是主送单位。这时，因为我们的记者讨论会开个没完没了，主人们把我们撵出了

新闻处，因为那里要用来开外国记者招待会。我们结束了信件的起草，在一棵树下征集签名(在那儿又争论了两小时)；沿海地区的一个记者已经在信上签了名，又扯了，然后又签上了名，並表示了歉意。总之，这是一个良心与忠诚的大悲剧。

这实在是个荒谬的悲剧。本来，每一个记者——不论其信仰如何——其基本职责就是作实事求是的报导。如果任何人以任何理由使之不能这样实事求是地报导，那时他的职责就是抗议。每个人都有权利在论述。评论中有自己的主观态度，譬如他可以支持罢工运动或者对罢工运动表示异议，批评它，甚至谴责它，但是他首先必须承认客观事实：罢工是存在的，它是如此这般地进行着，提出了这样那样的要求。歪曲报导，隐讳事实，这不仅彻底违背了新闻事业的原则和道德，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因为我们制度的很大一部分弊病就是歪曲事实或封锁消息的结果。

我们终于对信件取得了一致意见，所有与会者都签了名。但是到了明天某些姓名将不在这些签名之中。有些人经过考虑之后认为，厂际罢工委员会不应当被告知我们职业界内部的事情。

这是他们的权利。

以下就是这个信件的全文：

声明

我们，罢工期间在格但斯克沿海地区的波兰新闻记者，我们声明，迄今为止发表的许多消息，首先是评述这些消息的方式，不符合这里发生的事件的实际。

这种状况有助于蓄意作虚伪报导。

目前的电讯封锁以及缺乏公布介绍真实情况的材料的可能性，使我们感到痛心，並使我们不能忠实地履行职责。

我们认为，充分地向社会报导有关国内发生的一切，只能有助于冲突性局势的解决，並在将来促进社会的发展。

1980年8月25日于格但斯克（36个人签名）

此信分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新闻部，华沙波兰记者协会中央理事会，政府委员会，波兰记者协会格但斯克海洋分会，驻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厂际罢工委员会。

不用说，当天夜里“自由欧洲”在尚未得知文件内容的情况下，就播送了一条笼统的消息，说记者们造反了，其中包括《人民论坛报》和《政治周刊》的编辑们。

15点。厂际罢工委员会新闻发言人莱赫·邦德科夫斯基发表公报说，与政府委员会继续谈判的日期仍未确定，电话仍然不通。

18点35分。省长科沃杰伊斯基通知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与什切青的通讯联系已经接通，但解除与华沙的通讯封锁一事尚在处理之中。有关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消息，将在会谈开始以后，由政府委员会主席通知。随着会谈的进展，与其他城市的通讯联系也将陆续恢复。

全体会议一致赞同仍然不举行谈判，因为先决条件没有完全实现。19点30分厂际罢工委员会发布专门公报说，为此今天不举行会谈，代表们可以各自回家。

晚上10点过几分，与华沙的自动接线电话终于通了！高兴，松了一口气。夜里，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代表，莱赫·邦德科夫斯基和博格丹·利斯与省长科沃杰伊斯基会见，作出了妥协性的决定——既然与什切青和华沙的电话封锁已经解除，那么，尽管与全国其他地方仍无联系，明天11点将与政府委员会开始会谈，同时也作出了在当地广播节目中转播谈判的决定：谈判的最初廿分钟全部转播，其他部分则播送经双方同意的一小时

录音剪辑。

《海岸晚报》第一个发表了存在一个厂际罢工委员会和提出21项要求的消息。

八月二十六日，星期二

一清早我们就到了造船厂。昨天这里可以说是懒洋洋的，今天热度明显地升高了。给记者们发入厂证时你抢我夺，记者越来越多了。有些本国记者要找昨天那张名单，那上面有记者向当局提出的要求，他们想补签上名。外国记者则带着照相机和话筒，挤在走廊上——政府委员会的代表要经过这里去谈判。

我们交谈了一阵消息。这个私下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上头"对有关建立新工会这个罢工者的第一项要求会有什么反应？多数人认为，"上头"不会接受这项要求。有些人知道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扬·什德拉克的讲话，他把罢工说成"恐怖手段"，而且不愿作自我批评。这当然引起了罢工者对当局一切新建议的不信任感，尤其因为那些在罢工的压力下提出的建议中闭口不谈能防止将来对工会发号施令和防止工会官僚化的切实保证。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思想教育工作部发给党的积极分子的文件内容也传到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和罢工的造船工人手里。文件首先重点谈到"所有反社会主义派别的骨干分子"都参加了罢工，并且说主要是他们在鼓动延长停工时间。"也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文件写道——罢工委员会的态度强硬起来了，而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莱赫·瓦文萨和安娜·瓦伦滕诺维奇则开始声明，说他们看不到退却的可能性。瓦文萨在对伦

敦的英国广播公司的谈话中明确地说，他准备那怕罢工五年。”

这个消息——记者们说——一部分是真实的，但它迴避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厂际罢工委员会多日来呼吁政府委员会开始谈判，但政府委员会却一直拖延。

10点58分。一辆红色大轿车载着政府委员会代表通过侧门开进造船厂，因为二号大门一直被人群包围着。隔了一会，扩音器里传出瓦文萨的声音：

“从上次会见以后已经过去了很重要的三天。我们希望，在这期间所发生的新情况，能使我们的讨论变得容易些。罢工要求中提出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来说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会问题。我们要一个自由、独立、真正自治的工会。在和我们谈判的时候，您已经相信，我们並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不想破坏生产资料公有制原则，我们把工厂看作波兰人民的财产，但我们要求成为工厂和国家的真正的主人。人们多次答应过我们，现在我们决定用罢工来要求这一点。我们的谈判将很困难，我们大家都必须有极大的耐心和良好的愿望。”

副总理米耶奇斯瓦夫·雅盖尔斯基：“主席先生，我有个建议。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整个时间都被电视录像机拍摄这种乐事。我们是不是把它关了，它是不需要的。我早年在狱中时就有眼病。在我们的专家——他们将听取你们对自由工会问题的意见——到来以前，我想再简单扼要地重新叙述一下过去已经谈过的话，以及转达给我们的新消息，並且想在我们仔细考虑的基础上谈谈某些问题。”

瓦文萨：“政府和我们都迫切希望尽快解决问题。因此我认为，我们大家都认为，应该从第一项要求开始来解决。请您理解我们，我们不想再回到这些事情上去，我们不想罢工，这是出于不得已，但我们必须达到这一点，我们确实不能放弃这一项要

求。所以如果解决其他二十项而第一项不解决，那就解决不了问题，事情就是这样。”

雅盖尔斯基：“首先我个人想对我们又一次会见，能够一起讨论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十分严肃对待的、对格但斯克省劳动人民来说很重要的问题这一事实表示满意。我已经以充分说理的方式介绍了政府委员会对21项要求的看法。我也想提一下一个使我十分不安的问题，即我得到一个消息说，曾经流传过一份材料，它根据出现过的一张传单而对我的讲话的诚意和进行谈判的愿望表示怀疑(这张传单由省民族统一阵线委员会署名，曾在格但斯克散发，指责罢工者拒绝与政府委员会谈判的建议——作者注)。我要声明，我不了解这张传单，我过去和现在都对这张传单一无所知。我星期五开始工作，星期五晚上我和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的代表们会见，星期六我们开始谈判。现在我又到这里来，就像我星期六晚上说的那样，为的是和你们一起解决令人焦急的问题。”

接着副总理雅盖尔斯基说，大部分要求直接关系到三联城职工们的利益，涉及他们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对职工们最为迫切。对这些要求，政府委员会的态度是积极的。必须尽快解决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已经发出了与厂际罢工委员会开始谈判的公报，发表我的讲话则可以使社会了解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全部要求。

接着副总理谈到各项具体要求。罢工期间的工资问题应该由职工与企业的领导协商。关于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福利问题应当在各有关问题的小组中，与在座的部长，副部长开始谈判。改善市场供应是我们十分关心的事，昨天部长会议主席团决定进口六万吨肉，同时还继续寻找进口的机会。关于购肉卡问题，该怎么搞，请你们提出具体建议。提高家庭补贴计划将在

今年11月底之前制定。提高抚恤金的数目一下子还办不到，要从明年开始逐步实行。按民警同等水平提供家庭补贴，这问题要详细解释，我们将制定一个相应的文件。关于改善卫生保健工作条件问题，增加托儿所和幼儿园中的名额问题，缩短等待住房的时间问题，我们接受要求，准备实行。

副总理讲话之后，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重又提起格但斯克的电话封锁问题：昨天晚上通了，今天又不通了。

雅盖尔斯基："我不熟悉这方面的技术，但我们的邮电部副部长韦乌佩克在这儿，他将解释这个问题，我个人在恢复通讯联系问题上所能尽的职责已经履行了。"

副部长韦乌佩克："与华沙以及全波兰的通讯联系，我绝对肯定，这段时间里一直是通的。在开始时我们的自动通话线路上要求通话的多得不得了，以至电话总局里储存器都开始发热了，保险丝也烧坏了。这样我们就把自动通话线路关闭了，只保持人工接线，处理通话申请。举例说，我们接受了四千多个通话申请，在各条线路上进行了八百四十次通话，有三百次没有接通，其中大部分是往华沙打的。昨天，根据副总理同志的指示，重新打开了自动电话线，结果和第一天一样……每个想通话的人马上就听到占线信号。我们的通讯设备弄得拥挤不堪。当然我们在各条线路上都保持着人工接线。接不通的只是某一些电话，因为超负荷，不能及时通话。"

大厅里的一个人喊道："在电子时代，在技术工艺高度发展的时代，正当我们这里有点儿事的时候，突然间，单单在我们这里出现了通讯联系中断。这大厅里所有的人和每一个普通老百姓都认为，这根本不是什么技术性错误，而是一个有目的的行动。政府应当提供其他向全波兰报导消息的工具，它们的保险丝不会烧坏，我指的是广播和电视。要是一开始报刊就真实地报导

我们这里发生的事件，那就不会这么拥挤。我想，副总理先生一定对消息的贫乏了解得很清楚，这种情况不仅在沿海地区，而且在全波兰都存在。”

大厅里又一个人喊道：“我们希望社会了解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这里的真实情况传不出去。对波兰的经济负有责任的人们在妨碍我们，他们害怕事实真相，他们担心自己的饭碗。可这个问题又是那么重要，它关系到全体人民，我们要摆脱这种危机，我们有论据。因此，把我们的情况介绍到外面去，就成为这么重要的事了。”

大厅里热烈鼓掌，使后面的一些话听不清了。

雅盖尔斯基：“我曾经尽力把一切能够解决的问题都给予解决。今天我又提出了解决的具体日期和办法。我表明了对职工们关心的问题的态度。这些问题是：提高工资，调整工资，劳动条件，劳动保护，改进伙食，改善供应，卫生保健工作等。这些问题都包括在要求中，对这些问题表明态度是我的责任。假如我不表态，那以后你们就会对我说，您来干什么？这些问题对劳动人民来说都是重要的。现在我想谈第一项，就是您当作最基本的那一项。”

瓦文萨：“不仅是我，是大家。”

雅盖尔斯基：“我知道，您是主席，所以您代表与会者说话——请这样来理解我的话。您说，关于这个问题将有三位先生发表意见。因此我再详细说明一下我自己的观点。我说的是第一项。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的最近一次中央全会上研究过。大家说，工会活动的革新是很重要、很迫切的任务，计划在凡是职工们要求改选工会领导机构的工厂里都立即进行新的选举。我建议就在最近几天或最近几周里，看大家认为怎么合适，在全三联城地区进行这个选举。选举应该是民主的，秘密进行的。中央

全会强调指出，如果——看民主选举的结果——最近某些工厂中自发产生的代表的威信是持久的，那么他们一定会被选进新的领导机构。

工会运动的真正的积极性是防止国家经济政策出偏差的重要因素。我在星期六谈了这一点，后来在中央全会上我也是持这个态度。根据星期六我们会见的气氛我指出，通过一个有关工会的新法律是可取的，在这个法律中有必要规定停工办法的条文。当一切其他更有利，更合适的方式都无用的时候，这种停工可作为表达工人要求的一种方式。或者是不是修改一下劳动法？您，主席先生，您自己也说：罢工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最好不罢工。我同意您的看法。让我们和谐一致地工作，但在这个法律中要订上这么一条。只是要确定某种范围，条件，就像全世界都做的那样。这是我经过仔细考虑后对这个问题能说的话，不是作为政府的代表，因为政府不能制定这种原则，而是作为党的代表，也不只是代表，而是党的干部。”

瓦文萨：“现在是不是我们来详细谈谈我们的看法，我们大家要什么，这样我们才可以彼此了解。”

安杰伊·格维亚兹达，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我们是处于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会见的。是什么东西导致了这场危机呢？多少年以来评价地方当局和各个部门是看他们生产了多少吨钢，多少吨煤，多少米电缆。从来没有人从工人生活怎样，教师生活怎样这方面来评价他们。工会的基本目的是保护劳动人民，但工会根本不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相反，他们帮厂领导的忙，他们吃惊地听着各个车间里的悄悄话，随时准备和行政领导一起来反对劳动人民的利益……”

接着格维亚兹达详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危机的理论，谈到了波兰人民共和国中央作计划的荒唐事（“全部报刊都宣传

说超额完成计划,可实际上,如果一个工厂超额完成计划,那时部门间的流通规律立刻就起作用,一定有些地方会短缺什么了")。最后,他描述了波兰1956、1970、1976、1980年的危机(这是一种间隔时间越来越短的周期。)这些危机的发生都是因为劳动群众对事态的发展不能施加影响。"现在,"他继续说道,"我们希望,我们不要过两个礼拜又被迫罢工。工会丧失了人们的信任,而信任不能用法律来恢复,因为'法律在我们这儿也已失去社会信任'。我们的目的是建立工人信得过的真正的工人组织。在这方面我们有法律根据,这就是波兰人民共和国议会批准的国际劳工组织第87号和第98号公约,这两个公约保证有建立新工会的自由。

"防止工会蜕化的唯一方法,"格维亚兹达接着说,"是工人有权不断建立新的工会。这样可能会导致一些混乱,可能产生几百人一个的工会,可能产生激进的工会,他们会每个星期都宣布罢工,但是我们想,这可以协商。沿海地区的人民已经证明自己是明智,平静和老练的。单单用经济让步,提高工资不能解决问题。

"副总理先生,不久以前50格罗什一个的小面包比拳头还大,现在90格罗什一个的面包可以捏在手心里。

"我认为,应当建立新工会,"格维亚兹达最后说,"我们关心的不是名称,我个人还反对解散旧工会,因为这不符合议会制定的一项法律,即任何工作人员的组织不得以行政手段使其停止活动或解散。工会要活动,要接近自己的会员,就得有自己的出版社,就得出版自己的刊物,就得让这种刊物能够写真话,不管这种真话现领导听起来是否舒服。利用报纸要手法当然也能成功,但只能成功于一时,然后就是愤慨、骚动不断增长起来,又爆发另一次事件。波兰人已经听够了什么错误、歪曲一类的话,

这些话周期性地重复着。我们想在这些错误还没有酿成几乎要搞国内革命的时候就指出来。工作人员要有讲话和发表意见的自由，不论他们有道理或者没有道理。只有让人讲话，而且不去事先肯定它是否天生就是正确的时候，才有讨论可言。我们期待着政府的宣言和诺言，保证新成立的工会在登记方面将不会遇到什么麻烦。”

瓦文萨：“我们是不是可以继续谈下去？我建议我们再听听……”

雅盖尔斯基：“请，请，这样好，如果诸位先生都谈了自己的意见，然后我们再开始讨论。”

博格丹·利斯，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我们不大明白，为什么政府要想方设法改组旧工会而不愿意同意成立新工会。旧工会已经声名狼藉到了这种地步，以致于即使我们参加到这个机构里去也不会使它的名声好一些。我们不愿用新鲜血液去替换旧的，我们就是要一个完全新的机体。国际劳工组织的第87号公约给我们保证了这一点。谢谢。”

“我叫维希涅夫斯基，我是这个小组里唯一来自建筑业方面的人，我在‘电气安装公司’工作，罢工职工的代表们责成我对我们考虑过许多次的一个问题发表我们的看法。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是在作出经济问题的决定，特别是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的决定时，没有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目前波兰生产的财富中只有26%是供人民消费用的产品，其他的财富几乎全都被工业吞吃了。工业在没有社会监督的情况下在那里自己为自己进行生产。不切实际的，由上面抛出来的计划指标订得太高，太大，然后在每个五年计划的中期就往下调整。已经开始的基建项目还没有完成就停在工地上。最近六个月中因为能源缺乏而造成的停工，据统计总局的报告，增长了56%。天天在干活的人们的

意见必须确实受到认真对待，我们中间确实有许多人熟悉这些事。我们以现在的房屋工厂为例，这些工厂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种耗资巨大的庞然大物一建起来，如果要在远处建房，那么我们要支付的运输费就贵得吓人。经营管理不善要比罢工的损失多得多。

“大约有四百名工人在得知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什德拉克的讲话内容之后，作出了慎重的，深思熟虑的决定，我们退出现在的工会。我们不想破坏法制，我们没有权利解散它，所以我们退出。我们要建立自由工会是为了挽救我们的祖国，这是我们的义务，这是一个基本问题，我们都是波兰人，劳动人民有这个权利。”

莱赫·索别谢克，“夏尔科波尔”工厂的钳工，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我想说的是，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电话事件。我对副总理先生的讲话感到不安，似乎工会问题只涉及三联城。你们发表这种意见可能导致全波兰的罢工。必须向全社会解释我们的要求，说明这儿是怎么回事，要让全社会都对这些要求诚实地发表意见。问题不在于先生们的财富，问题在于全波兰的财富，我们不能浪费这种财富。谢谢。我还想解释一下，的的确确，恳切地说，每一个波兰人所关心的，並不是这位或者那位先生担任了这个或者那个职务，我们並不想争权夺利，只是希望你们很好地履行职责，成为一个健康的机体，要允许批评，尽管批评有时正确，有时也许不正确，报导消息要真实，诚实。”

雅盖尔斯基：“我理解，诸位谈的是自由工会问题。这个问题你们是作为基本的，主要的一项。没有一位提到前面的其他任何一项要求。我必须说，刚才有一位先生说的话刺激了我。我是作为沿海地区问题委员会的主席到这里来的，我今天不能对全国的问题表态，我今天甚至没有权利发表意见，因为我到这

儿来是为了和你们一起谈沿海地区的问题。我建议我们稍微休息一会，让我们确定一下对先生们提出的各种问题的看法，因为这里有几类不同的问题。”

瓦文萨：“是不是再听一个发言，然后就休息。”

“副总理先生，我名叫兹齐斯瓦夫·科贝林斯基，我代表汽车运输公司分公司。在我前面发言的人几乎把问题都讲完了，我只想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来说明现在的工会发言权很小。在沿海地区我们有两个房屋工厂。目前格丁尼亚厂只有三分之一的生产能力在开工，而科科什基厂是50%。科科什基厂的工艺技术只要求有两种水泥就行了，但工厂却得从二十来个水泥厂购进水泥。这就把他们的工作全给毁了。工人，工程师都指出了这个问题，但谁也不愿意听这个意见。同样，在格丁尼亚厂，工程师们，我都可以举出他们的名字，也指出了这个问题，但谁也不听他们的。我们现在的工会什么事情都不干。在城市规划局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不需要政府委员会许下的新房屋工厂，只要很好地利用现有的就够了。”

雅盖尔斯基：“您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完全接受。这个问题必须让专家们发表权威性的意见。”

瓦文萨：“我建议休息。”

雅盖尔斯基：“我想提出三点原则性意见。所有这里发言的先生们都尖锐地批评了工会工作，我们十分认真地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我可以代表政府委员会的成员说，对这种批评我们是意见一致的，完全一致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一样的，就是力求革新工会，使它起到工会本来就应该起的作用。先生们断言说这是一个需要详细研究的困难问题。我有个建议，为了不致使我们中断工作，双方各推出三个人，由他们去详细地研究这些问题。我们在休息一会儿之后就提出来，我们这边出谁，为了不失

去时间，他们将马上开始工作。”

瓦文萨：“这是个很困难的问题。因为我们还是在谈健全或是改进。我们指的不是改进或者健全，而是要建立新的工会。看来我们相互间有点不理解。”

雅盖尔斯基：“主席先生，这是符合通常情况的，我们介绍了自己的观点，你们也介绍了自己的观点。我的意思是，可以在那儿研究细节，而我们在这里考虑整个问题。”

接着是厂际罢工委员会和雅盖尔斯基副总理之间就成立这个工作组的设想和目的性问题以及休息时间的长短问题热烈交换意见。

瓦文萨：“副总理先生，我仍然要求明确回答，到底指的是自由工会还是改进旧工会。我们必须得到明确的答复：自由的还是旧的？”

雅盖尔斯基：“主席先生，我再说一遍，我不事先决定任何问题。我希望先生们能在较小的范围里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互相更详细地听取对方的意见。我觉得，只有这样才可以谈判，才可以用这种方法进行交谈。”

索别谢克：“我不想使任何人生气，可我就是认为，产生了某种误会。我们要求自由工会，而副总理先生坚持要革新旧工会。这不是那么回事，这是在耍花枪。我很抱歉用了这么一个字眼儿。我们不能同意任何三人小组，我们就在这儿一起讨论我们的要求，全体参加，包括专家小组，全体成员，没有什么三人小组，对这些要求我们不会让步。”

雅盖尔斯基：“先生，我想告诉您，我根本没有坚持什么‘旧工会’。我说过，我认为一定要革新工会的活动。先生们也说过，甚至举出了名称，说工会应该是‘新的’而不是‘自由的’，因此我建议，按照我们开始时同意的那样，来进行谈判。人可以再

多一些，不一定就是一方三个。请吧，要知道我们总得考虑。”

瓦文萨：“我们把自己具体化了的问题用书面提出，静待政府方面的决定。然后我们再详细讨论一次。怎么样？”

雅盖尔斯基：“好。我还建议，这些专家们——让我们称作‘小组’，而不叫‘三人小组’——将要表达的东西，将不作为对任何人有约束力的东西。我们不想把任何东西强加于人，我们还要来，並且可能提出另一个建议。我们必须考虑，诸位自己也说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瓦文萨：“当然，非常重要。”

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一方的一个人说道：—

“我们高兴地欢迎在旧工会中进行变革的设想。当我们建立起我们的工会时，我们还得和原来的工会紧密合作。我不能想像，会有两个或者更多一些的工会组织並存而可以不彼此合作，因为这是违背参加这些工会的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如果我们成立的工会得到社会的信任，那我们就相信，那些原有的工会将不得不进行改革。那时候任何工会都不能脱离社会，因为那时会员们可以自由流动。”

瓦文萨：“我建议到此为止。我们将派出三个人，明天我们再商量。但今天我们想继续谈判，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时间可以稍晚一点。让那个三人小组去讨论问题，在这个论坛上，在这儿，我们将作出有约束力的决定。”

雅盖尔斯基：“主席先生，我——作为政府委员会的主席——同意您说的话。”

瓦文萨：“非常感谢。”

到此，14 点 15 分，厂际罢工委员会和政府委员会之间的第二轮，重要的一轮谈判宣告结束。

政府的代表们走了，专家们着手工作。瓦文萨告诉全体会

议的成员说，那个“三人小组”不论其成员是谁，都不能决定任何问题。他们的任务只是以书面形式更确切地说明双方的观点，作为讨论用的材料。

“这只是一些建议，不是文件，”他说，“作决定的是我们，我们大家，在这个大厅里的代表们。我和大家在一起，没有你们的同意，我不会作出决定。”

瓦文萨向聚集在造船厂大门口的人作了类似的解释。这些人每当扩音器不响了，谈判转移到更保密的房间去进行时，就感到不安和怀疑。

参加小组第一次会议的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代表以安杰伊·格维亚兹达为首，还有如下专家：马佐维耶茨基，盖雷梅克，斯塔尼什基斯；政府委员会以耶日·科沃杰伊斯基为首，专家是：帕耶斯特卡，拉伊基耶维奇，亚茨科维亚克。

在全体会议大厅里现在正在举行每天都有的演说，宣言一类仪式，它们填补空余时间，並且提高代表们的士气。法国民主劳工大会中央，法国工会组织的一位代表，用火热的语言转达了塞纳河畔工人的支持，並且赠送11,000法郎供厂际罢工委员会之需。瓦文萨表示衷心感谢，在热情冲动之下邀请他作主席团荣誉成员和顾问。瓦文萨说，不久之后格但斯克将要成为战斗的工会运动的世界中心，这句话在大厅里引起了微弱的掌声和不耐烦的嘘声：莱谢克，“盐搁多了”(意为过头了——译者注)。

接踵而来的是弗热什奇的木偶剧团，亲吻，捐款。他们之后是挪威的青年工会会员，他们无比激动，说在这儿，在格但斯克，学到了好多东西，回去之后，一定要说服老的活动家支持波兰工人阶级。欢呼是很有分寸的，因为大厅里的人感到，这种国际性的色彩会给本国问题的解决造成困难。

离二号门不远处的玻璃橱窗里已经贴着几十张世界各国报

刊上各种文字的大张剪报。格但斯克事件到处都被登在报纸的第一版上。

我们来到波兰统一工人党格但斯克省委大楼。这里没有一点焦急不安的迹象，门口有一个漫不经心的守门人。据不完全消息报导，全国罢工情况是：热舒夫在罢工，弗罗茨瓦夫有14个工厂罢工，罗兹是交通部门罢工，奥尔什丁是奥尔什丁汽车轮胎工厂，在切欣和科沙林也有些什么情况。到11点为止，据说诺瓦胡塔钢铁厂的部分单位停工，但又说已经复工了，没有确切消息。

在四楼第一书记办公室，我们见到了塔德乌什·菲什巴赫同志，他沉默寡言，但脸上並无愁容。他给我们看一叠沿海地区活动分子的来信，他把它当作在这困难日子里鼓舞人心的东西。他总带在身边，放在上衣口袋里。

"他们现在还给我写信，他们还信任我。他们和我谈他们的担心，疑虑。但他们也有信心，相信一切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明天会怎样？今天华沙就该作出解决罢工问题的决定。如果不作出决定，明天罢工的火焰会燃遍全国！"

我们喝着咖啡，沉默了一会。他又说："现在发生的事，可能会对党和全体波兰人变成好事。让有保障的自由工会在沿海地区建立起来。让沿海地区和全波兰的舆论交交锋。"

我们谈到扬·什德拉克的讲话带来的不可挽回的损失。他反对扬·什德拉克到这里来，並把这意见通知了好几个政治局委员。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同志也是这个意见。但什德拉克还是来了。

话题转到菲什巴赫在四中全会上的讲话上，这个讲话克服了许多困难才在格但斯克报纸上刊登出来，后来也登在《政治周刊》上。这个讲话受到公众舆论的赞赏。

“可能我当时应该讲得更多一些，更尖锐些，但是当时我已经没有力气讲话了。”菲什巴赫承认道。

在秘书处我们偶然听到雅盖尔斯基副总理在打电话：

“我现在就飞华沙，一小时以后我们必须作出决定，不能再抽象地议论。要是今天达成协议，明天他们就上班了。”

在省委常委办公室工作的安杰伊·哈斯同志的房间里——他对我们的采访工作帮了大忙——我们和省委的几位工作人员谈了话。其中一位说：

“难道在华沙看来，格但斯克不过是我眼里的韦伊海罗沃（格但斯克省的一个小县城名——译者注）那样的东西？”

另一位说：

“难道三百公里的距离就能大大减弱了看问题的尖锐性？”

省委的扩音器里在转播早上政府委员会和厂际罢工委员会的谈判录音。

在楼梯上我们遇到了菲什巴赫同志和书记德米霍维奇，雅盖尔斯基副总理也走了过来，他说：“政府委员会这边就我们对第一项要求的看法只是我一个人作了发言，我认为他们那边也应该是一个人发言。”

德米霍维奇：“副总理同志，整个谈判都录在一盘大磁带上，只能或者全部停下，或者全部播放。”

斯泰凡斯基：“副总理同志，谈判已经被大厅里好几百位代表录了音，他们会把磁带送到自己工厂里去。在电台转播整个谈判过程可以证明政府的诚意。”

雅盖尔斯基：“那就让他们放吧！”

几分钟以后我们和雅盖尔斯基副总理及菲什巴赫书记在省委食堂的餐桌旁相遇。副总理吃完饭就乘飞机出发。他被早上的谈判弄得很疲劳，也许还为自己在谈判中的处境而恼火。罢

工者要求的东西，不在他个人管辖范围之内，这个问题的分量是如此之重，必须由国家的政治领导集体决定。从今天的谈判中明显看出，厂际罢工委员会在第一项要求上不会让步，所以继续拖延谈判只能使罢工扩大。必须最终说**行**或者**不行**。说**行**——这是跳出去将不知落在何处的一跃，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从未经历过的全新的事物；说**不行**——那就有面临一场全民性灾难的危险。

副总理米耶奇斯瓦夫·雅盖尔斯基是个知识分子政治家的典型。他在世界上各种各样办公室里进行过许多极其困难的经济和政治谈判，但是他的谈判伙伴也都是些高级政治家，总理，部长，党的领导人。

几星期之前他和卢布林的罢工工人谈判过並达成了协议。但那儿事情是相当好办的，要求只涉及工资和福利问题。而星期六他面临的则是困难得多的任务，他是和已经罢了十天工，不愿作出让步的，不耐烦的工人群众面对面地交锋。这些人要求的不是外交辞令，而是明确，果断，全部满足他们愿望的话。这对副总理个人来说是一次震动和新的生活感受。(一个月之后，1980年9月19日，米耶奇斯瓦夫·雅盖尔斯基在电视讲话中承认："我们和职工们一起上了关于波兰和社会主义的一堂大课，一堂真理之课，这是从未有过的痛苦的一课。")

星期六，和厂际罢工委员会谈判的第一天，雅盖尔斯基副总理很不成功，他一定也觉出了这一点。事情不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在佩卡失败之后他被仓促派到沿海地区，他不掌握许多必不可少的情报——这是第一。第二，他没有想像到这个造船厂里是这样一种气氛，在这种愤慨的气氛下既不适宜搞微妙的外交游戏，也不适宜作高明的引经据典。第三，副总理的手脚是被捆住的，因为他受制于党的领导的态度，尤其是在工会问题上：革

新工会运动——可以，在工会中央理事会组织之外建立新工会——不行。

在到沿海地区来的时候，雅盖尔斯基副总理本人大概也深信，对于他要正式代表的这种态度他自己是赞同的，这种态度和党的领导，党的机关，绝大多数干部的意见是吻合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思想教育工作部发给积极分子的一份材料也表明了这种态度。材料把独立工会的设想说成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材料还说："如果宣扬自由工会思想的人只是要求活跃工会运动，以保证劳动人民的利益，那他们就应该同意党和工会本身的建议，因为工会已经重新批判地评价了自己的活动。"

这里无疑是有合理的核心的。只是工会活动的重新评价进行得很慢，而工人发动的事件却逐渐具有总罢工的性质。

当然，副总理一开始毫无疑问——正如国内可能任何人都没有疑问一样——认为工会工作做得很差，它没有满足劳动人民的期望，工会必须改革。不仅如此，他还随身带来一大堆建议，实现这些建议可能标志着"旧"工会的切实而深刻的改革。他也准备讨论罢工者方面可能提出的建议。可是工人们就是不想讨论这个题目！他们固执地重复说：不是改革"旧的"，而是要建立"自由"工会。

这个形容词预示的内容，无论副总理雅盖尔斯基还是国家领导人或者党的干部都没有政治上的准备；这个内容看来好像和波兰统一工人党起领导作用这个原则相矛盾。"中央"很清楚，在罢工中就是那一批自由工会的活动分子在那儿起最大的作用。这批人和反对派组织社会自卫委员会——保卫工人委员会一起，两年来一直在沿海地区进行非法的准备工作。

这样，在党的干部中间，甚至在那些对国家的现状和政治领导人的错误持批评态度的干部中间，自然就产生一种怀疑，怀疑

建立“自由”工会这个要求並不是工人阶级真实愿望的反映，而是企图动摇波兰人民共和国制度的“反社会主义力量”巧妙地强加于工人阶级的一个主张。所以这是不能同意的。同样，副总理雅盖尔斯基不能——也不想——同意这一条，至少在开始谈判这一天是如此。这样他在星期六就采取了僵硬的，不让步的态度，也就是罢工者不欢迎的态度。

但是就在星期六进行这些初步谈判的时候，副总理对自己的(同时也是“官方”的)想法的正确性这一信念已经动摇了，因为这种信念和他的谈判对手的同样强烈的信念相冲突，他的对手们坚信，不建立工人的真正的代表机构——“新”工会，社会—经济革新就不能成功，而这个革新的必要性双方都是很明确的。雅盖尔斯基完全明白，工人阶级对“旧”工会已经完全失去信任；他也明白，第一项要求——那怕它是反对派“抛”给工人们的——已经被工人们看作是不再重复迄今为止的错误的唯一现实保证，而这些错误的后果是全国都感觉得到的。

对另一方意图的理解在星期六还不能导致任何进行妥协的尝试。

我们得记住，政府委员会和厂际罢工委员会的谈判才刚刚开始。这是那个四中全会作了重大决定，包括人事方面的决定的星期日之前的星期六。因此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党的领导对沿海地区的严重危机将作出什么反应。甚至不能排除“武力解决”。雅盖尔斯基副总理没有任何机动的自由。他坚持用劝说和请求的语气，而由于这种语气使使用强硬论据的人占了便宜。

今天，第二轮会谈时，情况就不同了，好得多了。今天的谈判是坚定的，勇敢的，它赢得了造船工人的赞赏，这是一场激烈的较量，遗憾的是，还是没有王牌“爱司”。

王牌“爱司”在华沙：那就是同意承认独立工会。没有这张

王牌，副总理必须小心地玩牌，要等待。但这实际上已经是一场赌注与星期六不同的牌战了。

这三天，充满重大政治事件的三天，改变了雅盖尔斯基副总理的看法。他相信，工人阶级要求新工会，而这可能对全体人民，对党都有利。但同意厂际罢工委员会的第一项要求不能是无条件的；新工会——不论其法律形式是这样或那样的——必须建立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基础上，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没有一些冲突双方都能同意的“社会公约”式的条款，那么承认独立自治的工会可能会使波兰人民共和国制度的基础受到威胁。因此，从星期二开始，雅盖尔斯基副总理在谈判上作的努力是针对两个方面的：针对罢工者方面和国家政治领导人方面。问题在于要使政治现实主义在这边和那边都取胜。在星期二，两方离这一步都还很远很远。罢工者们还受到不顾现实，盲目冒进主义的诱惑，还处于神经兴奋状态之中。而党的领导人则刚刚开始理解，沿海地区发生的事件并不是“反社会主义力量”指使的，而是出于工人阶级的意愿。

我们喝着肉汁菜丝汤。

雅盖尔斯基：“你们对我有什么批评意见，记者同志们？”

斯泰凡斯基：“今天没有。我们不是批评，而是希望我们大家一起顺利地经受住这一场考验。”

雅盖尔斯基：“星期六我把山羊放了进来，今天我必须把它们引出去。”

我们猜不出这句俏皮话的含义，大概是指副总理星期六的某些话必须改变。接着副总理又表示他因为曾处于被怀疑的境地而难过，例如因为那些民族统一阵线署名的荒谬的传单。

菲什巴赫：“並非出于此地的活动越来越多了。”

斯泰凡斯基：“官方消息的可靠性现在更加重要了。”

盖乌任斯基："副总理同志应当说服党的领导人，对于罢工者来说，现在20项要求没有多大意义，只有这唯一的一项——第一项是重要的。他们想要得到他们要求的东西。"

斯泰凡斯基："只让沿海地区成立自由工会那是上星期六的建议。现在光这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我们吃着小肉卷，土豆，甜菜，酸黄瓜，糖水李子。午饭还没有吃完，《人民论坛报》的伊雷娜·德雷尔和塔德乌什·斯特鲁姆夫来了。德雷尔说，工人们应该能指望在罢工结束后有个"软着陆"，因为他们将很难从目前的异常兴奋状态转入日常劳动中去。

副总理开始谈到宣传工作，谈到宣传的方式。在这方面他是有意见的。菲什巴赫建议雅盖尔斯基在回格但斯克时把中央委员会书记瓦什丘克同志带来，因为他主管宣传工作。他值得到这里来看看，看宣传的意图和它的效果是如何适得其反。

盖乌任斯基："希望副总理同志能够到造船厂走一走，看看工人们如何争抢罢工传单，看看他们多么渴望得到消息。"

斯泰凡斯基："而这些传单中並没有任何违背制度原则的东西，说的是真话，还有诗歌。"

雅盖尔斯基："我想，如果今天我从华沙带回同意第一项要求的消息，那可能晚上我们再和厂际罢工委员会会见一次，明天就可以结束了。"

斯泰凡斯基："副总理同志，到政治局你可得准备好论据。"

雅盖尔斯基喝完水果汤，告了别，他微笑着，非常平静。他知道，再过两小时，在政治局，他必须心平气和地进行说服工作。

菲什巴赫还留在桌旁。

斯泰凡斯基："怎么书记同志还不去飞机场？"

菲什巴赫："我要去的。如果他们不愿带我去，"他开玩笑

说，"那就混进去。"

19点30分。一次沉重的打击来自电视新闻。先是鼓励：关于在工会中将发生深刻的，民主化的变革的长篇讲话，然后是雷沙尔德·沃伊纳的威胁性警告……最后是来自光明山下的布道。波兰大主教，斯泰凡·维辛斯基红衣主教，呼吁人民要理智，克制，平静和勤勉地劳动，他说，工厂必须开工。

看来，用这样一套诺言、威胁和请求就能软化罢工者的决心似的。我们马上去造船厂。在聚集在大门前的人群中我们就听见对红衣主教的刻薄的挖苦话。但大门后面一切都没有变化，平静而坚决，在这儿人们对待电视新闻就像大象对待马蝇的嗡嗡叫一样，只是流传着一个新的口号："永远不要再有战争"(沃伊纳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战争"——译者注)。

我们感到，这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局势。这里在两星期的罢工之后，人们只期待一点：希望每个人都能承认他们有道理，赞成他们的要求，他们坚信要求的正确性，他们以多日来的罢工斗争来证明这个信念。任何人如果反驳他们的理由，持异议，持保留态度，那他们根本就不会耐心听完他的话。在全国其他地区，对工会中央理事会变革的预告，对雷沙尔德·沃伊纳的空谈，特别是对波兰大主教布道的反应可能不一样。但这儿，在格但斯克，一切与罢工潮流不一致的东西，都被拒于千里之外。

八月二十七日，星期三

从半夜起，就开始了不寻常的一天。

已经一点多了，扬·斯切莱茨基来到我们住的旅馆，他没有地方睡觉，或者是忘记了他的房间在那儿。扬内克(即扬的爱称

——译者注)在格但斯克的地位不大明确,但却非常重要。在希特勒占领时期他是社会主义独立青年联盟的领导人,著名的社会学家,小品文作家,政论家,而首先他是几代进步知识分子精神上的绝对权威,一个理想的知识分子——他不能不到格但斯克来,因为这里在工人中正发生一些不平常的事情。但任何一种第一线上的正式职务对于扬内克的本性却都格格不入,因此他就担当起自封的调解人的角色来。大家都认识他,都器重他,所以他就在谈判休息室里转悠。他劝说介入两方的各种小组、各种倾向的团体、派别,要绝对理智,勇于克制,必须寻求一致意见,以保证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口号下的全民兄弟般的团结。

我们聊了半夜,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分歧,除非是在策略方面。然后我们就睡在一张床上,幸亏这张床非常宽。但早上扬内克出去吃早饭,是到帕洛滕神父的住处去,因为厂际罢工委员会的专家们在他那里下榻,而我们则到波兰统一工人党省委去听政府委员会专家们的意见。当然,扬内克没有带走自己的毛衣和其他一些零碎物品,因为他这个人总是丢三落四的。

一清早在省委。塔德乌什·菲什巴赫心情不佳。昨天他在华沙有过很不愉快的谈话。尽管如此,他认为必须进行这些谈话,尤其是和爱德华·盖莱克,必须告诉他,格但斯克到底出了什么事。他感谢我们昨天增强了他去华沙的决心。

"因为我们不知道副总理是否从华沙回来,所以我们和省长决定,如果他不回来,我们就自己去造船厂。"

9点。布鲁斯基来到省委第一书记的秘书处。他是省长科沃杰伊斯基的好心的顾问,正是他现在充当与厂际罢工委员会联络的中间人。他说:"我都要疯了,每隔半小时换一个决定。你们说,我现在该怎么办?然后又怎么办?我没法知道。"

他打电话给厂际罢工委员会方面的联络人利斯。他说,雅

盖尔斯基副总理现在正在华沙，正在去飞机场途中，很快就要到格但斯克，但他想在和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全体成员会见之前先和三到四个主席团代表加上省长科沃杰伊斯基在较小范围内谈一谈，因为“有事情要商量”。利斯听取了这个消息，但是没有马上答复。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代表厂际罢工委员会答复。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对这种不是全体成员参加的，而是什么“三人小组”或“小组”的谈判方式是很不乐意接受的，因为这个有八百多代表的厂际罢工委员会全体会议本来就在担心，“主席团将被”当局“分化”。

9点零5分。女秘书替菲什巴赫接通华沙的电话。他要和卡尼亚通话。

政府委员会的专家，帕耶斯特卡教授来了。他已经恢复镇静，因为在第一次和罢工者接触之后他曾经被弄得不知所措——他还从没有遇见过“这种场面”，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这里面担任的到底是什么角色，正在发生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这里，所有的人，甚至有经验的教授，都在重新学习政治。

我们遇见了菲什巴赫。他说，有一个建议，让工会中央理事会新主席罗穆阿尔德·扬科夫斯基和厂际罢工委员会举行谈判。“但是他们似乎不会干”。国内局势越来越困难。我们问，“中央”是否最后会同意第一项要求。

可能会同意，但仅限于沿海地区范围内。然而厂际罢工委员会是不会同意这一点的。

我们明白，菲什巴赫一开始就了解局势，而且知道顺利解决这种局势的条件是什么，但他不可能在华沙突破那堵不理解的墙。

9点30分。有消息说，副总理的飞机将在10点着陆。我们去城里。几天来我们第一次有半小时空闲，带着一定的好奇心

去看看格但斯克。这个城市的生活节奏现在有点像一个宁静的瑞士城市。在城市景色中自行车最为突出。谁有自行车谁就占先，因为汽车越来越少(缺少汽油)。甚至私人出租汽车也在罢工，尽管谁也不会付给他们不干活期间的工资。(“那又怎么样?”他们的一个代表说，“我们支持这一事业。”)电车和公共汽车不再喧闹,街道上比过去安静了,空气也好些了。谁也不过于匆忙,因为所有的工厂都停工，小学还没有开学，大多数机关也在罢工，甚至工人出版合作社“书报发行社”在厂际罢工委员会也有自己的代表。工业品商店里货架上空空如也，运输业罢工,供货受阻。但食品店里供应比平常还好些，因为罢工者“有选择地”给市民供应最重要的东西。尽管是旅游旺季,旅游者,包括外国旅游者,几乎绝迹,就象有人把他们都轰走了似的。当历史事件的烈火熊熊燃烧之际,是有可能会偶然被烧伤的。

我们来到造船厂。这里一片混乱。路透社的记者紧随着天车司机安娜·瓦伦滕诺维奇,她把他撵走，没空。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和政府委员会恢复谈判，到底还恢复谈判不。有谣传说，盖莱克提出辞职。谁来接替他的位置?有些人说是奥尔绍夫斯基,另一些人说是卡尼亚,还有些人说是格拉布斯基——每个人都有“绝对肯定”的消息。争取记者通行证的斗争十分激烈。因为本来国内的记者群就已相当拥挤,而外国记者群转眼间又蜂拥而来。有关工人抗议的消息依然占据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这里有美国三家最大的电视公司——ABC，CBC和NBC，有英国的BBC，有合众国际社、美联社、德新社，当然还有路透社、法新社的记者。新华社的记者在大门口站了三天,但不到造船厂里去,尽管人们邀请他。“谢谢，”他说，“就这样我也已经一切都知道了，我不想干预波兰的内部事务”。还有《纽约时报》、《明星周刊》、《世界报》、《新闻周刊》、《人道报》、

《费加罗报》、《巴黎竞赛画报》、《观察家》、《巴西日报》的采访记者。

我们碰见了扬内克·斯切莱茨基，他正在大谈其乐观主义——悲观主义理论，周围站满了人。他正在宣讲扬·什切潘斯基教授转赠给他的格言：“永远需要有最高纲领和高低纲领”。扬内克在周围一片狂热中仍保持怀疑主义，因为理智要他这样做，但他是幸福的，因为他和大家一样处于兴奋之中。

通过超短波全文转播着昨天厂际罢工委员会和政府委员会的会谈。

记者们晕头转向。有好的消息，例如“新闻通讯社”今天早上广播说，格但斯克事件是波兰的内部事务。也有坏的消息，例如，雅盖尔斯基两手空空从华沙回来了，没有获得政治局对第一项要求的认可。我们听说，雅盖尔斯基因此不到造船厂来，因为他不能提供任何具体东西。还有很怪的消息：据说维辛斯基的布道词录音被剪断过，删去了某些和电视讲话精神不一致的部分。这乍一听来令人难以置信，但神父们在造船厂大门口回答许多人的提问时证实说：是的，电视台把布道词给剪了。更有超现实主义的消息：普鲁什奇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某基层组织的书记，是罢工代表团的成员，他对着十字架发誓说他不是“内奸”，而确实是由自己单位的职工民主选举出来的。

厂际罢工委员会全体会议大厅里拥挤不堪。厂际罢工委员会已经停止接待直到现在才来申请加入罢工的工厂代表。实在没有他们的地方了，情况也果真如此，确已有人满之患了。因为已经有500多个工厂在罢工。前厅里站着几个迟来者，他们是格丁尼亚海运公司油船分公司的海员，他们焦急不安。

“我们那里一开始对罢工的事没有一致意见，而我们又想用民主方法投票通过，所以现在才申请。”

一份公报说，在斯乌普斯克，有17个工厂罢工，其中最大的有："阿尔卡"(北方皮革工业工厂)，汽车运输公司，铁路车辆修理厂，"波莫让卡"(制糖厂)，船舶器材厂，特兰斯布德公司(建筑运输公司)等。

下一个公报是提醒大家警惕有人煽动。已经有过这种情况。公报号召大家忍耐，平静，遵守纪律。

我们发现，由于各种实际情况，促使厂际罢工委员会的职能扩大到了事先预料不到的程度。必须给好几百个记者提供消息。更重要的是要改进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同什切青、弗罗茨瓦夫及其他大的工人阶级集中地的联系，这些地方正在罢工或者表示愿意举行声援性罢工，即使他们不太了解格但斯克罢工的既定目的。("既然你们罢工这么长时间，"某些人说，"那就很明显你们一定是有道理的。")这一切情况都要求改进组织工作。前厅里的消息站已经有好几个专职办事人员，庞大的罢工组织的下设机构越来越多，有外语翻译、新闻部门、有内部治安部门(一种罢工安全服务队一类的组织)、运输、联络、财务、供应部门、还有许多和几个印刷厂合作的出版小组。造船厂的通行证，一开始是用手写在纸条上的，现在换成了盖了章的铅印卡片。后来还加盖一个印章。办事小窗口的小姐们穿得越来越漂亮了。

整个罢工后勤系统的活动组织得非常出色，没有官僚主义的拖拉作风，尽管它是按严格规定的权限原则进行工作的。什么事该谁管，都很清楚，谁也不干预别人的事。对分工有绝对的纪律。复杂的罢工组织中的绝大多数职务由工人担任，但他们有顾问，有时候是上级，这是一些来支援他们的青年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合作得很协调。他们彼此需要。

这些年轻人在毕业后的观点不一定都和工人阶级的长远目标相一致，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当前的目标是一样的：要使

罢工取得胜利。

中午我们出去到城里散散步，买衬衣。我们原来以为罢工过一两天，等四中全会决议出来之后就要结束。可现在看不见结束的时间。我们也到"长市场"街的收音机、电视机商店去看了看。

"有录音机吗？"

"哪一种？"

"随便哪一种。"

"没有。什么样的也没有。全卖光了。"

电子技术是罢工者的强大武器。大厅里和外面每一根扩音柱上都挂满了录音话筒。录有雅盖尔斯基和瓦文萨讲话的盒式录音带很快进了城，复制几十盒，在三联城和全波兰广为传播，人们都渴望消息。既然群众性宣传工具不能尽职，那就会出现另一条传播真实消息的渠道。

我们和雷沙尔德·卡普希齐尼斯基以及其他几个同事走进"海韦柳斯"旅馆喝咖啡；那里十分华丽，但是空空荡荡。旅行社也在罢工，但旅馆还营业，客人却寥寥无几。雷沙尔德说，格丁尼亚的"巴黎公社"造船厂工人们替一些同事发愁，这些人拿着罢工出入证出去，回来时迟到了或者由于种种原因耽误了整整一个罢工工作日，"这样他们就等于没有来上工，那以后谁给他们发工资？"

下午我们回到造船厂。

听说，一部分政府代表和专家们已经来了，来参加"三人小组"的程序性谈判。第一项要求的条文仍然没有达成协议。而且即使专家们同意了，那也不知道"上头"是否认可。

几个造船工人拿来一个奇形怪状的木制家伙，像个笼子一类的东西，放在全体会议大厅和主席团会议室之间的前厅里。他们把这玩意摆在玻璃墙旁，墙那边正在进行谈判，以免拥挤在一

起的摄影记者和电影摄影师踩坏了花盆里的花草。观赏植物可是造船厂的财产，那就是说，是全社会的财产。

在后面，会议厅后面，二百来个穿着工作服，其中不少还戴着盔形帽的工人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他们已经在侧门前等了一个多小时：他们不大耐烦，不过这只是最后面的那些人。不知道那些写着诗的传单够不够他们分？这些传单是要在这里分发给各个车间的。下面是其中的一张：

写给女儿的歌

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在一起，
妈妈也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你，
你再稍等一等，你再稍长大些，
我们会把这些事情告诉你。

关于那些充满希望的，
热烈交谈和争论的日子，
那些难以入睡的夜晚，
和我们那颗剧烈跳动的心。

关于那些现在感觉到，
终于是在自己家里的人们，
他们团结起来斗争，为了今天，
为了明天，也为了你。

你不要忧愁，你要耐心等待，
直到你回到我们的怀抱，

回到这个原先不存的在家里，
回到过去没有真正幸福的家里。

瓦文萨和妻子以及两个孩子一起走到大门口，那里——就像每天一样——两位神父在给造船工人分圣餐。柏油路面上一把普通的椅子就是忏悔室。其中一位神父用庄严的声调宣布礼拜时间已到，他通过话筒呼吁大家安静，思想集中。但同时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另一个话筒在播送公报，这样一来，宗教内容和世俗的东西就在空气中相互交叉：

"……我信仰天父……"

"……大波兰奥斯特鲁夫（波兹南省的一个县城——译者注）和你们在一起，全国都和你们在一起……"

"……信仰他的独生子……"

"……我们向你们捐赠54,950兹罗提……"

"……並让我们不要受到诱惑……"

"……从修船厂一共已经收到146,731兹罗提……"

"……我向万能的上帝忏悔……"

"……你们必须坚持到底，要么现在，要么永远也不……"

"……我的过错，我的过错……"

"……莱——谢克！莱——谢克！莱——谢克！"

"……现在请神父分发圣餐……"

傍晚我们到省委去给华沙打电话；他们那边同样渴望得到格但斯克的消息，就像我们渴望来自华沙的消息一样。

在菲什巴赫办公室里有政府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和省委的几个工作人员，这是真正的行动司令部。副总理在阅读什么东西，

菲什巴赫在打电话。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府委员会成员兹比格涅夫·杰林斯基忧心忡忡，他说：

"这次罢工的损失我们大概得用三个月的工作来弥补。在这本来就够严重的情况下……"

盖乌任斯基："现在必须考虑今天的事情，因为明天罢工就会向全国扩展。必须尽快设法和解。"

雅盖尔斯基读完，修改完自己的讲话稿，他和所有在场的人商量这个讲稿。

雅盖尔斯基："我们来考虑一下这个讲稿。"

盖乌任斯基："是否可以承认建立自由工会的权利，那怕仅限于沿海地区？"

雅盖尔斯基："这还不行。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作出决策。讲话应当尽量具体。"副总理又说，一面勾划着。

盖乌任斯基："假如副总理同志能突出有关书刊检查改革的章节，那是很好的。"

雅盖尔斯基："你们记者总是想乘机捞一把。工人们的问题不在于书刊检查。"

盖乌任斯基："可能过去是这样，可现在不。他们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老是受蒙蔽。要是副总理同志今天能够看到造船厂工人们排着长队等着未经检查印出来的传单……"

雅盖尔斯基："也许。拉科夫斯基在什切青造船厂也吃了工人们的苦头。他们说《政治周刊》也骗人。"

菲什巴赫打完电话，走近桌子。大家问他："怎么样？盖莱克说些什么？"

"他问，这个讲话能不能使局势好转？我说，在我们这儿，恐怕会使局势更坏。"

但讲话还是要发表的。大家又用几分钟时间修改各种词句。

雅盖尔斯基专注地考虑某些意见，另一些意见不考虑。他问菲什巴赫：

“现在行了吗?”

“行，”菲什巴赫缺乏信心地回答说。

大家都沉默不语。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讲话顶多使决定的时间推迟一会儿。每个人都知道，在沿海地区这个讲话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只有同意第一项要求才能解决危机。然而这个讲话可以起到一个作用，那就是使全国其他地区的人民明白，这儿，沿海地区，发生了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他们，政府代表承认了罢工工人有道理，並且尊重他们的批评态度。雅盖尔斯基的讲话说道：

“我们十分清楚——我们感觉到了这一点，——和我们谈判的格但斯克沿海地区的工人代表的目的同我们的目的一样，只是为了一种利益：我们共同的祖国——社会主义波兰的利益。在这些艰难的，紧张的日子里我们大家都诚心诚意渴望找到最好的，最明智的解决办法，以便最终能够达到最重要的一点：平静的、认真的、组织得更好的工作，只有它可以保证全国，我们每一个人过比较富足的生活，而对于国家可以保证其力量和在国际论坛上威信的继续提高……”

雅盖尔斯基：“难哪，我们没有什么选择余地。现在给我块面包吧，我都快饿死了。”

我们走出来。在走廊上遇见三个海军上校。他们等着和菲什巴赫谈话。他们微笑着，十分平静，这是个好兆头。

两天以后巴黎的《世界报》写道：“波兰听众们对讲话（指雅盖尔斯基的讲话——作者注）的语气感到震惊，语气里没有透出对罢工者的丝毫敌意。”

八月二十八日，星期四

今天早上市民们给主席团送去许多钱。其中有满满一盒“绿票”(指美元——译者注)。这恐怕不是从套汇者那儿来的，因为他们是不满意罢工的。有一种传闻，说他们请求格丁尼亚的港口工人停止罢工，因为没有船只来往就没有买卖。

9点55分。兹布罗什的农民来信。他们在教堂附近给造船工人募捐了12,762兹罗提。信中说，“我们不能用罢工支持你们，因为正在收获。”

送这些钱和信来的神父宣布他要开始绝食——作为声援罢工和抗议堕胎法的表示。这后面一个动机很明显没有博得大厅里人们的支持，但是当他代表农民说：“低三下四地向外国人乞讨粮食来做面包的局面该结束了”时，他立刻博得了掌声。

神父提到电视台播送的大主教的布道词时，表示敬意说：“这是一位特别伟大的人，不能说他搞错了。”但他马上又巧妙地反对这次布道，他引证某位主教的话，胡说什么“盖莱克向大主教下跪，要他发表他现在发表的这种讲话”。

大厅里对此反应冷谈。神父太夸张了。他的“耸人听闻的消息”引起了不快之感。

对米耶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昨天在电视台的讲话有各种评论。意见各式各样。

有一个代表团带来一笔捐款，共15,347兹罗提零10个格罗什。

10点35分。大喇叭里通知大门口提高警惕，因为有“不受欢迎的分子”在钻进来。

10点55分。政府委员会和厂际罢工委员会的谈判重新开始。议程中包括言论自由问题。副总理阐明了宪法保证言论自由的范围。

主席团中一个人说道："甚至菲什巴赫在四中全会的讲话都没有在沿海地区之外登过报！(这个讲话先在《政治周刊》，后来又在《新路》上刊登过——作者注)关于佩卡进行的谈判，还有谈判是怎么结束的，一点都没有写过！"

副总理指出，广泛报导去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对波兰的访问就是自由运用群众性传播工具的最好证明。

安杰伊·格维亚兹达提到书刊检查登记册，说它是"歪曲捏造的实况图"。他建议明确公开规定，什么东西允许写，什么东西不允许写。

塔德乌什·菲什巴赫以政府委员会成员的身分说："书刊检查机构是政治体制和治理方式的派生物。因此很难离开整个民主化过程来谈论它。"

他接着说，对政府机构的司法监督也可以包括书刊检查。他表示，由于罢工的性质和进程在开始时不大清楚，因此可能造成报刊和电视台报导方面的审慎。

至于佩卡，根据省党委的提议，他的政府代表团主席职位已经被撤销了。

莱赫·邦德科夫斯基，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先朗读了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讲话中有关党的政策必须作重大改变的一大段话，然后指出，在波兰总是周期性地重复同样的消极现象。他又说，罢工者希望有充分的、完全的公民权，而且不仅仅是在沿海地区。根本问题是法律必须和宪法一致，否则宪法就是一纸空文。

接着讨论的是最近的逮捕问题。格维亚兹达就这个问题作

了发言。他提到1968年开除大学生的问题和1970年开除格但斯克造船厂职工的问题。

"副总理先生，"他说，"我们的制度究竟是民主的还是警察统治的，这是个原则问题。"接着他宣读了最近被拘留的人员名单。他说：

"有什么保证能使这样的事不再重演？在社会上甚至还有不敢说话的现象，这种现象我们一定要消灭。"

瓦文萨："问题是要执行法律。我已经把我遭受过的种种冤屈提到检察机关。可是到处都欺骗我。"

雅盖尔斯基："格维亚兹达举出了四个被判刑的人。我已经说过，他们为什么被判刑。如果有新情况——可以提出复查。"

厂际罢工委员会的一位女代表："破坏法制的事情越来越多。"

另一位代表说，信教的人受到歧视。他举自己的例子来说明。他的儿子进了神学院，他的妻子，一个医生，因此就被解雇了。

"怎么能这样欺侮人？这不是使全民团结的办法，"他说，"你们自己把社会分成'我们'和'他们'。难道'同胞'这个词不包括所有的人吗？"

雅盖尔斯基："我对信仰问题的态度已经说过了。你们看看，每个星期天在教堂里是怎么个情况。成千上万的人都去教堂做礼拜，甚至党员也去。我不否认个别具体的违法例子。但是假如有这种破坏法制的事情，那就应当直截了当地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一个人说道："那么谁去追究他们呢？副总理先生建议复查判决，可谁向我们保证，上诉法院会好一些呢？"

雅盖尔斯基："我希望按顺序对各项要求进行建设性的探

讨。”

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格鲁谢茨基：“不要奇怪有那么多人对目无法制的行为发表意见。政府委员会不能用不了解情况来为自己辩护。我们说的是事实，而且我们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了！”

继续讨论言论自由和法制问题。副总理引证说，电视台播送了红衣主教维辛斯基的布道词，他呼吁罢工者好好考虑这个布道。就在这时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收到了主教团新闻处的正式声明，说这个讲话没有被全文播送，讲话也未经本人审阅，而且未经本人同意就被电视台利用。接下去是一阵惊讶和混乱。

瓦文萨：“我建议休息一下，並且对这整个事件作出解释。我想，今天我们可以签署第三项和第四项，然后再回到第一项，也在今天签署。”

雅盖尔斯基：“好，对于维辛斯基的布道词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将作出解释。”

休息前副总理表示了下面的看法：

“我没有经历过有外国记者在场的情况下谈判波兰问题这种事。”

罢工者却认为，外国记者在场是必须的，这样能使公众舆论通过中间途径了解格但斯克事件和与政府委员会谈判的进程。

主教团新闻处关于电视台转播的布道词被删节的信，使罢工者对维辛斯基的评价有所改善。但电视台的威信却一落千丈；实际上这几天本来就没有什么人在收看电视新闻，因为这里面没有任何有关沿海地区情况的可靠的，实事求是的消息。

休会一直持续到下午很晚的时候。罢工广播站播送各种公报和笑话，例如：“瓦文萨在造船厂走来走去吧嗒着烟，佩卡在

华沙走来走去地溜达。”（波兰语中“吧嗒着烟”一词和“佩卡”谐音，“溜达”一词和“瓦文萨”谐音——译者注）

记者中流传着小道消息说，今天将签署第三项和第四项，然后雅盖尔斯基副总理就到华沙去，目的是使当局对主要的第一项要求的立场最后取得一致。

18点15分。省长科沃杰伊斯基来到造船厂，不知道副总理是否也来，谈判今天是否还恢复。

18点20分。公报说，在弗罗茨瓦夫已经有43个工厂罢工。那里的厂际罢工委员会派到格但斯克来的代表没有能到达——他们被阻止了，但其中两个到了什切青。

18点35分。公报说，政府委员会在第一项要求上仍然没有明确的态度，因此，在政府委员会和华沙的中央当局对这问题取得一致以前，全体会议不继续召开。但专家委员会仍然就这一项和其他各项要求进行工作。

18点40分。

瓦文萨：“既然政府委员会不能讨论这一项，谈判不用举行了。”

广播站停止了工作。

* * * *

除了“正式”专家：安托尼·拉伊基耶维奇，尤泽夫·帕耶斯特卡和切斯瓦夫·亚茨科维亚克以外，几天以来还有一组顾问，格但斯克大学的学者，在帮助政府委员会。莱谢克·斯塔罗斯塔博士就正在省委，在书记安杰伊·苏罗维耶茨那里看材料，亚茨科维亚克走进房间：

“拉伊基耶维奇和帕耶斯特卡在哪儿？我们要去谈判，他们却不在。失踪了！”

委员会里乱哄哄地，大家到处找，扩音器里发出神经质的问

话。他们被绑架了？他们逃跑了？部长耶迪纳克也不见了。出了什么事？

“你们能帮我一下吗？”亚茨科维亚克问斯塔罗斯塔和经济学家，格但斯克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库利戈夫斯基。“我可不能一个人去呀。”

他们犹豫了一下。因为他们听说昨天专家们走过人群的时候很不愉快……。

库利戈夫斯基对亚茨科维亚克说：

“切斯瓦夫，在道义上你不是也完全有权退出吗，既然帕耶斯特卡和拉伊基耶维奇都罢工了！”

亚茨科维亚克教授，这一位非党人士，当他突然被召到专家委员会时，他说：“我同意，因为这里正在发生波兰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我不能不参加到里面去。”现在他又说：“作为一个波兰人我将把一切都做到底，只要还有可能同罢工者进行联系。我们必须履行这个使命。”

斯塔罗斯塔和库利戈夫斯基：“那样的话我们也去。”

他们开始把文件收拾到一起，匆匆忙忙研究起问题来。当他们已经朝汽车走去时，那两位“正式”专家突然出现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晚上在省委大楼里聚集了许多政府方面的专家和省委的工作人员。大家随便闲聊。遭到批评的是突然选举罗穆阿尔德·扬科夫斯基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这件事。“在目前的情况下还不如留着空缺好。”

尽管谈判陷于僵局，专家们仍在研究第一项要求的措词，因为第一项恐怕终究还是要同意的。一位专家回忆说，他第一次到造船厂去时，后背直发冷。另一个说：“我们大家都已经忘记真正的政治斗争是怎么样的，我们必须从头学习搞政治斗争。”

他还说，另一方的专家，即厂际罢工委员会的专家们，对所有各项的讨论都准备得非常出色，他们有大量工作资料，对最小的细节都搞得非常精确。大家都认为，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大约有各工厂的800名代表）向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施加压力，不让他们作任何甚至是最小的让步，而主席团则在制止全体会议的激进主义。尤其是，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担心"愚蠢的罢工"浪潮会在波兰泛滥起来，提出各种不切实际的或者完全是地方性的，与格但斯克的厂际罢工委员会提的要求不一致的各种要求。

流传着一种消息，说厂际罢工委员会建议由瓦文萨作电视讲话，反对罢工浪潮扩大，他要介绍格但斯克罢工者的要求一着重介绍独立工会这一项，同时呼吁工人不要停工，因为"人们得吃饭"，而国家不应当陷于混乱云云。据说当局拒绝了这个建议。

今天稍早一些，大约11点左右，我们回到旅馆，脑子里嗡嗡作响，空空荡荡。我们第一次想喝一杯什么烈性的东西——可是在这全市都严格禁酒的时候，上哪儿找去？碰巧，记者们的一位热心朋友，在这件事上也帮了忙："国际通讯社"的电影摄制组的年轻人在旅馆里还藏有酒……

晚上随便考虑一些问题。

那位全国教会中德高望重的老人，三十多年来把自己想像为人民精神上的父亲，而在一瞬间在罢工者中失去了威望。他现在会怎么想呢？……

副总理雅盖尔斯基，当他今天无辜被牵连进入删节布道词这种狼狈的局面中去的时候，他感觉怎么样？谁删掉了这篇布道词中根本不重要的片断，这无关紧要。这些片断即使还保留着，也并不能改变维辛斯基训诫的实质。重要的是，干预大主教讲话这件事本身损害了国家领导的威信。

很快就要取得巨大成就的瓦文萨，又感觉怎么样呢？十年来他朝思暮想的，而且恐怕已经超出他的想像范围的这种成就，是否会使他过于雄心勃勃起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突变，从一个受歧视的地位一下转变成国内唯一的，在电视录像机前说几句话就可以阻止——假如达成协议的话——罢工浪潮泛滥的人的地位？

然而这是否可能呢？难道社会的动荡没有比沿海地区总罢工的倡议者所意想的走得更远吗？

瓦文萨的内心里是对整个事件的责任感取胜呢，还是陶醉在个人的胜利之中？

这给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出了很多思考题。譬如在造船厂大门外的和大门里的这两拨群众。一拨给另一拨打气。一拨给另一拨加强信心。但他们的目标是否一样呢？工人的要求，尽管是以全国人民的名义，为全国人民的利益而提出的，是否有一天会被厂际罢工委员会影响难及的街头群众接了过去？假如不受控制的感情激发起来又会出什么事？

大学生正在放暑假，这对双方都是多么幸运的事。但他们回来以后呢？他们的抗议和恢复学籍的要求，在被承认是正确的、可以实现的之前，能被限制在校门之外吗？

但是，在为明天担忧的同时，也还有有充分根据的乐观主义。每一个在造船厂呆过的人，都经历了一种独特的思想转变。那就是，一个几十年来都是正确的，但是因为滥用而多少有点被糟蹋了的口号——工人阶级是民族的先进力量——完全深入人心了。知识分子惊讶地看到，工人们不仅表现出庄严沉着，对实现自己目标的冷静的决心——这些是可以预料到的——而且还普遍充满一种拯救民族的使命感和对历史的责任感。工人阶级明确指出，自古以来全人类对尊严、真理、公正、自由的理想，对

于工人阶级是和对于知识分子同样重要的，这是比眼前的工资问题，福利问题，比一小节香肠重要得无法相比的事。

八月二十九日，星期五

在省委大楼和造船厂，一清早就是一片僵局的气氛。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恢复谈判，也不知道谈判之后到底能指望得到什么。大家都没有把握，不知所措。悲观气氛占了上风，尤其在某些厂际罢工委员会的专家(关于这事议论很多)不断试图在向当局提出的要求清单中加点什么进去的时候，就更悲观了。

但也还有一种说法，说第一项的问题已经根据罢工者的愿望，作出了决定，现在在进行最后的文字修订工作。

既然没有具体消息，大家就有许多想法。发现似乎在造船厂出现了两种神话：一种是工人的神话，认为罢工将完全恢复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将使公正精神在国内深入人心，将扫除国内一切不好的东西，劳动人民终于“将不再感到是被人瞧不起的苦力”；另一种神话是厂际罢工委员会某些专家编造的，说是将根据各种外国的模式来“修改制度”，在某一点上是法国式的，另一点上是美国式的，再一点上是瑞典式的。这两种神话是在共同的罢工背景下产生的，却表现出不同的政治意图。

那些作为客人，作为报导员，观察员到造船厂来的人，他们的体会却不是神话。他们感到，如果尚未在罢工者中间至少待上几小时，就不可能懂得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深远意义，不可能感觉到工人群众思想意识变化的深度。一切可以用文字信息，甚至用电视录像机的画面来转达的知识，都将是“干巴巴的”，不完全的，有缺陷的。任何一个从华沙到造船厂来的人都感到好

像被猛击了一掌。卓越的讽刺家、作家扬努什·格沃瓦茨基，在这儿突然开始用认真的语气说话，甚至还有点慷慨激昂。所有的人的的确确都如此。那些看出在罢工之后国家会有各种各样危险的人也同样如此。工人阶级为了全民的利益冒着很大的危险，一步不小心，一次挑拨，都可能使这种冒险变成全民性的灾难。这一点所有在这所大学校里的人都意识得到，在这所大学里统治者向被统治者学习，而被统治者得到的是对更全面的实际情况的理解，比起过去他们从自己的观察范围，从一个——那怕是大的——工厂中所看到的要更为全面。

造船厂里仍然寂静无声。气氛依旧紧张。大家都感到，这是华沙作出决定性决策的一天。但谁也不知道，将是什么样的决定。

又出了一桩小小的事件。在格但斯克《时间》周刊上一篇关于沿海地区事件的长篇报导中登了厂际罢工委员会全体会议大厅的照片，但照片中挂在主席台上方的十字架被抹去了。小事一桩——但在罢工者中间有许许多多恶意的解释。

造船厂中流传着一张给农民的不署名传单，是由"格但斯克造船厂印刷厂"印制的。下面是传单的主要片断：

"必须给个体农业和公营农业创造同样的贷款条件，要一样供应煤、饲料和建筑材料，要使他们有同样条件购买拖拉机、小货车和农业机械，要创造同样的购买土地的可能性。

农民不能仅仅被看作食物的生产者。应该为他们创造适当的生活条件，改善社会福利，例如，改进医疗保健，改善农村商店的供应，关心农村儿童的情况，重新研究关于农民退休的法律。"

12点10分。公报说：政府委员会第二次取消原订在今天举行的会谈。政府委员会声明，它还没有准备好对第一项的讨论。看来，这已经不是"拖延"策略，似乎在华沙，在国家领导人

中，正在斟酌原则性的决定。

造船厂工人们聚集在一起。有些人估计说，“他们被当成马使”，但绝大多数人默默地等待着。他们懂得，目前的宁静预示着一个转折。大家都知道，国内罢工的工厂越来越多，在弗罗茨瓦夫市又成立了一个厂际罢工委员会，有几个城市的交通停顿了，在许多进行生产的工厂里，正在成立声援格但斯克委员会。

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还是愿意呼吁罢工浪潮不要扩大，尽管“外面”的罢工可以提高造船厂罢工者的士气。

瓦文萨准备作这样的呼吁，但要的代价太高。他提出了政府委员会接受不了的条件。因为这些条件可能会使人产生一种印象，是厂际罢工委员会在决定着全国罢工的进程。

但是政府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说服了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莱赫·邦德科夫斯基，说应当写出那个“共同”呼吁书的文本。这件事也就这么办了，恰好当时大厅里主席团其他人一个也不在。《团结报》编辑克日什托夫·韦什科夫斯基偶然从背后看了一下邦德科夫斯基，他惊呆了，因为呼吁书与瓦文萨的态度相反，没有包括任何向政府提出的条件或要求。他飞快地跑去找瓦文萨。瓦文萨跑来，读了一遍，也吃了一惊。“你在干什么？这儿出什么事了？”有人提醒瓦文萨，要他立刻去把专家们找来。那些政治和法律专家们，他们一定能找到一种什么办法来阻止呼吁书的发表。可惜，一个专家也不在，全都无影无踪！

厂际罢工委员会二十个人着急地在造船厂各个角落里寻找他们——结果白费力气。时间紧迫，已经没有什么借口再拖延下去了。这时候瓦文萨已经快要同意那个呼吁书了……就在最后一分钟，人们抓住了专家们：原来他们为了轻松一下，正安安静静地站在离会议大厅几十米远的地方，在树荫底下，观看厂部

楼前消防队员的足球赛。他们跑到邦德科夫斯基这儿，立刻就在文本中找到了某些“形式上的毛病”。这样就制止了呼吁书的发表，这份呼吁书可能会被罢工者理解成突然投降。

在厂际罢工委员会的专家中有各种人物。他们中某些人，由于种种原因，多年来就在屈辱的感觉中生活，因此，在罢工过程中他们异常兴奋，他们终于能活动了，而且是有成效地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信念、目标而活动。这种形势的突变使某些人对“政府”方面的，出自本能的敌意迸发出来。幸亏这种敌意很快就缓和了下来，因为政府委员会的专家们也属于同一个交际圈，知识分子圈，所以很难把他们和“现制度的腐败人物”混为一谈。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就因为对现行政策持批评态度而出名。帕耶斯特卡教授多次出色地缓和了紧张空气，例如，他开玩笑地骂坐在他对面的朋友科瓦利克：“你在胡扯些什么，塔焦……”(塔焦是科瓦利克的名字塔德乌什的爱称——译者注)

可厂际罢工委员会的某些专家试图用各种办法把自己的某些主张也塞到讨论范围中去。他们有这些主张已经不少年头了，有些甚至是正确的，但超出了工人的廿一项要求的范围。例如，斯泰姆布罗维奇教授要求通过普及对行政管理的司法监督和文件的公开化来全面改进行政管理并制止行政管理方面的独断专行。一有机会他就列举数不尽的案例——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在法国，在瑞典，在芬兰是怎么解决的——而且很不乐意听别人告诉他，波兰和这些国家之间存在着社会制度上的根本区别。这一类倡议，从倡议者个人兴趣的角度看是可以理解的，但对谈判进程却成了麻烦事。

下午，在厂际罢工委员会全体会议大厅里，代表们的不安情绪在增长。怎么越来越多的谈判是在小组里，在小组委员会里进行？是不是有人想“分化”主席团？

格维亚兹达解释说，在小会议室里没有转播设备，可以无拘束地进行谈判，不必担心关于波兰内部事务的每一句话，一出口立刻就传遍全世界。

这种解释并不能说服所有的人。

造船厂里已经有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车子，车身上，在制片厂的地址“华沙，海乌姆斯卡街21号”旁边，加上了× TAK字样，变成了“拥护21项”。电影摄影师笑道，这些车子回去就得报废了。

奥森克一诺维茨基先生，养老金领取者，赠给厂际罢工委员会一笔10万兹罗提的捐款。“我欠我们祖先和牺牲了的战友们这些钱，”他说。

从埃尔布隆格传来正在罢工的汽车运输公司车场上发生争吵的消息。一个人未经工人同意走进车场，并以挑衅方式吓唬工人。他被轰了出去。总的说，在埃尔布隆格气氛要更热一些。

瓦伊达来了，到造船厂来了！波兰电影史上的巨片《大理石人》就是他在这儿，在格但斯克造船厂拍成的，这里几乎所有的工人都认识他。他向罢工新闻公报《团结报》发表了谈话，以下是谈话片断：“我总想能够拍这部影片的续片。我想，假如我能拍一部关于《大理石人》中主角的儿子的电影，那我将感到非常幸福。这是儿子的历史。我想，在这期间，你们已经补写了这段历史，你们是用行动来补写这段历史的。”

编辑们问瓦伊达对造船厂的初步印象如何。

“第一个印象正像传到我们那儿，传到华沙和其他城市的那样，就是平静的感觉，有充分自信心的感觉，某种隆重、庄严和不平常的感觉。我感到，我是我们历史的某个片断的见证人，这不是经常能赶上的。历史往往在我们身边经过，而在这里却能感觉到它，这里看得见它的直接存在。”

铜矿区罢工的矿工们给造船工人转致传统的问候“上帝赐福于你们”，並派来代表团体和厂际罢工委员会会谈。

有消息说，亚斯琼布的《七月宣言》矿罢工了，这是上西里西亚的第一批罢工者。在比德哥什成立了又一个厂际罢工委员会。

时间白白地过去，造船厂里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沿海地区的戏剧艺术家们演出节目来填补空档，但人们鼓掌只是出于礼貌。在心神不定的时候，很难高兴起来。

16点35分。从可靠方面传来了好消息：华沙已经同意第一项要求，正在作最后修订！

消息闪电般传开，气氛完全变了。轻松，乐观。

听说厂际罢工委员会的成员把自己关在屋里，高兴得哭了。

西方记者大大减少了，他们可能知道，问题已经解决，那么格但斯克罢工的消息就要从世界各种报刊的第一版上撤下来。造船厂大门口却拥挤起来，不耐烦的情绪在增长。群众已经知道在全国，特别是在弗罗茨瓦夫发生逮捕人的事。港口管理局的罢工者似乎有情绪消沉的迹象。

有人问格维亚兹达：

“今天是否会有最后的决定和谈判？”

格维亚兹达：“有！”

18点。晴天霹雳：华沙传来特坏消息。不同意！首都正在召开各级党组织会议，听说发出了指示，要全体党员绝对服从政治局的决定。波兰人民共和国的西部边界可能已经关闭。人们都惊呆了。

传来未经证实的消息：华沙的“华沙钢铁厂”和大剧院罢工了。这时罢工者的情绪才略有好转。据说在首都人们惊慌失措，商店里在抢购……

电视新闻里，在一连串妇女们哭哭啼啼诉说罢工给她们造成的苦恼之后，有一个人塞给沃伊尼亚克(节目主持人——译者注)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消息和前面那一部分新闻的调子截然相反。沃伊尼亚克犹豫了一秒钟，还是读了："策盖尔斯基五金工厂宣布进行二十四小时警告性罢工，呼吁双方迅速在格但斯克达成协议；如果造船工人的正当要求不能得到满足，策盖尔斯基工厂准备再次罢工。"

电视台究竟出了什么事？政治局里出了什么事？

20点25分。来自华沙的，简短但来源绝对可靠的消息说：**明天一切都将圆满解决。**

八月三十日，星期六

瓦文萨显得轻松愉快，他在造船厂大门口给人签名留念。大概一切都好，因为在厂内售货亭上已出现了"马尔博罗"和"卡门"牌香烟。

在造船厂大门上悬挂着新的横幅标语：

"各厂矿的无产者，联合起来！"

10点5分。瓦文萨通过扩音器讲话：

"委员会已经商定好了文件的定稿。情况看来会好的。"

别尔斯克和蒂斯卡两个微型轿车工厂宣布将进行警告性罢工。罗兹代表来到了会议大厅。格但斯克港务局通知，派60人前往索别谢夫地区支援秋收，因该地正源源不断地以食品支援罢工者。

一位罗兹代表说：

"首先罢工的是我们市的交通工人，随后大家都跟我们走

了。"

瓦文萨宣布，12月16日将定为造船工人纪念1970年悲剧殉难者的日子。"我们将在那时讨论协议的执行情况。我会出席的，如果我不在，你们可以问，我哪里去了。"

10点37分，下一轮会谈开始了。

瓦文萨说："我第四次欢迎政府委员会的代表。已达成协议的第一项的文稿还在打印中，过5分钟就好。"

雅盖尔斯基说："那我们可以向你们提供我们的副本吗？"

瓦文萨说："我们宁可要我们自己的。我们现在可以先讨论第二项。"

副总理发言："会谈快结束了。谈判是困难的，然而涉及到了根本性问题。这不仅是指解决社会冲突，而且也是指解决有关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这第一点是协议的基石，但是经济问题也不能看作是次要的问题。"

谈到这里，副总理打趣地说，一位大轿车司机对他说："副总理，您在我们这里太少见了。"副总理表示相信，从今以后他将经常来沿海地区。

随后他改变了口气说：

"我很满意地指出，厂际罢工委员会采取了明确的立场，即新的工会将站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立场上，它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和波兰既定的结盟体系。这就是说，它是站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立场上。"

接着副总理谈到了新工会的登记原则及其章程和建立联合会的可能性问题。他指出，仅仅宣布自治工会的口号是不够的，应该使它具有相应的机构形式。

然后回到对罢工者和最近的被捕者给予安全保证的问题。格维亚兹达提醒大家注意，对罢工参加者不应采用劳动法第52

条、64 条和 85 条。雅盖尔斯基对协议文本中写进“支持者”一词是否必要表示怀疑。这里指的是对罢工者和“支持者”保证人身安全的提法。他说，请你们考虑考虑，我现在不希望得到任何答复。

瓦文萨说：“应该保留现在写的那样。因为他们作了许多好事。”

格维亚兹达：“他们都是善意帮助我们的人。”

雅盖尔斯基：“我对他们也表示过感谢。但是我只想向你们作出最高政权机关的保证……”

双方代表团团长在文件的第一、第二项上草签。响起了一阵掌声。雅盖尔斯基和其他人一起鼓掌。

瓦文萨：“这两个问题已经了结。”

经过短时间的交换意见以后，采纳了“独立自治工会“的提法，据瓦文萨说它将是新工会的名称。然而，没有把形容词“自由的”放进工会名称之内。

雅盖尔斯基：“至于谈到经济要求，须建立几个机构，由这些机构在 9 月 30 日以前确定出最后决定的具体日期。”

由于副总理又要飞回华沙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五中全会，瓦文萨希望他能赶回造船厂参加明天最后签订协议的隆重仪式。

副总理答应，他尽力在当天 19 时返回。他建议，既然协议的主要两点已经草签，罢工者从明天起就恢复工作。

有人插话：“今天是星期六、是圣母节……”

副总理：“是的，我当过农民，我们在老家从来都是从星期六，也就是从圣母节开镰收割的。”

瓦文萨：“我们从星期一开始上班。到一切都办完还须要等几个小时。我们还有许多事情没有搞完。”

雅盖尔斯基："其实，明摆着今天就能达成协议嘛。"

瓦文萨："就能达成？我们倒是这样希望。但是还有问题。副总理先生，我们还得谈一谈，我们要求停止逮捕保卫工人委员会的成员。他们虽然没有同我们在一起，但是帮助过我们。如果他们今后干坏事，我们自己会制止他们。"

雅盖尔斯基："据我所知，在弗罗茨瓦夫扣留的三名科学工作者已经释放了。"

格维亚兹达："我们有消息说，华沙又在抓人。"

雅盖尔斯基："我现在就出发。我建议把晚上将要签字的最后公报文本写出来。"

瓦文萨："我们有个小小的要求。我建议副总理去华沙的时候，让政府委员会的成员留下来，我们的确希望副总理能回来，并从星期一起能复工。"

雅盖尔斯基："我想，今天我们还会见面，并且在今天就签完。"

瓦文萨："也许要搞到今天夜里12点到星期天凌晨1点左右。"

开车前副总理对一直同政府专家委员会工作的省长科沃杰伊斯基说：

"您不用跟我们走了，就请你们把文件的其余各点准备好，以便今晚能结束工作。"

上午一轮的会谈11时21分宣告结束。造船厂内群情振奋，人们奔走相告。副总理在造船工人簇拥之下走出了会议大厅。响起一阵掌声。人群中有人喊道：

"等一等，让我们最后再鼓掌。"

会议大厅内外所有的人都唱起了国歌。

“你对瓦文萨的印象如何？”

电工斯坦尼斯瓦夫·莱希涅夫斯基（他在列宁造船厂工作了17年，其中有八年与瓦文萨共事）回答说：

“我深信，他永远不会骄傲自大。他是一个很谦虚的人，他完全忠于工人阶级的事业。我们大家也都是这样想的。其实我们考虑的不是钱。我们现在和过去整个时间考虑的是诚实和我们的尊严。我们会挽回损失，有必要的话，我们会为国家多加一把劲。只有到现在我们才懂得，活着是为了什么。”

人们用手把瓦文萨抬到第二号门。在那里他向聚集在造船厂前面的人群发表了演说。

“现在已经胜利在望，但是我们还有个没有写进文件的第22项要求，那就是：如果雅盖尔斯基副总理不从华沙回来，我们就不复工，我们就不进行谈判！”

双方的专家像往常一样在厂际罢工委员会大楼入口处的一个小房间里再次聚会，开始了那持续许多小时的艰苦谈判。会谈涉及到一些尚未达成协议的要求的最终提法。编辑马佐维耶茨基每隔一阵就建议作一些迎合罢工者要求的“小修改”，从而又挑起一场新的论战。最后，在傍晚，安杰伊·格维亚兹达作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发言：

“省长先生，问题是这样，似乎我们就要结束罢工了，可是参加全体会议的人们，代表们并没有为本厂职工挣来任何东西，他们将两手空空走出去。如果他们的经济要求得不到解决，那么尽管签订了协议，从下星期一起我们还要继续罢工！”

在谈判中一直表现得很耐心、冷静的科沃杰伊斯基省长，这一下也忍不住了，他语气尖锐地说道：

“如果诸位采取这样的立场，从下星期一起再次举行罢工的话，那我们就对可能发生的事情不承担任何责任。第二，你们是

否认识到，你们把我们这些进行谈判的人和当局置于何地？”

在代表们和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专家们就坐的桌子这一边，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气氛。专家们意识到，一切都可能突然化为乌有，在地平线上出现的有利于整个国家的协议，可能由于会议厅中的代表们在经济问题上提出新的、过分的要求而告吹。马佐维耶茨基抓住格维亚兹达的衣服袖子，尽力地劝说他……政府方面的专家们认为，这是厂际罢工委员会的专家们第一次那么明显地劝阻那些他们出主意支持的人，他们开始说服格维亚兹达放弃自己提出的最后通牒。

科沃杰伊斯基尖锐地提出问题并收到一定的效果以后，又采取了和解和克制的态度。他建议，在通过文件的21项以后，应停止罢工——正如原先商定的那样——并在签订协议的基础上同各主管部门就工资和社会福利的细节问题，进行具体的会谈。

喧嚷声平息下来了。格维亚兹达默默地退却了。谈判危机宣告结束。

然而激烈的事件仍不时发生。这里必须用几句话加以说明。

专家会议分成两桌进行。在比较重要的第一桌上，讨论了“政治性”的各点，即从第一到第四点。在第二桌上，讨论了经济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具体要求。罢工者方面参加会谈的除专家们以外，厂际罢工委员会的主要战略家安杰伊·格维亚兹达和博格丹·利斯（他主要负责文件第一点的谈判）从头至尾都参加了。利斯虽未坐第一把交椅，但也属于罢工中的最卓越的人物了。瓦文萨很少参加专家会议，他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同政府委员会的谈判，也就是“决策”一级的谈判上。当专家会议讨论书报检查问题时，莱赫·邦德科夫斯基也常常出席会议，他作为文

学家对这一点是非常重视的。他说："在这个问题上不取得成果，我就没有必要回到文学家中去了。"有时，当他提出的要求太过分时，专家们就提醒他注意，但在别的问题上他又对利斯和格维亚兹达起着抑制作用。

经济问题只是到了星期六才在第二桌上得到广泛讨论。厂际罢工委员会方面参加这项工作的有亨雷克·克日沃诺斯和弗洛里安·维什涅夫斯基。保健事业的代表、护士阿莉娜·平科夫斯卡也积极参加了。一次，她突然跑进会议厅叫喊起来："先生们！请安静！波兰广播电台发表了公报，说什么协议已经签订了，罢工已告结束。他们骗了我们！他们骗人！我们中断谈判吧！"后来很费力地才使她平静了下来。的确，公报过早地发表了，几小时后对此作了更正。

一般说来，女士们是比较易于激动的。同是在这一轮谈判期间，另一位年轻的、穿着考究，身上散发着高级香水味的女士闯进了专家会议厅，她情绪异常激动地跑到近旁的第一桌前高喊："是你们把我们出卖了！谈判骗局该结束啦！叛变该结束啦！"大家听了都为之愕然，特别是谁都不晓得她是什么人。随后好不容易才把这位女士请出会议厅，并许诺她，过一会瓦文萨要听取她的意见……

这一天，当一切都看来是这么顺利的时候，破坏谈判的类似的图谋还是有过不少的。有一个年纪较大、个子不高、秃顶的人，在工人中散发旅美波侨民族联合会的传单，并"打气"鼓动他们反对协商，他甚至在厕所里组织了个小小的抗议集会，反对"党的领导作用"的提法。他还中伤瓦文萨，说他"作风不民主"，因为他没有听取全体会议的意见，而全会"在这个问题上肯定不能容许投降的"。最后，当秃顶在煽风点火的时候，"团结"工会的小伙子们把他撵走了。在全体会议的几百名代表中，总是有

几个精明强干而又明智的人，当出现气氛逐步升级时，他们能够立刻准确无误地作出反应。有一个魁梧的、声音洪亮的司机特别突出，他说话清晰而又富有逻辑性，在必要的时候，他能立刻使头脑发热的人冷静下来。

趁谈判间隙，我走访了省委第一书记塔德乌什·菲什巴赫。他同意发表谈话。

“您和省委常委会是如何制定出解决危机的最终方案的？”

“拟定这一方案的出发点是要回答下列几个问题：罢工的基础是什么？其根源又是什么？工人行动的尖锐性和群众性是受什么影响的？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看法，认为原因就在于离开了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纲领，其中也包括格但斯克省的发展纲领，而其后果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整个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

当然，中央机关工作的缺点也影响到在国家和整个经济运行方面、在经营管理方法和计划方面、以及广义的同社会接触方面，产生许许多多的不正常现象。

所以很明显，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社会不满基础上产生的真正的工人运动。与此同时，他们期望通过这个运动能够有效地克服多年来不断发展的危机。因此，这是应当高度重视的相互联系的问题。

罢工期间，我是在我所隶属的党组织的所在地“巴黎公社”造船厂，因为我认为在这样的非常条件下，必须在冲突的主要中心之一的地方。这样，我就可以直接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态的性质和规模。我认为，这也是我的道义上的责任。”

“八月事件暴露出省委政策中有那些错误？”

“我作一个简短的回答：对于部政策上的缺点，我们未能很快地加以克服，还有在执行中央各项决定方面不够有效和不得力，而执行这些决定，对于本省的社会经济基本问题的解决，是

能起到有利影响的。”

“省委星期一（1980年8月18日）的全体会议在形成中央对于工人行动的性质及其解决办法的看法方面起了什么作用？”

“这次全会对于党的领导机构确定对工人行动性质的正确估计是有影响的。”

“书记同志，您如何评价今年8月19日中央书记处的信件？”（这封信突出了反社会主义势力的作用——作者注）

“我认为这封信是根据当时的全国局势写出的，但是它不符合三联城事态的具体发展情况，因此我们地区的党组织对这封信是持批判态度的。”

“如果在罢工初期您有可能同参加中央全会的委员们交谈，那他们会听到什么呢？”

“他们会听到我稍后在8月24日六中全会上说的完全一样的东西。”

“有人认为在罢工期间，不幸的是省当局无法作出显然应当作出的决定，这种看法有根根吗？”

“我们并不认为自己唯一有权作出必要的决定。但是我们指望能更充分和更快地考虑我们的观点。其实我们也是尽一切努力，使得我们的观点能被采纳。政府委员会的工作对于中央委员会作出决策是起了很大影响的。”

“能否说政府委员会主席米耶奇斯瓦夫·雅盖尔斯基副总理很快就看清了三联城发生的冲突及其性质呢？”

“米耶奇斯瓦夫·雅盖尔斯基在正确判断和解决冲突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本人的参与和他的政治经验以及同厂际罢工委员会进行谈判的才能，终于使谈判中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您想对公众说些什么？”

“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单独地进行活动，是解决不了我们的共同问题的。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大家的智慧、勇气、想象力和耐心，需要的是意志、有效的行动和对自身力量的信念。”

“对独立自治工会的组织者们您有什么话要说？”

“我们都是社会主义波兰的公民，因此我们应该拿出证据来，证明我们是深刻理解波兰现在和未来生存的最重大的问题，证明我们有能力为了波兰的利益作出必须做的一切。”

午后，我们给华沙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们解决冲突的好消息。他们不能理解，即将出现的两个工会中央机构是怎么一回事，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也问到反社会主义势力，总之，他们感到不安。

我们作了解释，的确，有过某些政治上不负责任的言论，甚至可以说是敌对的言论，但是从一开始就不是由它们来决定罢工的性质，也有过这些言论的传播者们被驱逐出造船厂大门的情况。

我们回到造船厂。从奥德河畔的克罗斯诺七家罢工工厂派出的一个代表团来到了会议厅。

格但斯克大学代表团宣布，该校工会把自己的特权转让给罢工委员会。大家为教授们热烈欢呼。

华沙大学、华沙钢厂、华沙“泰沃”工厂、华沙“乌尔苏斯”拖拉机厂的工会分别派代表团前来表示声援。“泰沃”工厂的代表还带来76,340兹罗提支援造船工人。

17时30分。广播电台发表了波兰通讯社的公报，宣布协议中的第一、二项要求已在格但斯克进行了草签，会谈将在晚上继续举行。

18时40分。有消息说，独立工会已经得到弗热什奇区马尔赫莱夫斯基大街13号的一幢房子作为会址。

19时30分。电视新闻报导了什切青市结束罢工和格但斯克草签两项要求、许多工厂复工、什切青港口开始装卸货物等消息，但是对格但斯克协议的内容——同意建立独立工会一事，却只字未提。相反地对社会上广泛议论改革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问题则报导很多。

格但斯克人听到什切青结束罢工的消息时，心情是很复杂的。他们希望，这里的罢工问题在明天也同样能得到最终解决。但是详细情况不了解，什切青罢工者是在什么条件下签订协议的，特别是他们是否也争得了建立独立自治工会的权利。"依据专家们的意见"，可以建立自治工会，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样的专家？谁的专家？看来，什切青议定书的第一点是写得不明确的。

什切青的罢工不仅发展得独特，而且看来似乎同格但斯克罢工的节奏也不一样。它的爆发要晚几天，可是从一开始就特别尖锐，其外部表现是诸如许许多多写在瓦尔斯基造船厂周围的攻击性的口号，以及"被包围的堡垒"的气氛，不乐意放任何从城里来的人(其中也包括记者)到这个堡垒中去。这种情况在格但斯克不曾发生过。厂际罢工委员会方面同以副总理巴尔齐科夫斯基为首的政府委员会最初几次会谈的调子也是很强硬的，有时简直就是无礼的。根据沿海地区一些专家的看法，这种差别反映出两个大港口中心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特点。什切青的多数居民(及其后代)是从以前的东方边境地区迁移过来的，他们的性格是易于冲动和急躁的，但是当他们闹完之后，也容易和解。格但斯克的大部分居民为卡舒比人(即今格但斯克省沿海地区人——译者注)，他们的性格比较沉静持重，但是也很固执。

总之，什切青协议是在略为不同的(既有比较困难的，也有比较容易的)条件下达成的。也许将来什么时候社会学家会从

这些情况的细微差别看到独立工会的不同的地区色彩。巴尔齐科夫斯基副总理在协议签字后发表的讲话中指出：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富有革新精神的协议。我认为，我们在场的所有的人都亲自参与了模范地解决这场社会冲突的活动。正是这个议定书形式的解决方式将有可能成为今后正确解决劳动条件、生活条件方面冲突的典范。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都会感到很愉快。我们完成了良好的工作，我们所以能把这项工作完成，是因为我们能够互相尊重，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大家肩负的任务和承担的责任”。

当人们在奥德河畔欢庆胜利的时候，维斯瓦河畔的人们却还在焦急不安。

傍晚，造船厂内仍然群情激昂，议论纷纷。怎么能够把“独立的”和“党的领导作用”两个概念调和起来呢？在草签的文件中是否把建立独立工会只限制在沿海地区？

格维亚兹达：“协议不可能具有地区的性质，要是这样的话，就不符合国家法律。”

有人提醒大家注意，大厅里有人在起哄：“这是35年来最伟大的胜利，我们不能容许任何人把这个胜利夺走。”

在关于被捕的保卫工人委员会成员的问题上，格维亚兹达说：“如果我们看着他们坐牢而不予过问，那永远是我们的一个耻辱。”

瓦文萨：“这並不是什么保卫工人委员会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的问题。我们保护的是人，而不是这样或那样的组织。我不想在这里再听到任何有关保卫工人委员会的问题！”

人们对书报检查这一项要求的落实不断产生怀疑，对检查机关作出的决定可向法院提出申诉是否现实？

格维亚兹达：“这方面没有我们想要得到的那么多，但是也

不少了。”

在代表中有人对主席团有意见，说主席团背着全体会议行事。另一人喊叫说，主席团对政府作的让步太多，但他没有博得掌声。人们在窃窃私语：挑衅者！

人们是有警惕的，因为这样的人在会场里已经查出好几个，他们是没有代表全权证书的，他们喊得最响，调子也最高。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出于这样或那样的意图，企图破坏政府和社会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系。这种人现在有，而且肯定今后还会不止一次地出现。

然而，他们是不会得逞的。工人阶级知道，他们已经得到了多少和可能失去多少。他们知道，明天就要昂首阔步走出造船厂。

可是焦虑不安的情绪依然存在。人们知道，雅盖尔斯基副总理，按自己原先宣布的，于19时30分从华沙回来了。但是谈判并没有恢复。谁也不晓得，这是因为什么。

八月三十一日，星期日

今天在第二号门前人群非常拥挤，几乎不可能挤到罢工职工上街必经的便门前。弥撒从9时开始，宗教仪式是在用包装纸铺贴的汽车拖车上设的祭坛上举行的。不仅是通往造船厂的狭窄的小街挤得水泄不通，而且在造船厂周围两侧也挤得很不舒服和令人难以置信。这里到处是坑坑洼洼和一条一条的小沟，沿着沟的一端放满了临时坐的长凳，它们摆成半圆形剧场的形状围绕着大门。大门四周用鲜花圣像等装饰着，好似一座巨型的圣像壁。大门上悬挂着红色横幅标语：“各厂矿的无产者，联合起来！”门前左边，在即将建立的造船工人殉难者纪念碑的地方，

竖立着一个木质的十字架。

现在几十个摄影记者，许许多多的摄影机，扩音器正在纪录宗教仪式，同时一直不断发表罢工公报和一些私人启事。诸如，有一个母亲在等待某某人，有一个给某某人的包裹，某某想穿过栅栏同大门那一边的某某会面等等。

两边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今天将要解决问题，但是他们还是没有把握。8点，广播电台发表了波兰通讯社公报，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五中全会“同意发表”昨天签订的什切青协议和三联城厂际罢工委员会提出的21项要求的头两项要求草签的消息。这种提法产生许多问题，而且並未解除人们的担心。造船工人及其专家们、大街上的群众、记者——所有的人都感到莫名其妙。到现在仍然还可以听到这样的言论，说厂际罢工委员会坚持第一项要求是犯了错误，这是通不过的，倒不如加入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机构并从内部对它进行改革为好。怀疑主义者说，厂际罢工委员会叫牌叫得太高了，它会输掉的，工人们将耷拉着脑袋结束罢工。像这样失望、甚至害怕的言论是很多的。主要一个问题是：既然雅盖尔斯基政府委员会回到了格但斯克，为什么昨天晚上没有举行最后一轮会谈？悲观主义者回答说，这肯定是因为华沙不同意第一项要求。

站在会场入口处的人群中，我们看到穿着雅致黑色服装的卡齐米耶日·多克托尔教授。他是一位社会学家，作为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专家来到造船厂，实地考察一下“正在发生的事态”。几星期以后，他作为政府委员会的专家，对《文化周刊》记者发表谈话，当记者问到教授是否肯定地认为罢工者所要求的只是经济方面的东西时，他答道：“是的，我深信这一点。别的问题是次要的，或者是第二位的，而把它们变成第一位的问题，那是知识分子编出来的神话。”

10时，厂际罢工委员会的会议大厅已经完全空出来了。纠察队采取了特别小心的严格措施，因为昨天在会场上除了有全权证书的代表外，还发现过未受权的没有代表资格的人员。还不知道，今天是否允许新闻记者进入全体会议会场。决定时时都在变：只允许20个，只允许听视工具工作人员进入，最后又决定，像往日一样，新闻记者都进入会场。

在谈判大楼周围，有数千名穿着工作服的群众聚集在扩音器的下面。

莱赫·瓦文萨在5名精神抖擞的造船工人亲随的保护下走进全体会议会场和主席团会议室之间的小通道。如果没有这些亲随人员，他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就动弹不了，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迫切的问题要找他。

华沙几家大工厂的代表团来到造船厂的消息正在广泛传开，这些工厂还没有罢工，但是已经处在"只等厂际罢工委员会一个电话"的状态之下。

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还在开会。政府委员会也在开会。虽然缺少可靠的消息，但是明显地感觉到紧张情绪在加剧。当在全体会议会场入口处查验代表全权证书时，几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尖锐的争吵。罢工者的神经受了17天的考验，已经极度紧张了。

11时33分，瓦文萨通过扩音器说：

"我们是怀着希望开始会谈的。请解释一下被拘留人员的问题。同时对第一、第二项要求，我们还有怀疑。一切问题都了结以后，过3、4个小时就宣布罢工结束。"

雅盖尔斯基："是让我说吗？我也表示满意，并且深信今天一定顺利结束我们的会谈。按照我自己的诺言，昨天19时30分我已经回到格但斯克，同时作好了结束会谈的准备。"

接着雅盖尔斯基简短地指出，他认为21项要求已经解决，最后他将发表一个声明，然后“我们签署公报草案和这个声明。”

瓦文萨：“同意。”

雅盖尔斯基：“谁来念文稿？”

瓦文萨：“我们可以念。”

接着按顺序宣读、讨论和签署除昨天草签的第一、二项以外的各项。

利斯宣读关于言论和出版自由的第三项。

雅盖尔斯基：“我接受这一项。”（掌声）

利斯宣读包含有“释放政治犯”提法的第四项。

雅盖尔斯基：“本着理解这个问题的精神，我同意，我签字。”

在院子里，在林荫小道上和草坪上，听着谈判经过的工人们，第一次在副总理说话后热烈地欢呼起来。

格维亚兹达：“我得到最近被扣押人员名单的附件。请谈谈这个问题。”

雅盖尔斯基：“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最后再谈。”

接着宣读第五项有关通过群众性传播工具报导厂际罢工委员会的成立和发表协议文件的要求。这一项通过以后，瓦文萨向副总理提出：

“我们想了解被捕人员的情况。人们要求知道。”

雅盖尔斯基：“我现在刚得到名单。”

瓦文萨：“我们昨天就交给科沃杰伊斯基省长了。”

雅盖尔斯基：“昨天省长通知我，已经把名单转交给了总检察长。我是政府的代表，而这方面的问题是属于总检察长的职权范围。我可以答应，现在我们签署协议，然后我回华沙，说明情况。”

阿莉娜·平科夫斯卡（护士）：“副总理先生保证过罢工者

和支持罢工者的安全。”

雅盖尔斯基：“我可以完全负责肯定地说，我一定按这里的意见把这个问题汇报上去。别的权限我就没有了。”

格维亚兹达：“副总理先生，如果您有诚意的话，那么为什么现在还在继续抓人？我们现在又有一份名单。这些人好心好意地帮助过工人，原先把他们释放了，现在他们又被逮捕了。”

雅盖尔斯基：“我将尽一切努力，今天就到华沙汇报这个问题。”

瓦文萨：“我们必须进行谈判。因为我们有罢工的权利，在马尔赫莱夫斯基大街13号有我们的会址，如果不释放他们，我们要再次宣布罢工。”

接着开始详细讨论社会福利经济方面的各项要求。对于罢工期间工人的报酬问题，以及提高工资的限额问题上，继续出现了不同看法，但这些问题还是通过妥协得到了解决：先签字，然后按工作程序详细讨论。在签订了第二十一项以后，瓦文萨说：

“我想，我们现在有了我们原来所想要的东西了。”

雅盖尔斯基：“我建议签署公报。”

瓦文萨：“我建议20分钟的休息，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准备公报，副总理先生向华沙打听一下那些人的情况。休息以后，我们在代表大会会议厅签署协议。可能休息时间还要拖长一点。”

集会者中的紧张气氛并没有下降。800名代表对委员会和工作小组谈判的拖延感到焦急不安。有时可以听到这样的话：“但愿他们不要背着我们干事。”全体会议的气氛要比主席团的气氛激烈得多，因为主席团委员们已经掌握了耐心谈判的本领。这时可以感觉到，厂际罢工委员会中存在危机的威胁，因为全体会议可能向主席团施加压力，要它提出更尖锐的要求，从而使局势更加紧张起来。

众所周知，有那么几个顾问也是朝着这个方向活动的。而多数顾问则是抑制他们的要求(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并且希望达成谅解。

就在休息时间快完的时候，在格维亚兹达周围聚集着一群青年和年纪较大的人，这些人主意特多。在这以前他们还没有在会议大楼里露过面。他们论证说，不应该作任何妥协，相反，在有关释放被捕人员问题上，应向政府提出更加尖锐和强硬的要求。格维亚兹达淡然一笑。扩音器在呼喊，请瓦文萨公民(这种正式的称呼是从哪里突然出来的？在这以前一直是叫“瓦文萨先生”或“莱谢克先生”)马上来一趟。主席团开会研究突然出现的问题。13时20分听到瓦文萨的声音——这次声音洪亮，口气坚决。他向代表们宣布，协议已经达成，副总理向我们作了保证，不提出任何附加条件。协议定于16时签字并将在电视新闻中宣布结束罢工。现在工作开始了，从这项协议中我们将会得到什么，这取决于我们大家。理智，理智，理智。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会满意，但是大多数人是满意的。是否将来也满意，到12月16日在我们建立的纪念碑前再说。每年我们大家都将在那里举行集会。如果我不在那里，你们可以找我。

16时30分，主席团会议室。

瓦文萨：“我建议，副总理先生说说被捕人员的问题。”

雅盖尔斯基：“我想发表下列简短的声明。第一，我想重申在我们的协议中所表明的，参加罢工或支持组织罢工，将不会受到惩罚，除非触犯了刑法。第二，我认为，在各种问题上积累了许多误会，因此，我想申明，检察机关将作出决定在明天——即9月1日——12时以前，释放由它所扣押的人员并释放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提交的名单中的人员。我深信，将来，如果这些人的言论和行动不触犯刑法，就不会对他们采取法律所规定的

措施。本着对我们在此讨论的这些问题，即21项要求的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和理解，我可以说，华沙各个相应的环节已经着手工作，而且正在进行中了。因此我恳请你们，主席先生，向我声明，就是在签署文件以后，在我的声明发表以前，宣布结束罢工。”

瓦文萨：“是的，副总理先生，这个声明我已准备好了，我就要发表。”

雅盖尔斯基：“到那时我就签字。”

瓦文萨：“副总理先生，我们很高兴，尽管我们的会谈开始是困难的，但是后来却是在越来越谅解的精神下和寻求摆脱这一困境的最好办法的精神下进行的。我能够满意地指出，我们没有使用武力，而是通过会谈和说服的途径，结束了我们的争论。我们的行动表明，波兰人，只要他们愿意，总是能够互相谅解的。因此，这是双方的成功。我们将记住这一点。我们希望，那些签订的东西，将能得到准确、完全的遵守。我深信，这对国家有好处。现在我想对所有听我讲话的人说几句话。

亲爱的人们！9月1日我们将恢复工作。我们大家知道，这一天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在这一天会想些什么——想的是祖国，想的是民族事业，想的是家庭的共同利益，这个家庭叫做波兰。我们的新工会从明天开始生存。让我们关心它，使它永远是独立的、永远是自治的，为我们大家、为国家利益、为波兰进行工作。我现在宣布罢工结束。”

全体起立，满怀激情地高唱国歌。

热烈欢呼以后，瓦文萨：“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到大厅去。”

政府委员会和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来到大厅，在主席台就坐。在主席台上安放着列宁纪念像，正面挂着国徽（白色鹰徽）、十字架和国旗以及1970年殉难造船工人纪念碑模型（是由格但斯克造船厂船体三号车间的放样间制作的）。

16时40分，瓦文萨讲话：

“我想再一次感谢副总理雅盖尔斯基先生和一切不允许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力量。我们以波兰人对待波兰人的方式通过会谈和谈判这个完全的、唯一的途径达成了协议；其间作过一些小小的让步，这从来都是应该的。我们现在明白，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我们必须一起把颠倒了的一切颠倒过来。首先我们必须感觉到我们是这块土地的主人，我们将怀着这样的感情来进行工作。你们信任我和相信我，我说，我将不遗余力来促使这一点的实现。我知道，你们会帮助我。我们会做到的。”

接着雅盖尔斯基副总理指出：

“在我们共同工作的整个时间里，我们力求了解支配你们的意图。你们向我们列举了许多尖锐的论据。我们也作了辩解……我确认并完全坚持所说过的话：‘我们是像波兰人应该同自己人那样谈话，像波兰人同波兰人谈话那样，进行了对话。’在我们的整个会谈期间都充满了这种精神。没有输家，也没有赢家。没有战败者，也没有战胜者……全国都在看着我们。让我们作出榜样来。让我们像声明过的那样，共同前进，忘我地工作……”

由政府委员会4名成员和厂际罢工委员会18名成员签署文件的令人激动和庄严的时刻到来了。

大厅里响起了暴风雨般的长时间的热烈欢呼声。

16时56分互换签署的文件。瓦文萨细心地把文件放在自己的公文包里，确切地说是放在一个不久前在一个角落里找来的文件夹里，从这个夹子里一切东西随时都会往外散落。几个年轻人拿着罢工期间出版的《团结报》来到主席团。

瓦文萨：“你们还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团结报》将成为我们工会的刊物。”

穿着日常工作服的造船工人簇拥着政府委员会的成员退出会议大厅。谈判初期的冷淡气氛消失了。副总理由于谈判得法而得到造船工人越来越多的赞扬。

瓦文萨在一片“莱谢克，莱谢克！”的欢呼声中退出会议大厅。

他走到大门前同聚集的人群一起欢呼。但是他很快就回到全体会议的会议室，走到扩音器前说：“我失礼了，我还没有感谢我们的专家，他们为我们出主意，他们出的主意很好，他们得继续帮助我们。专家组是由编辑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领导的(鼓掌欢呼)，还有盖雷梅克教授。”他念名字有点吃力，因为他们都不是慕名求援请来的，这些人是自愿前来声援他们的。

接着由利斯继续念名字：科瓦利克副教授，斯坦尼什基斯博士，库琴斯基博士，维耶洛维耶埃斯基编辑，齐文斯基博士，斯泰姆布罗维奇教授，斯特热莱茨基博士，斯泰尔马霍夫斯基教授。鼓掌，热烈欢呼，万岁！

瓦文萨：“请专家组长讲话。”

马佐维耶茨基：“我感谢你们，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希望你们忠实于团结和理智的精神。”

四个小时以后，厂际罢工委员会会议厅几乎空无一人。现在会议厅由工厂卫队负责管理。两个女打字员即将把协议文稿打完以便交付印刷。最后几个带着红白袖章的纠察队小伙子在催促她们快一些，因为罢工已结束，厂方恢复了权力，这个时候，我们所有在这里的人似乎都成了不速之客。但是我们必须得到经厂际罢工委员会“同意”和由他们中一人签字的协议文稿。

在走廊上还有几个《团结报》的编辑在转悠，他们对于从非法状态转入合法状态，一时感到茫然。“我们好像是从空中回到了地面。”其实他们还是不知道他们究竟在那里，他们说，那个

教他们搞出版工作的，非法出版社《诺瓦》的头头米罗斯瓦夫·霍耶茨基已经被释放了。从弗罗茨瓦夫也来了3个厂际罢工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和我们一起等待协议文稿。无论是电视台报导的关于什切青结束罢工的公报，还是格但斯克达成协议的公报，都不能使他们相信。他们不信任电视台：既然他们整过维辛斯基，同样他们也可以整一整瓦文萨。他们希望有一个由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签字盖章的、完整的协议书面文件。他们说，只有这样的文件才能使我们停止弗罗茨瓦夫的罢工。

他们通过各种途径，靠自己的机智和冒着一定的风险来到格但斯克。他们回去则乘坐格但斯克省机关的汽车。必须赶紧回去，以便在明天12时整个弗罗茨瓦夫也能开始工作。

他们在凌晨4时回到那里。正如他们所说的，弗罗茨瓦夫也行动起来了。

我们也准备起程回华沙。

刚一出门，克日什托夫·韦什科夫斯基把我们叫住了。他是一个木工、《团结报》的出版者，他给我们解决了那份协议的副本并送给我们一本背着书报检查机关出版的《1964—1966年维托尔德·戈姆布罗维奇日记》。他请我们用车把他送到奥利瓦，因为雷沙尔德·卡普希琴斯基在那里等着他。他有一大袋装得满满的罢工文献，还有毯子和一些个人用品。经过两周的罢工后，他现在要回家去。当然，我们非常乐意……好不容易我们才全挤进这个小不点的车。现在我们一起在考虑我们的处境。我们是官方报刊的代表，而他是罢工方面的代表，也就是说，形式上我们好像是对立的双方。但是在这抗议的和最终和解的人群中，难道能说存在两个方面吗？8月31日的夜晚到9月1日，在这民族和解的时刻，这又有什么意义呢？但愿这样的和解持续下去。但愿这样的和解不会因为有人企图把要求逐步

升级而遭到破坏，也不致因有人想把格但斯克协议一笔勾销而受到损害。

写在1980年12月

有关格但斯克罢工的报导几乎变成了对遥远的过去的回忆，因为最近几个月来，时间在波兰过得特别快，每周都有像过去一年里所能发生的那么多的事件。国家的社会政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近几年来普遍存在的使人无所作为的颓废气氛虽然消失了，但是乐观主义并没有取而代之，代替它的却是时刻都在变化的、破灭的希望与焦燥的患得患失的气氛。情绪的秋千从极度兴奋摇摆到悲观失望。感情和精神的平衡状态还远未达到。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六次全体会议，对于使波兰陷入深刻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初步分析。在经济领域，错误的根源首先是不顾后果的唯意志论，它造成追求巨型项目的投资，轻率地购买数百项许可证，而不顾及费用核算和国家收支平衡表的沉重负担。各主管部门和地方集团的本位主义利益，长期忽视农业的需要以及对许多基础结构部门的漠不关心更加深了经济的失调。这一切造成资金的浪费和整个国民经济生产能力的下降。在社会政治领域，特别是在最近5年，也存在着公众能感觉到的许多消极现象。前领导所搞的那一套专家治国的作法，导致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原则的忽视，导致触目惊心的社会分化，其中如令人愤慨的贪污现象的产生，在许多活动家身上存在着达官贵人的风度和傲慢的作风，导致伙伴关系的中断和上下之间的不通气，愚弄群众，以及用令人气愤的弄虚作假的拙劣手法来

“宣传成绩”。在党内关系方面，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准则消失了，甚至共产党人所必须遵循的谦虚、坦白、忠诚的原则也不见了。

那些引起工人阶级坚决抗议的消极现象，可以列举出来的则更多，在六中全会、七中全会和议会的会议上，许多发言者对这些现象的根源已作了分析，因此本书的目的，不是要对我国所经历的危机的原因这一问题作充分的答复。

说句公道话，还必须指出，在党的队伍中早就有人发出过警告：国家事务越搞越糟，存在着尖锐的社会冲突的危险。在党的八大以前也可以听到许多类似的呼声，不止一个省级党组织(其中包括格但斯克省)向政治局报警，说经济上乱七八糟的问题堆积如山，社会上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但是，国家政治领导人却把这些警告当作了耳旁风。

在罢工运动的冲击下，国家、经济、社会生活方面依靠少数的专家治国论者的做法遭到了挫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马上就会好起来，因为经济上的失败、保守势力的反抗，以及严重的不信任和逐步升级的要求，都会牵制改革的努力。毋庸置疑，这是人民波兰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纠正的过程是艰难地通过克服物质的阻力前进。过去的失败，特别是1956年和1970年产生的机会和希望的破灭所引起的一切恐惧和一切压抑情绪，都不会很快就消失。

难道历史会重演，再一次把革新的理想化为痛苦吗？我们是否会丧失这次最新的机会，来使我们的制度大大地接近社会主义理想呢？这些问题困扰着每一个成年人，困扰着每一个思考问题的波兰人。他们还记得1956年在阅兵广场上举行的那一次在人民波兰历史上自发的最大示威，当时人们热烈欢呼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重新回到国家领导岗位上掌舵；他们也记

得，当1970年听到哥穆尔卡下台的消息和爱德华·盖莱克的第一次电视演说时，人们是多么轻松愉快。这次演说照亮了被沿海地区的“十二月事件”这场恶梦折磨的祖国大地。

然而，十二月事件后的热情，就像以前十月事件后的热情一样，很快就消失了。

格但斯克的罢工工人在今年八月份顽强地重复说：“要么就现在，要么永远也不！”

显然，谁也不能保证，今后在我国人们是否将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加公平合理，是否能实现那怕是杜维姆(尤利安·杜维姆——20世纪波兰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译者注)的号召：“即使贫穷吧，然而是清白的！”甚至这样一个要求不高的纲领，也不能认为是肯定能解决了。

但是，存在着乐观主义的前提。夏天和秋天在社会上出现的那些情况，从理论上说，它不应使任何人感到突然，可是在实践中，在这以前还从未那么明显地出现过：工人阶级对国家命运承担起真正的责任，而且表现出使国家生活健康化的决心、卓越的自我组织才能和对民族的历史使命的深刻理解。工人阶级对最近几年来实现社会主义目标所采用的方法的坚决抗议和反对，并非像那些名声不好的方法的捍卫者歇斯底里的叫喊的那样，是对社会主义目标和理想的破坏。相反，工人阶级正是在捍卫这些理想。

多年来未被察觉的、隐藏着的、被掩盖的矛盾的冲突，导致在波兰产生新的政治标准，它使那些习惯于按教条主义思考问题的人感到恐惧，但是那些懂得发展辩证法的人却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党的前领导关于“民族完全一致”的唯心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失败了，脱离劳动群众行使政权的方法失败了，“官方的乐观主义”信誉扫地了，因为它无视一切不利于当局的

事实。

党中央委员会承认工人抗议的合理性，在七、八月危机时期选择了同工人阶级协商的路线和革新的路线。正如七中全会强调指出的，这是在制度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决定。它意味着在执行党的指导路线的范围和方法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样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工会，自治地和独立地关心社会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

由于格但斯克协议和什切青协议的签订，出现了有数百万人参加的、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工会运动，这一运动立刻成为国内政治力量结构中的新因素。“团结”工会章程宣布的非政治性丝毫也不缩小这一说法的含意。新形势带来的后果，肯定将是各种各样的，它们的充分显露还需要一段时间；而理论上的总结，就需要马克思主义者来认真思考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新形势将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团结”工会、革新后的行业工会，以及许多正在活跃起来和重建的自治组织、合作社组织、创作组织、青年组织都可以成为社会监督的真正因素。这是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因为正如历史的普遍经验所表明的那样，每一个政权（不论是哪一种制度的），如果不受被统治者的经常监督，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形。如果不存在有组织的社会力量来监督遵守法律，那么写在宪法、法律和其他规章制度上的保证，是不能防止各种变形的。

但是对革新过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将是党本身的内部改造、列宁主义民主原则的实现以及党在改善波兰社会主义方面的活动能力。当然，这种必要的变革是没有什么“自动进行”的可能的。克服党内的错误，首先取决于党员群众从思想上参与其事。现在有很多的迹象表明，他们的积极性可望发挥出来。

广大普通党员和一部分有觉悟的干部，早已深刻地觉察到

群众对党的信任程度的下降，他们坚决希望——有时表现得非常明显——以革新精神进行彻底的变革，首先是社会生活、党内生活实行有可靠保证的真正的民主化。

党的领导也表示了这种愿望，七中全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新和与社会协商的过程是不可逆转的过程。

但是，不能忽视党内保守势力阻挠革新的图谋，他们常常胡说什么党对工人阶级归还权力的要求“投降”，似乎工人的党可以变成为对抗本阶级的力量，实际上党领导作用的合法地位正是工人阶级赋予的。“团结”工会对社会生活的强烈的冲击，以及它的某些环节的逐步升级的要求，也引起一部分党的干部和党的机关的防卫性反应，促使他们的态度变得强硬，从而阻碍了党内革新的过程。不管怎样，可以抱有这样的希望，即在重新估价的复杂过程中，要求党的工作方法现代化和要求绝对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取代官僚主义集中制)的路线必定会取得胜利。

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团结”工会某些环节中出现的激进的，甚至是极端的倾向。温和妥协的代表莱赫·瓦文萨是否时时处处都能抑制住狂热？“团结”工会是否能控制住自发性罢工浪潮，这种罢工主要是由于地方性的各种问题引起的，它使经济机构更加混乱，并加剧了局势的不稳定，因而对整个社会都是有害的。再者那些违反工人阶级利益的无政府主义的行动，以及引起紧张、混乱和对已签订的“社会公约”有害的行动，仍在不断增加。

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无疑会导致非法的政治反对派内的各集团的两极分化。那些过去和现在反对波兰政治制度的歪曲，而赞同社会主义制度基础的人，大概将会逐步回到合法地位。那些在纲领上敌视社会主义的组织和个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不可能改善的制度，虽然他们企图渗透进“团结”工会的队伍，

想按自已的意图来改造工会运动和实现“第二阶段”，但是他们的活动余地将会越来越小。可以指望，工人们将拒绝这种向自己队伍中渗透的企图。在格但斯克罢工期间，曾经有人企图这样做，但是他们遭到罢工工人领导的坚决反击。

在革新的航道上仍然存在着许多暗礁，它们将长期威胁革新的进行。要能排除暗礁需要整个社会自觉地、有力地支援党内外政治上明智的力量，并支援所有想使波兰摆脱危机的爱国者的联合行动。

11月20日，米耶奇斯瓦夫·雅盖尔斯基副总理在议会作关于格但斯克协议和什切青协议执行情况的报告时指出：“今天对我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正在纠正错误并在社会主义生活机制中创造新的价值的党同所有的人（指那些不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而正是为了社会主义而要求进行变革的人，他们不是想削弱人民波兰，而是想使她健康和巩固）的联合行动。”

我们相信，这次不会走回头路。波兰有能力让她的公民按照法律来民主地治理自已。波兰有能力完善自已的社会主义制度。

沃伊切赫·盖乌任斯基

莱赫·斯泰凡斯基

后　记

（本文是作者对亚茨克·马齐亚尔斯基编辑所提问题的答复，以“工人们怎么啦？”为题刊登在1980年9月21日《文化周刊》第38期上。）

在关于1980年7、8月份出现波兰事件原因的全民讨论中，反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能否早一些预见到，或者那怕是考虑到爆发群众性工潮的可能性？特别是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们，他们有责任系统地观察在一定的社会集团、阶级、阶层内部的行为、表现和情绪的变化，他们是否觉察到爆发危机的征兆，并预先提醒当局注意爆发危机的危险呢？

现在我国的任何一个人——担任国家领导职务的人更是肯定无疑——谁也不能说，他们对七、八月事件感到突然。在过去不止一次地发生这样的情况，无论是在波兰，还是在世界范围内，社会科学都未能预见到某些范围非常广阔的社会动乱（例如青年造反和种族骚乱等），而这也就是目前社会学虚构的结构危机观点流行的原因之一。但是，这一次波兰的社会学家们没有丢脸。可以说，几年前，特别是在1976年以后，他们就不断提醒大家注意肉眼都能看到的严重的经济、社会、道德危机的明显的征兆。

但是，不仅一年年加剧的出版政策中的困难限制了人文科学著作的影响范围，而且社会科学方面（其中有波兰社会学学会、波兰经济学学会、“2000年的波兰”预测调研委员会和其他咨询机构）的专家们所提交的（往往是约稿）调查分析性的、判断性的或预测性的论文，在国民经济目前的管理和制订长期发展规划方面均未被采用。

因此人文科学界痛苦地看到，他们的呼声没有受到“上头”应有的重视，也就是说，科学咨询没有成为行使领导职能的人的迫切需要和某种程度上的精神命令。然而这些人决定着全体公民的命运，因此他们有责任过细地了解他们负责处理的问题。

社会觉悟问题，其中也包括工人觉悟问题，以及他们的表现、行为、需要和要求的形成问题，在社会学、政治逻辑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中受到广泛的注意。从论述这个问题的许多

文章中，可以了解到很多有关工人阶级在工业化、都市化、普及教育和群众文化、技术进步和职业结构的多样化等影响下发生的变化过程。

工人的群众性行动及其进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纲领——我认为——同大多数论述现代工人阶级觉悟的文章的结论基本上未发生明显的矛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关于工人阶级先进作用的论断(它被某些学者看作是干巴巴的官方公式)就不需要完全新的、生动的内容来加以充实了。

公众舆论一直很少了解这些情况，例如列宁造船厂在罢工期间产生的无产阶级诗歌(我也只是了解到一点儿)。除了激烈的政治性讨论外，在这个被工人占领的工厂中斯巴达式的生活条件下，还开展了极为丰富的文化艺术活动，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遵循的是近乎苦行僧的道德准则。这些事实可以肯定地说明，僵硬的公式是不能反映社会学家所熟悉的(可是了解得太肤浅)丰富多彩的工人生活。

现在我们也不可能再现(尽管只是主要轮廓)全国范围的罢工过程，以及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样的社会职业集团和范畴在他们中间起领导作用？在这方面根本缺乏足够数量的情报和资料来源。

罢工浪潮逐渐波及到全国，八月底达到了高潮。当然，在各个时期和各个地方，罢工的场景是各具特色的。

从直接的一鳞半爪的观察(罢工的头三天我在三联城)和地方报刊、国内外报刊、厂际罢工委员会的新闻稿以及那些在格但斯克沿海地区、在什切青和卢布林省目睹这一事件的人的报导，我得出一个结论：青年工人在发动和组织罢工方面起了特别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一切情况都表明，举行罢工的企业和机关并不是“几代人冲突”的场所，其实我们的社会学家从来也没有

想去夸大这个问题。到了罢工的成熟阶段，对罢工的进程和性质起决定性影响的已经是中年一代的工人了，但是年轻人的积极性和他们的参与一刻也没有减弱。

工人运动反映出普遍存在着非常强烈的失望情绪，这个运动抗议和反对很久以来就能明显感觉到的并在党内受到批判的管理体制方面的官僚主义控制和专家治国的不正常现象。而这种类型的运动通常是一种多方面的现象。第一，它具有历史的背景，这就是说，它的出现不是像晴天霹雳一样突然。即使在当时已经有人，特别是运动的矛头所向的人对之有所感觉，但它还是经历了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才达到这个临界点，即人们已经认定不能再照老样子生活下去了，而“上头”还没能下决心照新章法，即按照他们自己曾经承认和宣传过的，但没有得到遵循的纲领原则来进行统治。这样就出现了某种可称为“革命形势”的东西，其特点是人们充满着豪情，认识到自己肩负着重要的使命，感觉到必须有坚强的团结和严格的纪律。

第二，具有像七、八月事件那样的规模和气势的运动，通常是在尖锐的经济危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我国条件下，这种危机表现为国民经济基本部门(即投资、原料、动力、运输、市场、商业、各种服务事业等)的紊乱。

在经济领域中出现困难的问题，虽然部分地可以归咎于所谓的客观因素，特别是在全世界范围出现的货币危机、燃料动力危机、原料危机，以及自然灾害，但是，甚至对经济政策问题完全外行的人也早已觉察到，在他的眼前正出现用艰苦劳动和不小的牺牲建设起来的国家财富遭到巨大浪费的过程。那种所谓潜力没有发挥之类的好听的说法，实际上是经营管理体制效率低的明证，因为这种体制是建立在错误的官僚主义指令和唯意志论的前提上的，而且是忽视现代计划和管理科学的基本原则的。

臃肿的经济结构运行机制的低效率，不仅引起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的专家们——经济学家和组织理论家的可以理解的焦燥不安，而且也越来越使广大群众担忧。工人抗议的原因之三，是人们对于不称职而又高傲的专家治国论者，在调整经济机体方面表现的能力和决心持怀疑态度。

国民经济的紊乱及其生产能力的急剧下降使得雄心勃勃的综合性的社会福利规划(它是十二月事件后的最伟大的成果，它在当时保证党得到群众的支持)除充分就业一项外——固然它是规划的非常重要的部分——其它均未能实现。在某些方面，例如增加工资和提高最低工资、抚恤金、退休金，以及普及社会保健事业等方面，的确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与此同时，在对一般日常生活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些方面，如市内交通、上班的交通安排、特别是住宅建设，在70年代的下半期出现明显的倒退(等待住宅的时间延长了)。总之，已宣布的社会福利目标中的任何一项都没有完全达到，因此在社会意识中更增强了这个信念，就是尽管作了许诺，但生活条件不仅没有得到改善，相反，却是一年年不断恶化。

在这同一时期，因得到非法的来源收入而过着奢侈生活的特权阶层不断扩大了。于是在工人群众中逐渐形成不满和失望的第四个原因，即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社会正义感受到了严重的挫伤。

最后，第五，多年来所进行的已经仪式化的那一套所谓成就宣传，事与愿违地为工人的群众性运动准备了土壤。这种宣传占据了群众性传播工具，首先是电视，同时还有广播和报刊，只有一些社会文化周刊还能悄悄地报导一点客观的、批评性的和得到读者信任的内容。

这种宣传全然不顾在统计方面极易核实的这样一个事实，

就是现在的波兰人是受过教育的人，更不用说历史经验赋予他们有批判力的头脑，使他们对大话、空话和目空一切的花架子具有免疫力。

近年来群众性政治宣传中存在的幼稚病、粗制滥造和公式主义，使得人们预先就能知道，例如，在电视新闻中，哪些人在什么样的排场下、用什么样的头衔、按什么次序将要出现在屏幕上，不论他们的出现用的是多么老一套的借口，都是如此。这种宣传收到的是与原来设想完全相反的结果。那些想通过宣传让大家接受的东西，却本能地引起了人们的反感，而那些想引起厌恶的东西，倒几乎变成了令人同情的东西。

我甚至认为，这种宣传並非由于报道了经过选择的、不完整的、往往是骗人的消息而最使它自己丧失信誉。说起来可能有点愤世嫉俗，反正我是不相信有不受操纵的宣传的！最糟糕的是，这种粉饰性的、说教式的和乏味的宣传藐视人民的聪明才智，伤害了他们健康的理智和温和的美德。许多有才华的记者、政论家、评论家是值得同情的，因为他们的才能竟不得不浪费在如此不得人心的工作上。

我上面列举的群众不满、愤怒和不信任的许多原因，这些原因最终就造成一种只要有一个火星就可能引起爆炸的令人震惊的混合剂。

今天不仅波兰的舆论，而且几乎全世界的舆论都提出“七一八月事件”的原因这个问题。同时，也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些事件的进程中，是否存在某种规律性，特别是这些事件是否具有自发的性质、抑或是有组织的、预先就计划好了的行动。

在休假季节席卷全国的大罢工过程中，我看到，某些涉及群众性社会运动发展的规律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得到了证实。

这些规律性的第一条是，经济性罢工转变为政治性示威。同时必须记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更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甚至“纯粹的”经济性罢工，由于事实本身的存在，就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在社会主义制度“正常”运行的情况下，罢工应看作是与时代不合的现象，因为怎能合理解释这个事实，即生产资料的合法占有者和国家的统治者竟会造自己的反呢？显然，他们已经得出结论，再也不能把自己和现存的管理国家的体制等同起来了，因为只顾自己的本位主义的利益和需要为特征的无处不在的官僚主义是排斥工人直接参与决定自己的命运，并使党和工会这样的组织脱离工人群众。这些组织的权力来自工人，它们本来是应该关心工人的利益的。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建立独立自治工会的要求是罢工工人超乎一切的最重要的要求。建立这种工会是要捍卫劳动者，防止官僚机构一旦撇开群众监督就自然会表现出来的独断专横和麻木不仁。现在看来，被一些社会学家称之为机构病理的社会弊病，就是社会主义也避免不了。

另一条也已被人认识的群众性社会运动的普遍规律是，自发行动和有组织的行动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如果认为，任何一次劳动者的群众运动，在缺少客观基础（也就是那种自发产生和汇合起来的集体意志去摈弃现有统治习惯的作法）的情况下，有可能被老练的阴谋家准备和组织得非常完善的话，那就是非常幼稚而又盲目无知的。

毋庸置疑，工人不满情绪的爆发，具有自发的，而不是预先导演好了的性质。同样，工人善于为自己的运动及时地建立组织这一事实，也不应使任何人感到突然。其实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常识之一是，使工人在为社会正义的斗争中起先进作用的各种特质，诸如组织才能、纪律性、团结、友爱精神都是在劳动，

特别是在大工业劳动过程中培养起来的。

第三条，“指导”每一个群众性社会运动的规律（它与前一条不矛盾），表现在参加这个运动的总是有这么一些自发的或抱有自己的打算的个人和大大小小的集团，他们不自觉地或者蓄意地能够或者希望把运动引向与原来的意图和出发点不一致、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航道。这可以说是一个教科书式的历史社会学真理。

这一条规律也同样适用于工人罢工，因为他们的罢工不可能不使我国的反社会主义的反对派的行动活跃起来。如果罢工运动参加者无视或轻视这个不可避免的现象，久而久之就可能使自己的努力付诸东流。众所周知，他们所作努力的前提是社会主义革新和清除它的官僚主义污垢，而不是要把社会主义毁掉。

其实，这一忠告不仅适用于他们，也适用于我们的党，党也是一种群众运动。有许多货真价实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投机分子、道德败坏分子、彻头彻尾的堕落腐化分子渗透到我们这个拥有三百多万党员的党内来。社会主义对他们来说早已不再是——如果曾经是的话——一种信仰，而是变成了谋取职位和财富的跳板。正是他们这些人——也许比党所犯的错误还要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政策在社会上的威信（这个词近来风行一时）。

学会区分谷壳与谷粒、或是区分肮脏泡沫与清澈流水的本领，看起来可能是很简单的，然而在群众运动中，却变成了非常困难和复杂的问题。在现有的条件下力求掌握这种本领，其中就意味着，不让未受控制的情绪上升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一定的、必要的及最起码的批判精神和理智。甚至在集体反应的冲动和猛烈确有道理的情况下，在提出希望和要求时，也要保持一定的耐心和现实主义，同时还要记住，对接受要求的人必须留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以便使他们能够认真地执行所承担的责任。

要尽可能准确地斟酌每一句话，特别是这句话若具有指控的意思，而对所指控的事实又未进行核实的时候。

各界人士就波兰发生的事件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这些讨论的一个特点是经常提起前些年，特别是1956年、1968年、1970年和1976年发生的事件。现在我试图从这些戏剧性的社会冲突中找出它们的共性和差异。

我不想把1968年和1976年的事件同1956年、1970年和1980年的事件相提并论，因为前者——据我看来——不管怎样还只是具有警告的性质。的确，我们必须用很长的时间下一番功夫好好思索一下，怎么可以忽视乌尔苏斯和拉多姆（指1976年华沙乌尔苏斯拖拉机厂和拉多姆市的罢工——译者注）发出的令人不安的警报，而不把喧嚷一时的经济"改革运动"进行到底，不改变宣传工作中的狂妄口气，不进行——那怕是为了体面——政府中的必要的人事变动。须知，许多党的活动家和党员在当时和后来都发表过警告性的言论，党员知识分子和非党知识分子越来越经常地表示已准备好同当局进行对话，同时提出一个戏剧性的问题：怎么办？并且在考虑：如何摆脱这种状况？

从理论认识观点和政治实践观点出发，来探讨连续几次工人造反的共性和特性肯定是重要的。然而我并不认为，任何人今天都能遵守严格的科学原则来回答这个问题。为了不抓破伤疤，曾经认为，对导致波兹南和沿海地区悲剧事件的社会心理和政治机制进行社会学研究是不适当的和没有必要的。但是，我认为，以政论的形式对战后三次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作一般性的论述还是可以的。

这几次运动的共性是，在提出改善生活福利条件（每次提出条件的限度，无疑都比前一次高，但还是不能满足不断提高的希望和要求）的同时，都提出社会政治性的要求。这些要求不是反

对社会主义的，而是反对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特别是反对当时群众最明显感到的歪曲。

最概括地说，工人们一再要求扩大民主权利，以及从制度上保证他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所享有的真正参与管理的权利。工人们以他们所特有的坦率方式提出政治改革的建议，而且完全意识到，他们是作为全社会或者全民族利益的代表在进行活动的。

他们的带头作用最明显地表现在今年罢工时，尤其是自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建立之时起强烈要求对社会主义共和国立刻进行改革的活动中。厂际罢工委员会在提交政府的内容广泛的急需解决的问题清单中，考虑到了各职业集团（其中包括保健工作者）和非无产阶级社会阶层，即农民（拥有个体农庄权利的持久保证）以及创作知识分子（对书报检查权限从法律上加以调整）的具体需要。

在人民波兰接连发生的三次社会政治危机的特征，可以从它们的时间范围、它们的规模、组织形式以及克服它们的方法来进行考察。

波兹南事件持续时间较短，在公众记忆中留下了称之为“黑色星期四”的事件。沿海地区的冲突持续时间较长，它以“十二月事件”的名称载入史册。今年的罢工斗争（乐观的说法是，随着格但斯克协议的签订而结束）持续了两个月，今天人们已习惯于称它为“七—八月事件”。

这几次工人运动的规模也是不断扩大的。1956 年事件的范围只包括波兹南，1970 年事件席卷了三联城和什切青，而在1980 年，几乎国内所有的大工业中心和城市都成了罢工的舞台。

在波兹南事件时，示威工人只能在几小时内保持秩序（在游

行时还提醒大家注意不要践踏草地），后来对群众失去了控制，而且未能防止抢劫和私设公堂。沿海地区事件的经过大致相似，但是它达到了更高的组织水平，即到了一定的时候成立了罢工委员会，作为同当局进行谈判的得到承认的工人代表机构。众所周知，今年罢工运动的特点是，从一开始，罢工委员会就自主地控制了整个运动的进程。罢工委员会特别关心社会财产，它呼吁大家互相关心，反对可能发生的闹事。在举行罢工的工厂和城市以及全国范围内，尽管正常的生活被打乱了，然而犯罪率还是有了明显的下降。

在1956年和1970年——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罢工和动乱是在使用武力的情况下被镇压下去的，兄弟之间互相残杀，我们都是当时的民族悲剧的见证人。今天我们怀着轻松得多的心情（虽然经常还是处在有伤神经的紧张状态中）观察了今年罢工平静的发展，以及后来在政府委员会和罢工委员会之间进行的既尊严、又有理智的戏剧性的谈判。最后以谈判双方圆满地达成协议而告结束。人们称这些协议为社会公约并非偶然。我们波兰人都为之松了一口气，我们的抱善意的邻邦和朋友也和我们一起松了一口气，全世界人民都为这件好事舒眉展眼。

今天使我们大家最感兴趣的重要问题当然是：1980年夏天事件在社会意识中可能留下和必将留下什么样的持久的后果，以及从中应该得出什么样的政治结论。

对这个根本问题——我认为——只能有一个答案：我们大家应该理解和认可这一事实，即社会主义社会现在是，而且必须继续是建立在社会公约基础上的共同体。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注意：这几次工人抗议运动的爆发，由于持续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规模和决心一次比一次大，因而所带来的危险也就越来

越大。

波兰民族和波兰国家现代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社会对抗的解决办法证明，灾难性的发展道路对我们来说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我们坚信，不仅一切在理论上说可能发生的，而且在实践上将来大概也是不可避免的当局与公民之间的冲突，我们都能采用对话、互相让步、甚至争论和争吵的方法（但任何时候都不要使用武力）来加以解决。我们现在正处于探索建立制度来保证这种解决办法的过程中。

对于党来说，要摆脱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行使政治领导惯用的名词术语式的方便形式，而去掌握在群众工作中的说服方法，是很不容易的。而对于失去了对党信任的公众来说，要重新树立没有党就不可能有一个得到明智治理的国家的思想，也不是没有困难的。所以，一个建立在划分为“我们”和“他们”的原则基础上的共处时期正在到来。这种划分实际上早已存在，可是被精心地掩盖起来了。现在我们至少已能够公开承认，遭到破坏的党群关系是难以立刻得到恢复的。

如果党在自己的内部找不到足够的力量，不能依靠党内正直的、有思想的骨干（他们早就觉察到面临灾祸的威胁，而且提醒过自己的领导注意，但是没有用），在遭受冲击后振作起来并以新的面貌复兴起来的话，那对波兰未来的命运是不幸和危险的。不少党外有识之士也希望党及其干部能及早进行革新、他们反对那种长期对国家、对国内安定和国内秩序以及国家的国际威望极其有害的做法，反对连续不断地对所有党员不加区别和盲目地横加责难和侮辱。

某些活动家使党蒙受耻辱，这对忧心忡忡的普通党员来说是莫大的痛苦。现在主要考虑的不是由于党过去的业绩使得波兰获得安全和在世界上处于并非无足轻重的地位，而是从党所

希望而且必须为之负责的这个国家的光明的未来着想，为了公共福利就不应该给党员增加额外的烦恼和在这困难的时刻妨碍他们恢复常态。

波兰统一工人党从六中全会开始在党内开展了一场广泛的、有时是很激烈的讨论，这个讨论后来延续到七中全会。讨论的目的是要制定党在人民生活和国家生活中起领导作用的原则，这些原则应符合最近几个月来发生的历史性的政治转折的性质。在许多党组织的会议上，以及积极分子和活动家会见时，对过去的工作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并且试图制定新的、能永远防止在党内和党的政策中出现各种畸形和歪曲现象的纲领性原则。

的确，并不是说就不存在动摇和怀疑的人了，这种人的代表就是那些习惯于采用机关式工作方法的干部，然而有越来越多的党员群众正在参加革新过程范围内的具体活动，其中包括改革后的工会的活动。因此可以期望，在党的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前，在她的队伍中将会出现民主性的变革，这种变革一定会恢复党的威信和社会对她的信任。由中央委员会建立的有200人参加的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已开始紧张的工作，经济改革方案也已提交讨论，政府正在准备有关经济状况的报告并作出努力来改善非常困难的市场形势和制止通货膨胀。目前公众和当局面临着许多极其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要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就要求在安定、理智和遵守公民纪律的条件下一切社会力量的团结一致。

瓦迪斯瓦夫·马尔凯维奇

波兰政府委员会同厂际罢工委员会签署的协议议定书

(1980年8月31日于格但斯克)

政府委员会和厂际罢工委员会，在研究了沿海地区罢工职工的21项要求之后，作出如下决定：

对于第一项要求，即“根据波兰人民共和国批准的、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会自由的第87号公约，同意建立独立于党和雇主的自由工会”，双方确认：

(1)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工会工作没有能实现职工的希望和期待。

双方认为建立新的、能真正代表劳动阶级的自治工会是可取的。对于任何人留在原有工会的权利，双方均无异议。将来可望在各工会之间建立合作关系。

(2)在建立新的、独立自治工会之际，厂际罢工委员会强调，新工会将遵守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定的各项原则。新工会将维护职工的社会利益和物质利益，并且不打算起政党的作用。新工会坚持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原则，这种所有制是波兰目前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新工会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对国家所起的领导作用，也不破坏业已确立的国际联盟体系，同时努力保障劳动者有适当的手段用于监督、发表意见和维护自身的利益。

政府委员会强调，无论是对新工会的组织结构、还是对它的各级工作职能，政府均保障并尊重它的独立和自治。政府对新

工会在履行其保护职工利益、实现职工的物质、福利和文化需要方面的职能时，将提供一切可能条件。同时政府还保障新工会将不受任何歧视。

(3)独立自治工会的建立及其活动，符合业经波兰批准的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会自由和保护工会权利的第87号公约，以及关于建立组织和集体谈判权利的第98号公约。关于工会和职工代表机构的规模，要求在立法方面作相应的修改。为此，政府承担义务，特别是对工会法、工人自治法和劳动法提出法律草案。

(4)已成立的各罢工委员会，可以转变为诸如工人委员会、职工委员会、工人代表会议那样的工厂职工代表机构，也可以转变为新的自治工会的筹建委员会。

厂际罢工委员会作为新工会的筹建委员会，有权在沿海地区范围内选择一个工会形式或联合会形式。

在按会章选出新的领导机构以前，筹建委员会将继续行使其职能。

政府有责任在工会中央理事会（即原有工会的领导机关——译者注）的登记之外，为新工会的登记创造条件。

(5)对于国民收入中消费和积累的分配原则，对用于各种目的(卫生、教育和文化)的社会消费基金的分配原则，对于基本报酬原则和工资政策方针，尤其是对于通货膨胀条件下自动调整工资的原则、对于长期经济计划、投资方针和物价变动，对于上述所有这些决定劳动者生活条件的关键性决策问题，新工会应该有公开发表意见的切实可能性。

政府有责任对履行上述职能提供条件。

(6)厂际罢工委员会将成立社会职业劳动中心，其任务是客观地分析职工状况、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和代表职工利益的方式

方法。该中心还将对工资指数和物价指数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提出有关补偿办法的建议，并公布自己的调查结果。此外，新工会将拥有自己的出版社。

(7)政府保证遵守波兰1949年工会法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即保证工人、职工自愿成立工会的权利。新成立的工会将不加入工会中央理事会所代表的工会联合会。双方认为，此项原则在新的工会法中应保留。同时保证让厂际罢工委员会代表或自治工会筹建委员会代表以及其他职工代表组织的代表参与这项新的工会法的制定。

对于第二项要求，即“保证罢工者及罢工支持者的罢工权利和安全”，双方确认：

罢工权利将在制定中的工会法内得到保证。工会法应当规定宣布罢工和组织罢工的条件、解决争论问题的方法和侵犯权利的责任。劳动法第52、64和65条不适用于罢工参加者。在未通过工会法之前，政府保证罢工者和罢工支持者的人身安全，并且保持迄今的劳动条件。

对于第三项要求，即“尊重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所保证的言论、印刷和出版的自由，同时对独立的出版机构不进行压制，并向具有各种信仰的代表提供群众性传播工具”，双方确认：

(1)政府在三个月内向议会提出报刊、出版和演出检查法草案，该项法律草案应以下述原则为依据，即新闻书报检查应当维护国家的利益。这就是说，保守国家机密和经济秘密(机密的范围将由法律条例更确切地加以规定)，维护有关国家安全事务和国家的重大国际利益，保护信教者和不信教者的自由，以及禁止伤风败俗内容的散布。这项法律草案还应包括对报刊、出版

和演出检查机关所作的决定，有向最高行政法院提出申诉的权利。这项权利也将写进即将修订的行政诉讼法中。

(2)宗教团体在他们的宗教活动范围内使用群众性传播工具的问题，将通过国家机关和有关宗教团体，就内容问题和组织问题协商一致后予以解决。政府保证让广播电台转播与主教团具体商定的星期日弥撒。

(3)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以及报刊和出版社的活动，应为表达各种思想、观点和意见服务，应当受到社会的监督。

(4)报刊，就象公民及其组织一样，应有权查阅由政府及其所属行政机关颁发的公开文件文书，特别是行政文件、社会经济计划等。行政活动公开原则的例外情况，将根据本项第一点的精神在新闻检查法中加以确定。

对于第四项要求，即“A·恢复1970年和1976年罢工以后的被解雇者和因政见问题被从高等学校开除的大学生原有的权利。B·释放所有政治犯(其中有埃德蒙德·扎德罗任斯基，扬·科兹沃夫斯基，马雷克·科兹沃夫斯基)。C·停止因政见问题而进行的迫害”，双方确认：

(1)立即调查在1970年和1976年罢工后解雇的理由。在提出的所有案件中，对确认为处理不当者，只要本人愿意，应立即恢复工作，并应考虑其在解雇期间所掌握的业务能力。

这样的处理也相应地适用于被开除的大学生问题。

(2)将“B”点所述人员的问题交司法部长审查，在两周内进行适当的处理。如果所述人员业已剥夺自由，则在审理工作结束之前中止服刑。

(3)审查暂时拘捕的理由，并释放在附件中列举的人员。

(4)充分保障在公共生活和职业工作方面表达信念的自由。

对于第五项要求，即"通过群众性传播工具，发表关于建立厂际罢工委员会的消息，并公布厂际罢工委员会的要求"，双方确认：

通过全国范围的群众性传播工具，公开发表本议定书，就是实现这项要求。

对于第六项要求，即"采取以下实际行动以引导国家摆脱危机状态：A．充分报导有关社会一经济形势的消息。B．使社会各界和各阶层都参与讨论改革纲领"，双方确认：

经济改革工作必须大大地加速进行。当局将在最近几个月内制订和公布此项改革的基本内容。应当为广泛参加改革问题的公开讨论创造条件。工会尤其应该参加制订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法和工人自治法的工作。经济改革应建立在从根本上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工人自治委员会实际参加管理的基础上。必须作出相应的决定来保证工会履行按协议第一项规定的职能。

只有了解情况，又很了解现实的公众，才可能是我国经济整顿计划的倡议者和实施者。政府将从根本上扩大向社会、向工会、以及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提供社会经济情报的范围。

此外，厂际罢工委员会要求：

一为发展农民的家庭经济——波兰农业的基础——开辟广阔的前景。

一农业中的各种成分在使用一切生产资料（包括土地）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

一为农村自治委员会的复兴创造条件。

对于第七项要求，即"全体罢工参加者在罢工期间的工资按

休假办法发给，並从工会中央理事会基金中支付”，双方确认。

罢工职工罢工期间的工资先支付40%，职工复工后，以八小时工作日计算，按休假工资补足至100%。厂际罢工委员会要求加入该会的职工，在罢工结束以后协助企业、工厂和机关的领导采取行动，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原料和动力以及增强各工作岗位的责任感。

对于第八项要求，即“提高每个职工每月的基本工资2000兹罗提，作为对迄今物价上涨的补贴”，双方确认：

要逐步提高各类职工的工资，首先是提高最低工资。双方同意按具体工厂和具体行业来提高工资的原则。现在和将来提高工资都要考虑到职业和行业的特点，采取提高一级工资或相应地扩大工资的其他成分或者工资类别的其他成分的方针。至于企业中的脑力工作者，其工资将按个人工资级别提高一级。根据各行业的协定，目前已商定的增加工资的工作，应于今年九月底以前结束。

政府在对所有的行业作了分析以后，于1980年10月31日之前，将同工会商定提出从1981年1月1日起为最低工资者，特别是为多子女家庭提高工资的计划。

对于第九项要求，即“在物价上涨和货币贬值时，要保证工资的自动增长”，双方确认：

必须通过对公营和私营经济成分加强控制的办法，来制止日用品的涨价，特别是要停止所谓的变相涨价。

根据政府的决定，将要对生活费用的构成进行调查。工会以及科学机构也将作同样的调查。政府将在1980年底以前，制定出生活费用提高的补偿原则，并交给公众讨论，经同意后贯彻

执行。制定的原则应该考虑社会福利的最低标准问题。

对于第十项要求，即“充分满足国内市场的食品供应，而出口只能是剩余部分”，对于第十一项要求，即“取消商业价格（大体相当于我国的议价——译者注）和所谓内部出口中的外汇销售（指外汇商店——译者注）”，对于第十三项要求，即“实行肉类和肉制品票证——食品券办法（直到能控制市场形势时为止）”，双方确认：

通过增加对农业生产的报酬，以及把肉类的出口限制到最低限量，并增加肉类的进口等措施，在1980年12月31日以前居民的肉类供应将得到改善。在此期限内，将提出改善居民的肉类供应计划，包括考虑是否实行票证制度问题。

双方一致同意，在外汇商店将不再出售国产的供应不足的日用品。关于在市场供应问题上所采取的决定和行动将在年底前向公众宣布。

厂际罢工委员会建议取消高价肉店，把肉类和肉制品的价格调整和统一到一个平均的水平。

对于第十二项要求，即“根据业务水平，而不是党派隶属原则选拔领导干部，并通过拉平家庭补贴和取消特殊销售等等来废除民警、公安机关和党的机关的特权”，双方确认：

接受关于选拔领导干部必须坚决实行根据业务水平和能力的原则，而不论其是否党员，其他党派人士，或非党人士的要求。1980年12月31日之前，政府将提出一个均衡所有工种的家庭补贴计划。政府委员会指出，目前设立的只有茶点部和职工食堂与其他工厂和机关中的情况类似。

对于第十四项要求，即"把妇女的退休年龄降到50岁，男子降到55岁，或者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妇女工作满30年，男子工作满35年，即可退休，而不论其年龄大小"，确定如下：

政府委员会认为，在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人口状况下，此项要求在目前不可能付诸实现。问题可以留待将来再讨论。厂际罢工委员会要求，在1980年12月31日以前，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要求考虑重体力劳动者提前五年退休的可能性（妇女工龄满30年，男子工龄满35年，从事特别繁重劳动的职工则至少满15年工龄），至于退休与否只能根据职工的意见而定。

对于第十五项要求，即"将按旧工资标准计算的抚恤金和养老金统一到目前支付的水平"，确定如下：

政府委员会宣布，根据国家的经济可能和最低工资者提薪情况，每年都要适当提高最低退休金和抚恤金。政府将在1980年12月31日以前提出实施计划。政府准备提出建议，将最低的抚恤金和退休金提高到所谓的最低社会福利标准（这个标准将由有关机构在听取社会舆论并在工会监督下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厂际罢工委员会强调该问题的特别紧迫性，坚决要求把按新旧工资标准计算的退休金和抚恤金拉平，并考虑增加生活费用。

对于第十六项要求，即"改善卫生保健工作条件，以保证劳动者有充分的医疗护理"，双方确定：

双方认为必须立即增加施工力量，以完成卫生保健部门的基本建设项目，必须通过扩大进口原料来改善医药供应，提高卫生保健部门所有职工的工资（修改护士工资等级表），政府和主

管部门必须加紧制定计划，以改善社会健康状况。这方面的其他行动方针已经包括在附件之中。

第十六项要求的附件：

(1)实行卫生保健工作人员权利规章。

(2)保证销售一定数量的棉制工作服。

(3)购买工作服款应在物资经费内报销。

(4)按照理论上存在的可能性，保证工资基金能够给所有工作突出的人拨出相应的额外补贴。

(5)确定在连续工作25年或30年以后发给相应增加的补助费。

(6)确定对于在有害健康的条件下工作的人或工作繁重的人员补助费，实行非医务人员倒班工作补贴。

(7)恢复对治疗传染病医务人员和接触传染性生物的工作人员的补助费，提高值夜班护士的工资。

(8)承认脊椎病是口腔科医生的职业病。

(9)供给医院和托儿所以优质燃料。

(10)未受过中等专业教育的护士的工龄补贴应与有文凭的护士一样。

(11)对一切专业工作者实行七小时工作制。

(12)实行非倒班性的星期六公休日制。

(13)星期日或节假日值班应增付日薪百分之百。

(14)医务人员应享受药品免费待遇。

(15)用社会基金来偿还部分住房贷款。

(16)增加医务人员的住房定额。

(17)单身护士亦得参加住房分配。

(18)把奖励基金改为第十三个月的月薪。

(19)在卫生保健部门工作20年后，应保证每年休假六周的

待遇，并能享受与教师相同的为期一年的带薪疗养假。

(20)保证给予写博士论文者带薪休假四周，写专业论文者——两周。

(21)保证在医务值班之后休息日的充分权利。

(22)托儿所(和幼儿园)职工实行5小时工作制，并且供给免费伙食。

(23)给基层卫生保健人员优先供应汽车，并推行公务用车里程限额的原则。

(24)要把受过高等教育的护士与其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一样看待并付予同等的工资。

(25)在工厂工会组织内成立专门的维修组，以防止卫生保健设施进一步耗损。

(26)把住院病人的医药费标准从每人1138兹罗提增加到2700兹罗提，因为这才相当于实际需要的医疗费用和伙食费。

(27)规定对卧床不起的病人的食品券。

(28)将医疗车辆数目增加一倍，因为这是今天的实际需要。

(29)保证空气，土壤和水不遭污染，尤其是在近海地区。

(30)在新住宅区交付使用时，应该有诊疗所、药店和托儿所同时交付使用。

对于第十七项要求，即“托儿所和幼儿园保证为劳动妇女的孩子保留相应数目的名额”，确定如下：

政府委员会完全同意这一要求。省政府将在1980年11月30日之前提出一个相应的计划。

对于第十八项要求，即“实行三年制带薪产假以利于抚育子女”，确定如下：

1980年12月31日之前在同工会协商的情况下对国民经济的可能性进行分析，并确定对目前享受不带薪的假期来抚养子女的妇女进行补贴的时间和每月补助的金额。厂际罢工委员会要求在进行分析时应考虑，孩子出生后的补贴第一年为工资的全部，第二年为50%，但不得低于每月2000兹罗提。这项要求应该从1981年上半年开始逐步予以实现。

对于第十九项要求，即“缩短等待住房的时间”，确定如下：

1980年12月31日之前，将由省政府提出一个以缩短等待住房时间为目标的改善住房情况计划。这个计划将交给省里的公众进行广泛的讨论，并同相应的组织（波兰城市规划者协会、波兰建筑协会、最高技术组织等）进行磋商。该计划也应该考虑到利用现有的建房工厂和进一步发展建筑业生产基地。这种同样的工作亦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对于第二十项要求，即“把出差补贴从40兹罗提增加到100兹罗提，以及增加夫妇两地分居的补贴”，确定如下：

双方商定，从1981年1月1日起增加出差补贴和夫妇两地分居的补贴。关于这个问题的建议将由政府在1980年10月31日之前提出。

对于第二十一项要求，即“实行所有的星期六为公休日制。对那些不能间断工作的职工和四班制的职工所缺的星期六公休日，应以增加休假时间或其他带薪休息日予以补偿”，确定如下：

1980年12月31日之前拟定并提出实现带薪星期六公休日计划的原则和方法或缩短劳动时间的其他调整方法。该计划将考虑从1981年起增加带薪星期六公休日的天数。在厂际罢

工委员会要求的附件中，包含有这方面的其他行动方针。

在作出上述决定之后，双方商定如下：

政府承诺：

——保证这次罢工的参加者和支持罢工者的人身安全，以及保持他们迄今的工作条件；

——责成各主管部门研究参加厂际罢工委员会的所有罢工工厂的职工们提出的各行业的特殊问题；

——立即通过全国性的群众传播工具（报刊、广播、电视）公布本协议议定书的全文。

厂际罢工委员会承诺，于1980年8月31日17时结束罢工。

第二十一项要求的附件：

(1)修改部长会议关于四班制职工休假工资和疾病补贴的计算方法的指示。目前是按30天（而每月工作22天）的平均数计算的。此种计算方法降低了短期病人的平均日薪，也降低了休假期间工资数额。

(2)要求将各种缺勤期间的工资计算原则统一于一个法律文件（部长会议指示）内。条例的含糊不清，往往被用来对付职工。

(3)对于四班制工作职工的星期六公休日缺额，将通过额外增加公休天数来加以补偿。目前四班制职工多于其他工作制职工的公休日乃是一种繁重劳动后的间休，並非是真正的假日。行政管理机关提出的只有将两种工作制的工作时间拉平后方可给予补偿的论据，看来是不正确的。

(4)要求象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每月的所有星期六均为

公休日。

(5)要求取消劳动法第147条。该条允许在出现额外休息日的一周内可将平均工作时间延长至9小时。劳动法第148条亦应随之取消。目前在欧洲各国中，我国的工作时间是属最长的工作时间之一。

(6)通过修订劳动法提高有关报酬合同的作用，即不仅是有关本人的工资等级或报酬的其它项目的变动，而且是计算报酬的方法的变动(由计时改成计件)都要求雇主加以宣布。还应确立一些原则，即计件制的个人工资等级，基本上应适用于职工所从事的所有各项工作。同时，还应整顿按业务技能使用年青职工的工作，使上述规定不致于成为他们业务晋升中的额外的障碍。

(7)在多班倒的工作中，职工的夜班费实行计时制增加百分之五十，计件制增加职工实际收入的百分之三十的办法。我们也要求象化学工业职工一样，下午班工作亦应发给补贴费。

要求政府在1980年11月30日前审议这些建议。

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

主席

莱赫·瓦文萨

副主席

安杰伊·科沃杰伊

副主席

博格丹·利斯

成员：

莱赫·邦德科夫斯基

沃伊切赫·格鲁谢茨基

政府委员会

主席

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

米耶奇斯瓦夫·雅盖尔斯基

成员：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处成員

兹比格涅夫·杰林斯基

格但斯克省人民会议主席

塔德乌什·菲什巴赫

格但斯克省长

安杰伊·格维亚兹达
斯泰凡·伊兹德布斯基
耶日·克维耶齐克
兹齐斯瓦夫·科贝林斯基
亨雷卡·克日沃诺斯
斯泰凡·莱瓦多夫斯基
阿莉娜·皮恩科夫斯卡
尤泽夫·普日贝尔斯基
耶日·西科尔斯基
莱赫·索别谢克
塔德乌什·斯坦内
安娜·瓦伦滕诺维奇
弗洛里安·维希涅夫斯基
耶日·科沃杰伊斯基

什切青厂际罢工委员会同政府委员会关于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建议和要求的议定书

（1980年8月30日于什切青）

对提出的建议和要求进行讨论后，兹作出如下决定：

——双方商定：依据专家们的意见，可以建立自治工会。根据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自治工会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同时接受下述原则：罢工委员会从罢工结束时起就转为工人委员会，由它在必要的时候宣布进行普遍、直接和秘密的工会领导机关的选举。为制订87号公约第3条所规定的法律、章程和其他文件将进行筹备工作，为此目的将拟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双方商定：由政府制订一个食品的市场供应的具体计划，并于1980年12月31日前公诸于众。

——已作说明，将逐步提高所有行业职工的工资，而首先是最低工资。商定的原则是：工资的提高将在具体工厂和具体行业内进行。要考虑到各专业和行业的特点，按工资等级提高一级或相应地扩大工资中的其他成分，或者工资类别中的其他成分。对企业中的脑力劳动者，将使其工资待遇提高一级。

——双方商定：在1980年12月31日前，将制订一个所谓最低社会福利标准，并公诸于众。在研究了国家预算能力以后，从1981年1月1日起将适当提高最低抚恤金和退休金的标准。

——商定出一个原则，对因公丧失健康的职工，应使其薪金保持不低于原岗位薪金的水平。政府在1980年9月30日前，将根据所确定的原则，就劳动法第217条和218条的内容提出

新的修正建议。

——双方商定：在1980年12月31日前，将研究分析国家的经济可能性，并确定每月给享受三年产假的妇女发放补助金的数额。关于这一问题，政府将在1980年12月31日前就劳动法第186条的内容向议会提出相应的修正案。

——双方商定：要把给所有行业职工的家庭补贴同军人和警察的补贴拉平。这要分三期(一年为一期)予以实现，第一期从1981年1月1日开始。

——已作说明，“人权公约”和“赫尔辛基会议的最后文件”已由波兰人民共和国出版部门出版过。它们将以小册子形式重版。

——双方决定：所有参加罢工的职工、尤其是职工选出的代表，将不会受到任何迫害，也不会因为他们所从事的罢工活动而遇到各种方式的刁难，但犯有一般罪行者除外。

——双方指出，政治活动家，如果他们的活动不是以犯罪形式危及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基本利益，也未犯有一般罪行，将不会受到镇压。建立组织可按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办理。

——双方指出，罗马天主教教会同国家的对话正在顺利发展。群众性传播工具的使用将进一步扩大开放。

——双方商定：为纪念1970年12月事件的殉难者将在造船厂正门墙上建立纪念牌。纪念牌的式样和内容将通过同造船厂领导、什切青城市设计师以及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的混合委员会协商确定。落成的期限为1980年12月17日以前。

——双方认为必须进一步改善波兰的医疗卫生事业，特别是改善药品的供应，并且统一所有保险者支付药费的标准。领抚恤金者、退休者、铁路工人和军人迄今实行的药品免费制度将

继续执行。

——双方同意，必须通过加强对国营和私营经济成分的监督，来限制日用品价格的上涨，特别要制止所谓的变相涨价。

——双方决定如下原则：企业和机关的内部商店内食品的分配将根据同等条件进行。



——双方决定：1980年12月31日以前，将改善对居民的肉类供应。同时在这期间将提出改善居民肉类供应计划，包括研究实行票证制的问题。

——双方商定：在外汇商店将不出售国产的供应不足的日用品。

——双方商定：将采取必要的行动来阐明目前出现的局势及其产生的原因。在这方面得出的相应结论应该公诸于众，而今后对产生的不合理现象将作出迅速和有效的反应。

——双方认为，改善对所有工厂(国营的和合作社的)的原材料供应至关重要。

——双方商定：工厂领导和工会通过逐个研究具体建议后，恢复1970年和1980年因罢工活动而被解雇的人员的工作。

——双方决定：1980年11月30日以前，应提出实行限制波兰人民共和国书报检查活动的方式。



——双方商定：1980年12月31日以前制订并提出实行所有星期六均为带薪公休日计划的原则和方式或者缩短工作时间的其他调整方式。

——双方决定：政府将提出解决住房问题的计划，确保等待住房的时间不超过五年。

——双方确立如下原则，即对不称职的领导干部应将其降职，而不是调任同级职位的工作。

——双方商定：自1981年1月1日起将增加出差费，政府

将在1980年9月30日以前就此问题提出建议。

——工厂举办的先进工人学校和职业训练班，只能以工作出色的职工和那些因健康状况欠佳而需要改变工作岗位的职工为选送对象。进入这些学校和职业训练班的学员由工会同工厂领导协商以后选派。

——双方商定：国家当局要在1980年12月31日以前，制定出修改后的造船工人规章，其中将包括造船厂范围内各企业职工的社会福利问题及规章规定的各项问题的解决办法。

——在罢工期间可给罢工的职工先支付个人工资的40%，职工在复工后可得到罢工期间个人工资的100%。

——双方商定：当地的群众性传播工具(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将全文公布最后协议的内容，波通社亦将在新闻稿中全文报导这一内容。

最后决定

由于政府委员会和什切青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工作，制订和签订了本协议。

部长会议主席将任命一个由政府、工人和省政权的代表(各五人)组成的混合委员会。由政府代表一人任委员会主席，工人代表和省政权代表各一人任副主席，並由他们组成委员会的主席团。委员会的任务将是监督协议条文的执行，并向职工通报委员会的工作过程和协议的执行情况。

双方发生争议时，各方有责任(在采取某种行动之前)在委员会主席团内或委员会内相互协商解决。

厂际罢工委员会呼吁，各工厂全体职工竭尽全力在最短的时间内弥补由于停工而使国民经济遭受的损失。

厂际罢工委员会

主席

马里安·尤尔奇克

副主席

卡齐米日·菲斯赫贝因

马里安·尤什丘克

政府委员会

副总理

卡齐米日·巴尔齐科夫斯基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

政治局候补委员

安杰伊·热宾斯基

统一工人党什切青省委

第一书记

扬努什·布雷赫





译 后 记

格但斯克是波兰 1980 年“八月事件”的中心，该市的列宁造船厂又是这个中心的中心。波兰政府和罢工工人的谈判曾在这个厂里举行，达成的 21 条协议书是在这个厂签字的，独立自治“团结”工会也是在这个厂诞生的。

“八月事件”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可以说已经成了历史。但是由它开始的波兰事件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大事。《波兰团结工会成立记》是向读者提供“八月事件”比较详细的第一手材料的一本书。

本书作者之一，沃依切赫·盖乌任斯基，生于 1930 年，在大学时攻读经济专业，毕业后当了记者，先后在许多杂志社工作过，不久前在《政治》周刊和《各大洲》杂志担任记者。他除了研究国内问题外，还搞过第三世界问题的采访报导。盖乌任斯基写过三十多本书，曾经多次获报导奖和创作奖。

本书的另一位作者莱赫·斯泰凡斯基，1947年生，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和政治学家。在大学学习期间他就开始为一些杂志写稿，不久前他是《政治》周刊的国内部编辑，专门研究国内社会问题。

他们两人在“八月事件”一开始就到了格但斯克，直到罢工结束一直在现场采访。他们和政府代表团、省委领导以及团结工会方面的人士都有广泛的接触。在这本书里，他们逐日记载了罢工和谈判的全部过程，同时也提供了一些背景材料，对波兰危机也有一些个人的议论。因此，本书对我们研究波兰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译者　　1981 年 12 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